

编审：李玉兰 曹俊山

顾问：侯立中

作者：郑宽亭 雪峰 雪梅

主编：王 琴

弘揚民族精神

共創文明輝煌

蘭雨

二〇〇五年九月

中共高唐县委书记孙兰雨题词

留住真实而
鲜活的历史

张乐天

高唐县县长张乐天题词



后排：左为吕庄党支部书记张振海，右为县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员陈明山。前排：吕才六十五代传人吕长海（左）、吕长河（右）和吕庄最年长者王长发。



吕才墓前神道上的石羊（陈昆麟供稿）



邢春敏（即小敏）
的好友姜金庆。



邢春敏（左）与作者合影于大连



自左至右：孙长山的警卫员梁连川、县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员吴光中、资料推荐者王吉义及孙长山的儿子孙宝亭。

刘福十代传人刘公辅



镇国大将军刘福画像
(刘公辅 供稿)



洪圣第十代传人洪保山(中)和第十一代传人洪泰安(左)、洪泰国(右)。



台湾参将白世倬画像（白凤林 供稿）



左为东白庄党支部书记白凤林，
右为康殿惠第六代传人康岳顺。



郝丙扬的孙子、县教育局
副局长郝英超



山东省学生赴南京请愿团高唐代表郝炳扬

(郝英超 供稿)



谢玉春第四代传人、原实验小学工会主席、党支部成员谢
传山，退休后在家安享天伦之乐。



文天祥救植之古槐



新建大觉寺山门



李遠井



三眼井



元朝所建之文庙大殿



文庙大殿前现存之枯、荣两棵国槐



面水隱翠的孫大石美術館



复原后的鱼丘山——因其高唐曾称鱼丘县。



玉带浮水化为桥



九曲板桥连赤亭

序 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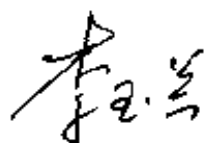
《高唐文史资料》第十七辑(高唐轶事·景观拾遗)同广大读者见面了。该辑资料选材于高唐的历史与现实,钩沉探微,颇为精详。有故事传说,影射出时代足迹;有人物撷英,再现了轶闻趣事;有景点扫描,绘画成醉人长卷;有艺海溯源,寻觅到书画脉络。具有较强的时代性、宝贵的资料性和引人入胜的可读性。是应加强公民思想道德教育之需而刊发的一份爱家乡、爱祖国的生动教材。

该辑资料主要由郑宽亭先生执笔撰稿,开《高唐文史资料》为作者专著之先河,为体现统一主题、为服务定向人群、为发挥作者专长辟出一条蹊径,适合文史资料不限题裁、不求完整、不拘观点的表现方式。

郑宽亭先生是一位老资格的地方史志工作者,深谙县情,现为政协文史研究员。他在高唐工作的几十年中,不间断地调查访问和翻阅典籍,积累了丰富的地方史料。他主编的《高唐县志》被省有关部门誉为名志佳本;他先后为省、市有关书刊组织文稿几十万言,不遗余力地宣传高唐,提高高唐知名度;他多次为中小学师生作爱国主义教育专题报告并获得好评,为高唐人文资源的开发和利用做出了显著贡献。

智者千虑,必有一失。由于该辑资料为个人撰文,局限实存,舛误之处,在所难免,尚望读者批评指正。

高唐县政协主席、党组书记:



2004年12月

序 二

高唐县政协自1984年开展文史资料工作以来，二十年来已先后编辑刊发了十六辑《高唐文史资料》，总计一百八十余万字，四百多幅图片。内容纵及高唐古今，横涵人文百业，起到了“存史、资政、团结、育人”的作用。在团结党外人士、联系境外游子、增进友谊、加深乡情、合力振兴高唐等方面做出了突出贡献。

《高唐文史资料》第十七辑（高唐轶事·景观拾遗）的问世，无疑是县政协在文史花园中培育出的又一支色香别致的奇葩，奏响的又一首歌颂高唐的交响乐。《高唐轶事·景观拾遗》是高唐县第一部以文艺形式表现史实的专著，是第一部系统介绍高唐现存古今景点的文集，也是第一部由个人撰写的以高唐当地人文资料对青少年进行爱祖国、爱高唐教育的乡土教材。

该辑共四十八篇，洋洋洒洒十三万言，把我县自唐朝至解放初期的名人轶事按照时间的先后顺序娓娓写来，并将我县古今二十个景点糅合其中，先趣事后景点，情中有景，情景交融。内容涉及匡扶正义、智勇胜敌、倾囊相助、刻苦学习、捍卫真理、景点扫描等多个方面，有较强的可读性，不仅是一本宣传高唐人文景观和自然景观的良篇佳构，还是一本非常好的加强未成年人思想道德教育的教科书。多才多艺、有胆有识、舌战玄奘的吕才，不怕丢命、怒斥秦桧、力保岳飞的何彦猷，敢与寇准明是非、辨曲直的张逊，参加收复台湾、治理台湾的陈一鹏、白世饶、刘福、洪圣，在共产党领导或影响下，宁死不做亡国奴的吴子杰、郭瑞林、刘存福、刘文豹、孙长山等人的感人事迹和优良品质，对于未成年人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具有较强的指导意义。这些文章叙述了高唐名人不同凡响，轰轰烈烈的事迹，妙趣横生、富有寓意。字里行间无不跳动着作者一颗对高唐的赤诚之心，充满

着对高唐蓬勃发展的各项事业的忠贞之爱，值得一读！

郑宽亭先生1937年2月出生于平原县一个普通的农民家庭。他自幼聪慧好学，酷爱文学艺术。1959年于山东大学中文系毕业，来到高唐从事教育工作。1984年调入县史志办，曾先后任县史志办副主任、主任、《高唐县志》主编。郑宽亭先生是长期战斗在我县思想文艺战线和教育战线上的一名忠诚的战士。他挥毫不断，以妙趣横生的雅文轶事，积极宣传党的方针政策，热情讴歌我县所取得的每一个光辉胜利。郑宽亭先生写作是很勤奋的，在工作岗位上，兢兢业业，呕心沥血，自1984年至1996年一直从事《高唐县志》的编写工作。由他任主编编写的《高唐县志》一书，曾在1998年被省史志办作为十大好书之一向全国推荐。退休后，郑先生不甘于平淡地安度晚年，依旧坚持写作，笔耕不辍，将自己多年来收集的可歌可泣、感人至深的极具教育意义的高唐名人轶事进行整理，与其子女共同执笔，历时十个多月，终成《高唐轶事·景观拾遗》一书。以对祖国和家乡的满腔热情润泽了高唐文苑。更难能可贵的是先生还把青少年的思想工作作为己任，多次走进学校义务讲解先烈前贤的英雄事迹，使学生树立“爱祖国、爱高唐”的思想，为我县的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做出了突出贡献。

中共高唐县委常委、宣传部长：

刘萍

2004年12月20日

目 录

多才多艺彪炳千秋 有识有胆舌战玄奘·····	(1)
吕才情倾秃大妮 棒打不散留美名·····	(10)
在吕庄坠地问世 于故里仙游升天·····	(16)
石羊出游记·····	(21)
曾为高唐获金冠 未给自己谋福祉·····	(23)
能借府库做买卖 敢与寇准争是非·····	(28)
不要乌纱要真理 敢为忠良鸣不平·····	(29)
风尘未掸救幼树 古槐有灵悼恩人·····	(30)
仗义执言做中流砥柱 纠误慰冤开平反先河·····	(36)
慷慨倾囊解人困 以德获恶心无悔·····	(39)
敢对陋俗举叛剑 勇追郎魂赴黄泉·····	(46)
水甘美病毒不侵土 洁净延年益寿·····	(49)
为民请愿不惜命 留有美名照汗青·····	(51)
陈一鹏参战收复宝岛 刘全五屯军落户高唐·····	(57)
两代受命督浙闽 台民三届受惠恩·····	(61)
白世儆治理宝岛政绩斐然	
康殿惠爱上高唐乐不思蜀·····	(64)
家贫恒心在 香光照夜读·····	(67)
高唐人匡扶正义 太平军纪律严明·····	(70)
义正词严斥倭寇 殚精竭虑研金石·····	(73)
因抗日救国走出学校 为逼蒋表态南下金陵·····	(76)
战日寇刘存福抡铡拼杀	
犯高唐小日本胆战心惊·····	(86)

金谷兰阻击关东军 日本鬼火烧东铺村·····	(93)
自卫队智袭倭寇 小日本血洗南镇·····	(97)
箭已上弦百姓临难 急中生智村民得救·····	(106)
郭瑞林成亲出尔反尔 谢鑫鹤支招放猴捉猴·····	(112)
日本兵掉队迷方向 刘文豹徒手战顽凶·····	(123)
与刘化溥反目 使邓协忱变脸·····	(131)
白手起家创大业 自力更生不扰民	
—— (一)孙长山治军有方·····	(140)
勇破敌阵救政委 敢入虎穴抓“舌头”	
—— (二)孙长山有勇有谋·····	(144)
三条好汉被追尾 一双旧鞋打突围·····	(159)
传统渊源丹青秀 门第无类翰墨香·····	(164)
国宝盼子之墓·····	(168)
相国华歆之墓·····	(171)
行宫大觉寺·····	(175)
古塔浴晨曦·····	(180)
水牢困铁牛·····	(187)
圣殿环灵光·····	(194)
一步三眼井·····	(199)
嬉戏古景点·····	(201)
险隘变乐园·····	(204)
音像水画中·····	(214)
轻舟泛碧波·····	(218)
鱼丘湖美·····	(220)
赞鱼丘湖·····	(221)

古舫驾碧浪·····	(222)
夜步玉带桥·····	(225)
紫气擎赤亭·····	(226)
双日戏玉带·····	(228)
巧成桥中桥·····	(231)
鲤鱼跃龙门·····	(233)
后 记·····	(234)

多才多艺彪炳千秋 有识有胆舌战玄奘

高唐县城西南有个清平镇，镇西有个吕庄，庄南有座古墓，墓主名字叫吕才。

吕才生于隋文帝开皇二十年（公元600年），死于唐高宗麟德二年（公元665年），出生于隋，成名于唐。吕才的黄金岁月正赶上“中国既安，四夷自服”的“贞观盛世”，这是封建社会最繁荣的时代。

唐太宗是“能知人、会用人”的封建社会少有的名君，使名儒书生们获得了施展才能的机会，多有进入仕途的希望。吕才自幼聪颖好学，熟谙儒家经典，又多才多艺，三十岁前已是一方名人了。贞观三年，宫廷乐律进行增损时，遇到了不能解决的问题。唐太宗让侍臣推荐音乐人才，中书令温彦博、侍中王珪和魏征等人以“一闻一见，皆达其妙，尤长于声乐”奏荐吕才，继直弘文馆。其后，唐太宗读周武帝介绍象戏的《三局象经》，不得其解，不知玩法，而年少时玩过象戏的太子洗马也忘记了具体方法。太宗向吕才发问，吕才研究一夜，竟然做成《〈三局象经〉图解》。太子洗马看过后回忆起的象经玩法与吕才的图解正好完全相同。因此，吕才名声鹊起，升迁太常博士，位移太常寺。四十六岁时，因功绩擢升太常丞。他著作颇多，见于诸史志

著录的就有三十一部，三百六十余卷。现大部散失，只存零星资料五千多字。六十六岁卒于职。高宗旨示运尸回故里，厚葬于清平吕庄。墓前原有神道，并立有石马、石羊等石雕，1958年被人为破坏。

吕才是深得唐太宗、唐高宗两位帝王赏识的多能学者。他懂军事，著有《教飞骑战阵图》；他知历史，纂有《隋记》；他通天文，在历算方面做出了重要贡献，并著《刻漏经》一卷，发展了刻漏记时器，这种刻漏记时器至今还陈列在故宫交泰殿中；他晓地理，受太宗之命制造了《方域图》，纂写了《唐地理经》和《灵山秀水经》，均为唐朝最权威的地理文图籍；他热文学，反对表意受限的四、六骈偶文式，倡导接近口语的古文，与傅奕共称唐朝古文运动的奠基人；他善医药，与人合作，对《本草经集注》进行增改，增加了一百一十四种新药，使其累积纳入八百四十四种药物，纠正了四百余处纰漏，形成一部包括《本草》、《药图》、《图经》三部分的《唐新本草》。此书是世界上第一部官修大型药典，在世界药物学史上占有很重要的地位；他精乐舞，奉命创造了武舞《七德舞》和文舞《九功舞》，与《上元舞》合称唐朝三大舞。《七德舞》以太宗任秦王时征战之事为内容，以民间歌曲为主调，以擂大鼓造气氛，由120人披甲执戟组成各种战阵表演战姿，气势宏伟，声韵激昂，“震撼百里、动荡山谷”，鼓舞士气，振作精神。此舞初名为《秦王破阵乐》，亦名《秦王破阵舞》，后改名为《七德舞》。白居易观舞后诗云：

“太宗意在陈王业，王业艰难示子孙”。《旧唐书》记载此舞“最负盛名、最受欢迎”。后来传入日本和天竺（印度）。至今日本还存有《秦王破阵乐》的《琵琶曲》。2003年初春，东方歌舞团对《秦王破阵乐》进行挖掘整理并搬上舞台，在文艺界刮起一阵古典音乐的风暴。《九宫舞》以太宗御制诗篇为内容，伴之管弦乐曲，初名为《功成庆善乐》，后设儿童八列，“皆进德冠，紫裤褶”随乐起舞，改称《九功舞》。凡国有大庆皆演《九功舞》。另外，吕才还编有《白雪》等著名乐曲，还造有似笛箫的乐器，名为“尺八”，至今在日本还能见到此种乐器。吕才还有可贵的重民思想，他在《议僧道不应拜俗状》中写道：“圣人无心，以百姓心为心，俗行已久，不求改变”。他还力倡男女平等，他在《进大义婚书表》中写道：“昔三代明王，必敬其妻子。妻也者，乃立宗之主，生养之



宗，继先圣之后，为大礼之本欤！固不可不敬也。”在三纲五常为最高道德标准的封建社会里，把妻看成“礼之大本”，极为难能可贵。

吕才在军事、文学、史学、天文、地理、药理学、音乐学等方面有较高的造诣，取得了历史上不可不书的成就，但他最突出的贡献当是他的无神论思想。

吕才是历史上具有唯物主义世界观的早期哲学家。在无神论发展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在哲学领域内影响深远。明朝王廷相、清朝熊伯龙和太平天国领袖洪仁玕均受吕才的影响很深。

吕才唯物主义世界观的形成，是在印度胜论哲学传入唐朝之后。太宗时，玄奘由印度取经返唐后，大量翻译经论之籍，所译《胜宗十句义论》体现了胜论哲学的观点，认为世界是物质的，是“极微”（既原子）所组成。吕才则将“极微”与中国传统哲学中的五行阴阳之气结合起来，认为同指“既不可分，又系物质实在”的最小体，是世界万物的本原。吕才在讲《易·系辞》时就说：“太极无形，肇生有象，元资一气，终成万物”。

吕才在肯定了世界是物质的是客观存在之后，指出世界是发展变化的。他在《进大义婚书表》中写道：浑然一气的宇宙，分判出天和地；天和地分判之后，出现了人类男女；男女的结合，生育出子孙后代，组成了人类社会；子孙后代逐渐进化，制定了礼法……以社会现实体现出：世界是运动的变化的发展的，绝不是停止不前的。

在指出世界是发展变化的同时，提出了发展变化的原因是事物内部的“偶配”，即矛盾。认为整个世界是按照天地、乾坤、刚柔、消息、善恶、祸福、贵贱、寿夭、无有、始终、死生、老少、吉凶、上下、泰否、进退、昼夜、男女、夫妇、早晚、邪正、内外、异同、延促、立破、长短等阴阳规律发展变化的。吕才在《进大义婚书表》中写道：“……偶配生成，必致昌益之道，孔子曰：‘天地不合，万物不生’”。用夫妇、天地比喻矛盾的对立统一，由于对立统一的运动作用，才有世界万物的生成。

吕才在与慧立等玄奘弟子的辩论中多次阐明：世界的客观存在称“实录”，客观事物的运动规律称为“义理”，认为“义理”产生于“实录”，离开“实录”便没有“义理”。“实录”和“义理”都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即“理则未弘于方外”。这与一千四百年后的当代唯物主义的认识论、矛盾论基本一致。吕才的认识论还终止了古代唯物主义者将“实录”与“义理”混为一谈的混沌局面。

吕才在唯物主义思想指导下，与当时的种种迷信势力进行了不屈的斗争。

唐初迷信盛行，如看风水、看相、算命、批八字等迷信书籍就有一百二十多种，其中最坏的是各种阴阳书，此为迷信思想之大全。太宗以“阴阳书近代以来渐致讹伪”，“欲削其浅俗，存其可用者”，命吕才修撰《阴阳书》。历时十五年，《阴阳书》修成，太宗诏颁行之。

吕才站在无神论的立场上在此书中以五十三卷的篇幅对迷信书籍中的那些观点一一进行了批判。

吕才除在《阴阳书》中对迷信书籍进行集中批判外，还针对当时的主要迷信行为进行专题批判。他作《叙禄命》对禄命思想痛加批判。禄命思想早在汉代就已普遍存在，到唐朝时信命者达到十有八九。谁人不看相？哪个不占卜？不批“八字”（批“八字”就是将出生年、月、日、时，以天干地支记时法写出，便是八个字。以迷信的规则对其拆解，得出吉凶、祸福等结论，此过程便曰“批八字”。）不能谈婚论嫁。出殡也要选日子，迷信已成风俗。吕才所著《叙禄命》以几十位历史名人的算命结论与具体历史事实相反的铁证，剥出了禄命之说的荒谬。举例秦始皇，以“禄命生成说”秦始皇生于壬寅正月，“命当背禄，法无官爵”，“法合长寿”，其实，秦始皇贵为天子，生命只有五十岁；又举汉武帝为例，他生于乙酉七月七日，依禄命生成说“少无官荣，老而方盛”，其实，武帝十六岁继位，老年后社会动荡，户口减半。另外还列举了鲁庄公、北魏孝文皇帝、南朝宋高祖刘裕等悖于禄命生成说的事例，以历史事实，揭穿了“禄命生成说”的荒谬性。

吕才还著《叙宅经》、《叙葬书》，以可见的现实，精辟的论断对“风水论”进行了解剖和批判。

无神论者与有神论者的矛盾是不可调和的，其之间的斗争是在所难免的。吕才与宗教徒之间的冲突也

就是必然的了。

唐朝处在神权治国治民的高峰时代，皇帝亲自推崇佛教和道教。太宗封去天竺取经的玄奘为御弟，取经返回后，全国掀起了信佛高潮。各地大造寺院（高唐大觉寺和兴国寺的姊妹塔便是此时尉迟敬德所监造。）广收僧徒，到处论佛道，昼夜闻诵经。将玄奘树为神一样的偶像。全国上至天子，下到黎民，都是佛的崇拜者。统治者与被统治者在佛的问题是统一的，绝不允许有人对佛讲一个“不”字，对神有半点疑惑！吕才的文友傅奕，因反佛遭到无情打击和恶劣诽谤，时论认为“地狱所设，正为是人”！吕才未被残酷的现实吓倒，在唯物主义思想指导下，保持清醒无畏的科学态度，利用广博的自然和社会科学知识与有神论者短兵相接展开了一场为真理不惜乌纱、捍正义不怕丢头的战斗！公开举起反佛大旗，表示与佛界人物“内外不同，行已各异”。

唐贞观年间，玄奘率弟子先后翻译刊印了多部佛教经籍。吕才读过玄奘译刊的《因明入正理论》和《因明正理门论》及其弟子神泰等人著的《〈因明〉义疏》后，作《因明注解立破义图》三卷，对上述三部佛书“作解毁之”。于是“言戏之间，是非锋起”。玄奘的亲授弟子神泰、靖迈、明觉、慧立、明浚等沙门名僧，撕破“幼少之旧”之情面，群起而攻之。吕才孤军反击，论据充实，“战不息戈”。连对手慧立也不得不说吕才“或媒炫公卿之前，或嚣喧闾巷之侧”，“不惭颜厚，靡

倦神劳。再历炎凉，情犹未已。”表现出了不屈不挠的反佛精神。

单枪匹马的吕才越战越勇，摩肩接踵的僧徒底气不足。本是思想学术类的争论，有神论者不得不向权力求援了。慧立致书左仆射于志宁，斥吕才大逆不道，太常博士柳宣也劾吕才妄举。吕才被迫直接上奏高宗，愿当天子面与玄奘辩论，矛头直指佛教的最高人物。高宗不是无神论者，但崇赏儒学的“忠君”“礼教”；亦不是虔诚的佛教徒，但需要“认命”、“报应”等愚民的手段，故辩论双方的胜负皆不会引发高宗严重的切肤之痛痒。不久，高宗下诏，准吕才与玄奘在慈恩寺对定（辩论）。

永徽六年孟秋一个天高气爽的午后，慈恩寺大殿前台上搭一黄缎高棚，内设长案，高宗坐在案后龙椅上。左为慧立、神泰等八位名僧坐在铺坛上，表情均有些紧张；其右有翰林史官等数位侍从垂手而立。离大殿前台不远处的左方由四张方桌拼成一小型方台，玄奘坐在一有雕刻的短腿小方床之上。他头戴功冠，身披袈裟，项挂佛珠，两手合十，双唇启闭无声，喉结上下滑动，正在排除红尘干扰专心打坐；相对的右边，亦是同样的台面，其木椅上坐着的正是方面大耳、身材魁梧的吕才，他姿态从容，神情镇定，双眼稍眯，略露笑容，习惯地捻着上唇上的胡须。

沉默、肃静、等待……

“时刻已到，对定即始！”随着高宗的一声令下，旁

出一侍从，双手展字绢大声呼道：“御制论题：阴明”。这题对辩论双方来说都是熟题目了。玄奘先解辩后发难，吕才先接招再诘问；玄奘依仗自己所译“阴明”诸著作申述观点，吕才则在唯物主义思想指导下，利用广博的知识和社会现实进行批驳，唇枪舌剑战至黄昏。高宗只听得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难分难解。但为维护统治者利益，只得糊涂结论曰：“法师言妙，吕才误会”。一个以佛经为真理标准，一个以儒教为真理标准，尺度不一，无法评说，怎么会定得了胜负？重要的是这场擂台辩论是历史上规格最高、影响最大的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无神论者与有神论者的面对面的争斗。

吕才为真理争到了地位，为高唐带来了骄傲，在历史的长廊中塑造了古代鲜见的唯物主义者的光辉形象。

吕才墓是高唐县古今二十景之一。

吕才情倾秃大妮 棒打不散留美名

清平镇吕庄一带，关于吕才的轶闻趣事、古老传说颇多，其中有两则流传最广，影响较深。

一则是修改历法。唐初所用历法是汉朝所制，年久缺修，舛误甚多，故唐太宗命吕才修改。吕才早对天文规律有所研究，再联系四季气候变化的实际，只用一天一夜时间，就将历法改毕。皇帝随即颁发全国。历法中二十四节气的特指含义正与齐鲁一带相当，与鲁西北地区吻合。“三伏”最热，“三九”最冷；“芒种”正是夏收夏种，江南此半月之前已收麦，东北一月后方开镰；“霜降”之时准时下霜，江南两月后见霜，东北一月前已下雪；这正是吕才在修改历法时结合家乡气候实际的结果。

另一则传说是吕才与秃大妮的婚恋故事。

清平一带有一地方歇后语：吕才与秃大妮——棒打不散。

吕才家庭原不宽裕，祖辈过着男耕女织、勤俭度日的生活。不过吕才的父亲相信学文化能摆脱贫困，便节衣缩食供吕才读书。少年的吕才，不但身高体壮、俊秀出群，学习也很争气，在同龄学童中，吕才一直名列前茅，且有博览群书之癖好。有一股他人不具的好

奇、求解、弄懂的钻劲。早在庠序之时，除完成所学课业外，还涉猎乐、艺、天文、地理、历史等所及的各种各类学问，是学童中出类拔萃的人物。

十六岁这年，在邻村皮庄就读。很快便成了皮庄村人人皆知的少年才子了，自然引起村中那些有财有势的绅士们的注意。有适龄女儿者，便动了招为东床快婿的心思。于是上门允亲者甚众，均被吕才设方让父母婉辞了。唯独皮庄东南街宋氏之女青儿未被拒之门外。

青儿当年十五岁，天生丽质，端庄秀丽，是全村会理家、会处事的巧姑娘。在吕才上学的路上，有意无意的两人经常相遇，虽无语言交谈，但见眼神流转。久而久之，两心相印，悄悄地坠入爱河。一经提亲，双方同意，很快便定了秦晋之好。

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不料，青儿在十七岁时，突然一场大病，满头青丝一夜脱光。请遍医生，想尽办法，结果仍就是根发不见。巧姑娘变成了秃大妮，从此，知其真名者渐少，秃大妮成了青儿的大名。吕才与青儿是真心相爱，在看病过程中，吕才给予了很周到的关注和宽慰。怎奈青儿自惭形秽，觉得配不上吕才，便主动提出毁约退婚，劝吕才另寻佳偶。吕才并非随意移情之徒，决心与青儿厮守终生。

这年春末一个晴朗的清晨，青儿包好头巾穿戴整齐，在上学路上迎到吕才，提出陪她走走，两人信步西行。吕才欣赏着青儿的美丽说：“你今天穿上这身淡绿

色的新衣服更加漂亮了。”青儿抿嘴笑了笑说：“你能再用你创造的‘尺八’吹你编的那首《农乐曲》吗？”吕才顺手从书袋中掏出“尺八”吹了起来。两人沉浸在快乐中。曲停之后，青儿又说：“请遍了名医，踏遍了药铺，头上药膏涂了一层又一层，不见病情好转。近几天头皮日渐肿胀，其下痒痛难忍，病情加重，已无治愈希望，你还是早寻伴侣吧。”吕才急切相劝：“我想办法，一定将病治好，万一不治，我们也将一生在一起。”

一个忍痛断情，一个信誓旦旦。

走上村西行水河的木桥，青儿突然停下脚步，一改羞怯慢语常态，严肃决然地对吕才说“我不能误了你，才君珍重！”急行两步跨过桥栏，一头冲向河中心的急流，只见淡绿色的上衣随浪翻动几下，不见人影了。吕才只守男女授受不亲之规，始终与青儿保持一定距离，虽然急驱向前也没来得及抓住心爱的青儿。吕才忙回村喊人来救。几十个水性好的汉子，闻讯赶来，跃入河中，摸捞了半天，一无所获，吕才只是望着水深浪急的河水发呆。

前一年大雨，这条行水河，水漫东堤，造成两府四县受灾，损失惨重。重臣温彦博受命沿行水河巡视，酝酿治水奏章。这天正在官船上观察堤岸，船行至木桥以北，忽见一绿衣身影随水顺流而下，直冲官船而来。温大人马上命船工停船打捞。非常顺利地将青儿拉到船上，经抢救，慢慢苏醒过来。在吕才还未回到岸边时，温大人已命官船速速顺流返回。青儿被几个女侍

从拥在船舱内，她一身串亲时才穿的土式礼服，一脸黄白色的憔悴面容，满头乌黑不及半分的超短发，颤颤的紫色嘴唇欲张又合，疑惑的眼光在周围人身上转来扫去。

“我还活着吗？这是哪里？”青儿终于开口了。

“这是官船，是温大人把你救上来的。”女侍从们众口回答着。

“救我这个秃姑娘干什么呀！呜——”青儿又哭起来。

“还以为你是出家的尼姑哩，这不是有一头短短的黑发嘛！为什么自己说是秃子？”众人七嘴八舌地说着。此时温大人另有解释：“可能黑发早已形成，被因外治敷药弄得坏死的一层表皮蒙盖着。经河水撞击冲刷，表皮脱掉了，露出了一头短发。”青儿听罢，用手一摸，竟然当着陌生人的面，一跃身跳了起来，憔悴的脸上充满着笑容。

青儿随温大人进京。温彦博及其夫人甚喜青儿，便将其认为义女，自此青儿过起了官宦之家的豪华生活。

几次冬过春来，青儿年及二十一岁了，青春使她更妩媚，教养使她丰富了内在风韵。这年开考，各地学子从四面八方蜂拥至京。东路赴京的学子中当然有吕才，他今年已二十二岁了。因首次参考，被那阵势吓得仁魂跑了两个半，发挥不佳，名落孙山。吕才不灰心，不气馁，决心下次中榜。他在回乡的路上，用自制的乐器“尺八”（因制成后，器长一尺八寸，遂命名为尺八，此

乐器当今日本仍盛行)吹奏自编的《农乐曲》，边吹边走，自赏自乐。此时恰逢温彦博下朝归府，在青顶轿内听到乐声，勾起一件心事：皇上让寻懂乐之人，意欲修增礼乐。苦寻两句，未得人才。这乐声圆润悦耳，曲调婉转传情，是何人所为？手挑轿帘一望，见一学子边走边吹，曲传心声，悠悠自得。便喊一声“停轿！”真是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功夫！

自此，吕才便成了温大人家的门客。按大人之意专攻曲乐。斗转星移，白马过隙，几年过去，吕才被推荐入朝面见天子，召直弘文馆。经吕才改增的宫廷音乐很快使天子满意；已淹周武帝三局象经，经吕才挖掘，圣上又多一玩趣；谈地理善制图；说天文会修历；懂军事能布阵；通历史，撰《隋书》，吕才成了多能学者。于是提亲允女者不绝，只是那位跳河的青儿仍然占据着吕才心中的那方婚恋宝地，容不得他人侵犯。

这年仲秋，温彦博的后花园中，月亮刚刚爬上楼顶，在此赏月的温家宝眷，便举杯赋诗热闹起来。酒至半酣，温彦博突发异想，便“叫吕才到后花园来吹奏一曲。”话一出口，使宝眷中的义女青儿全身抖动一下，“吕才”二字敲得她全身战栗，大家闺秀的涵养马上将情压盖得严严实实。不过心中不住地祈求：是他，一定是他，千万不要是重名……

吕才在温家几年，从未进过后院。此时在仆人的带领下，过长廊、跨小桥、绕假山、傍花圃，来到后花园。在温大人的安排下，吕才于众人面前坐定，不敢正视

温家眷属，眼睛望着天空的圆月，拿出“尺八”，激情奔放地吹起了《农乐曲》。这飘逸潇洒的身影，这熟悉的“尺八”，这动听的《农乐曲》，使青儿回到了清平皮庄，回到了吕才上学必经的路口，回到了堤上的曲径，回到了亲人的身边。她突然站起，又慢慢地坐下：吕才娶妻没有？另有心中人了吗？……

过后经话头语尾、旁敲侧击地打探，青儿终于得知吕才尚未娶妻，且无意中人。便冲决羞怯的罗网，向温夫人道出了自己的心事。此时，温彦博夫妇才恍然大悟：怪不得青儿一直拒嫁，吕才不娶呢？原来他们在相互等待。于是温大人为他们举办了婚礼。两人的喜出望外、如痴如狂的感情交流在此不再多陈。

婚后，吕才携夫人回吕庄探亲拜祖，当人们得知这对有情人终成眷属的曲折故事后，便广传为佳话。久而久之，将故事锤炼成一句地方歇后语：吕才与秃大妮——棒打不散。

在吕庄坠地问世 于故里仙游升天

吕才于隋文帝开皇二十年（公元600年），出生于山东清平县吕庄（当时村名为平房吕庄）。唐高宗麟德二年（公元665年）去世，葬于吕庄祖茔。吕才是清平县吕庄人应不存异议。1956年3月，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调整行政区划，撤消清平县制，将其属地分别划归临清和高唐两县。吕庄所在的原清平县第一区（亦称旧城区），成为高唐县属地。自此，吕庄隶属高唐县。吕才的籍贯也就别无二说地成了高唐县清平镇吕庄了。

1956年前，包括《旧唐书》、《新唐书》和1921年商务印书馆出版的《中国人名大辞典》在内的所有书刊，对吕才的籍贯一律正确地记载为：“山东清平县”。1956年后，因原清平县大部版图划归临清县，因此，有些人误以为吕才成为临清人。1985年，山东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刘蔚华和赵宗正主编的《山东古代思想家》一书中的蔡德贵撰文的《吕才》中，就将吕才写成“博州清平（今山东临清）人，给吕才的籍贯人为地制造了第二个版本。步其后尘，山东友谊出版社1989年出版的《聊城风物》、1990年出版的《东昌古今备览》和1991年出版的《鲁西名人传略》中的有关文章，均沿用《山东古代思想家》一书中对吕才籍贯的误述。同是黄帝

之后，共沐祖先之光，不争吕才何县人，只怕舛说传后世，为纠其谬误，先后由高唐县政协文史科、史志办公室和地名办公室，分别组成专题小组进行调查，再一次确认了吕才是清平吕庄人。

1991年12月，由高唐县政协文史科（今文史资料工作室）编印的第六期《高唐县文史资料》中《才子吕才》一文之中，明确交代吕才是“高唐清平镇人”；1987年4月，由高唐县地名办公室调查撰文、1990年10月，由清平镇吕庄村委会刻立的吕庄村名碑碑文为“吕庄原名平房吕庄，解放后省称吕庄，建村年代当在唐朝以前。清平县志载：唐朝贞观年间，吕才擢累太常博士，吕才系此村人，其墓地在村南。居民有吕、王、马、车、丁、张、赵等姓。”

1996年由齐鲁书社出版的《高唐县志》第九编《人物》中，关于吕才的记载为：“吕才（600——650），今高唐县旧城镇（清平镇）人……”该志稿早在1991年就由省地两级有关部门及著名专家教授审查通过，准予付梓。当时审查会在高唐召开。由地区史志办公室组织、省史志办派专家指导，包括《聊城风物》、《东昌古今备览》、《鲁西名人传略》的作者及临清有关人员在内的地区各单位和地区各县市有关领导及专业人员参加，评审会对《高唐县志》有关吕才的记述给予认可，没有提出任何异议。为此，《聊城市志》（地区）出版时，将误记籍贯、在历史上有重大影响的吕才的材料抽出。此后，1998年由山东人民出版社出版的《聊

城人物大辞典》对吕才籍贯有了准确的记载：“吕才（600——650），博州清平（今高唐县旧城镇）人……”。

时至2002年，中共聊城市委办公室编印的《聊城市情手册》中，又将吕才误为临清人，高唐县不得不由政协、党史委再次组成专题小组进行调查，再次得出吕才是清平镇吕庄人的调查结论，此将有关资料再次陈述。

一、1956年划归高唐前的吕庄一直属清平县，其隶属关系从未变易。在吕庄东有五个村庄之隔、位于清平与博平交界处的明灵寨（后为清平县治所，今是清平镇政府所在地），在宋朝时隶属关系曾有变动。据《清平县志》载：宋熙宁二年（公元1069年），“割博平之明灵寨来属”。

遍查史籍，查不到明灵寨为一级辖领机构的记载，也查不到明灵寨的管辖范围与当今清平镇相同的明文，更查不到吕庄是明灵寨的组成部分的叙述。所以，明灵寨就是明灵寨，只是明灵寨。宋时的明灵寨与当今的一级政府清平镇不是一个概念。明灵寨的变迁与吕庄的隶属关系无关。绝不能将明灵寨视为清平镇，更不能将吕庄与明灵寨混为一谈。宋时，由博平割予清平的只是明灵寨，并不含吕庄。吕庄一向隶属清平。

二、清平镇吕庄东南有唐太常丞吕才墓。1947年前，每年春节尚有较盛大的祭祀活动。原封土高大，墓前有神道。水无恒势，地无常形，久经风沙侵蚀及1958年平整土地之后，封土成缓坡，神道已淹没。但墓址可

见，地下部分仍在，可供动土考察。

1958年修引黄支渠时，曾在吕才墓前神道处出土一对石羊，经专家鉴定为墓地神道专用石雕，系唐时所制。此为墓主是吕才的又一物证。现石羊已流转 to 聊城古楼北路西汇宝商行，再未转手，并有彩照，可供鉴定。

吕氏原有祖传家谱，除对祖宗分辈记述较详尽外，对祖茔墓位亦有图示，其中轴偏南的墓位图上标名为吕才。另有异地为吕才修庙建祠的“三庙六堂”的记载。可惜，“文革”之中，吕氏族谱毁于一炬。但吕氏后人至今仍记忆犹新。

三、吕庄所居吕氏家族皆为吕才后裔。今在世的吕长海、吕长河、吕长洪等“长”字辈人，按家谱之序是吕才的六十五代传人。至今一提起吕才，其自豪、光荣之情溢于言表，开口“祖宗吕才”，闭口“吕才先祖”，为是吕才的后代感到骄傲。他们当得知有人将吕才误为临清人时，便非常诧异，严肃地表示：吕才是吕庄吕姓的先祖不容置疑。自古以来祖宗的天堂是圣洁的，绝没有假冒者；阳间的社会虽然芜杂，也不会有人无缘无故地歪曲历史去争当外族人的子孙。

四、吕才的夫人娘家在吕庄邻村皮庄。这一带关于吕才的传说甚多。其中吕才奉命修改历书，只用了一天一夜的时间便编成了二十四个节气和娶秃大妮为妻不离不弃的传说影响最为深广。甚至将传说锤炼成地方歇后语：吕才与秃大妮——棒打不散。

历史就是历史，谁也无法改变。吕庄从未隶属过临清，更未隶属过博平的明灵寨，这是不容置喙的历史。吕才是高唐县清平镇吕庄人，是不争的史实，亦是客观的现实。

石羊出游记

1958年，为引黄水灌溉，高唐旧城公社（今清平镇）组织开挖五分干渠。吕庄、桑庄、老官庄的公社社员参加了这一筑渠工程。五分干渠在吕庄南由东南向西北延伸。在吕才墓南约五十米的工程段上，东西相距约十米的两处掘出了面相对、貌相同的两个卧姿石羊。石质坚硬细密，头背等向上处非常光滑，个头较大，体态丰满。按其出土位置而论，确为吕才墓前神道两侧的石雕。

石羊出土后无人收管，随便弃置在工地旁。当年的冬天，老官庄的几个村民将石羊运进村内，安放在张姓胡同南口的两侧。直到八十年代，有人议论：把给吕才守墓的石羊弄来为村民守院，阴阳不分，致使胡同内绝大多数人家不生男孩，香火无继，成为“绝户”。这一生理现象成了石羊获罪的根据，石羊无故遭陷，被翻滚进湾坑。湾坑之内夏水冬涸，水浸日晒，直到1995年，桑庄的于x x找到老官庄时任村负责人的张x x，欲买石羊。此时被视为不祥之物的石羊有了价值，以三百元人民币易主，成了商品。1997年夏天，于x x以千余元人民币的价钱将石羊转手给聊城鼓楼北、路西李树杰为经理的汇宝商行。商行经手人为许恒河。时至2004年9月，石羊再未转手，并有实物彩照，经权威

人士鉴定：确为唐朝之物。这再一次证明了清平镇吕庄东南之古墓墓主为吕才。

曾为高唐获金冠 未给自己谋福祉

金高唐的称谓，源于明末清初。在县名之前多了一个“金”字，高唐便闻名遐迩。这“金”字是由植棉获利所得。

高唐的植棉业，不是由黄道婆在元朝元贞年间自崖州经闽广带入上海，然后北延而到高唐的，而是由印度经新疆踏丝绸之路从西而来。且早于黄道婆棉业一个朝代。国史谈棉业只言黄道婆，这是不公正的。

高唐的植棉业始于宋，延于元，兴于明，盛于清。宋朝时，高唐已有植棉业，且能纺纱织布。可从已发掘的宋朝墓葬及《清明上河图》的画卷中找到根据。元朝时，棉业已经过了引入、试种、适应、改进、获益、推广漫长的历史阶段，使多年生木质棉花，在高唐县成了一年生早熟品种，而且已有大面积种植。到了明朝，高唐的棉农在耕种、管理、收藏等方面已取得了长足进展。植棉面积迅速扩大，棉花产量、质量亦快速提高。《高唐州志》对其有“棉为高唐之恒产”、“货以木棉甲于齐鲁”的记载。高唐上交的农业赋税中，棉花比重也逐年加大。棉农富了，生活提高了，引起夏津、恩县、平原……等邻县人们的羡慕，便纷纷来高唐学种棉花。因夏津县土质与高唐县相近，故棉花质量虽不

及高唐但优于其他邻县，所以植棉业也发展较快。因此，便产生了“金高唐、银夏津”的誉称。

植棉带起了纺织工业的兴起，棉布经营带起了商业的繁荣。靠植棉业富起来的高唐人民，饮水思源，知恩欲报，共寻最早的棉花引种者。最终人们将寻觅的目光集中在一位来时年华貌美、走时精枯力尽，一生独身，名为“花姑”的女性身上。在她住过的地方建庙设坛，与八腊庙的诸神共享香火。这便是为什么唯独高唐县的八腊庙建在城郊之外和为什么唯独高唐县的八腊庙中多了一位花姑神的答案。

不忘本的高唐人，将帮其致富的恩人塑造成心中的偶像，崇敬为庙中的神仙。

现将有关花姑的神话传说总述于此，以示永祭。

很久以前，高唐县户不足千家，人不及万名。这片黄河冲击平原中独具特色的白壤土地，大半荒芜。在一个正月二十八日晚上，正值人们刚刚结束了春节庆祝活动，每户人家正在安排当年的生产意见时，一位玉体仙女在她刚满十八岁的这天，乘一朵祥云而来，降于高唐城郊的一段荒地之中。她于当夜，以棉柴为料搭起房屋，造成家俱修好了围栅。第二天，人们见到一所院落突然出现在荒草蒿蓬之间，并见一美貌姑娘正在忙碌，莫不叫奇。很快便有附近的村姑少女前来相访。但见姑娘身着衣服，非丝、非麻，是一种软柔、舒服、平整、结实之料所制成。穿在身上，既不象丝织品那样贴附垂坠、肌体毕露，又不象麻织品那样硬直板

僵，有失自然美感。再配上姑娘健美的体态和美丽秀雅的面庞，真是漂亮，美极了。

攀谈之间，了解到姑娘所着衣衫之料，为棉纱所织。单线所织者，轻薄飘逸，为裙为带；合股线所织者，挺括无皱，做裤做褂；双经纬所织者，硬而不板，绣披肩、裁围腰。询其价值乃大大低于丝麻。问其工艺亦远远便于丝麻的抽制。众人羡慕了，跃跃欲试，纷纷提出要姑娘帮助种植棉花，教导纺织。姑娘满口答应了众人的要求。

枣树发芽了，姑娘带领众人在开垦出来的土地上播种——“枣芽发种棉花”，接着便是定苗、整枝、立秋打顶——“立了秋把头揪”，秋天收花。从此高唐便开始了种棉之业。棉花收成之后，姑娘便教人们弹花纺纱、上机、织布。姑娘成了当地人种棉纺织的老师，人们尊敬地称她为“花姑”。

每年花姑的生日，也就是下凡之日，即正月二十八日，人们都拥至花姑家，回顾前一年种棉的得失，商量当年种棉花的事宜。棉花连年丰收，人们不但穿戴上了棉制衣冠、铺盖上了棉絮被褥，还以棉花换来了粗细杂粮，过上了自给自足的生活。植棉成了当地人谋生的主要门路。“发家不发家，全凭种棉花”，成了高唐县人人皆认的公理。

高唐人靠种棉织布富了起来，鲁西北的棉业发展起来，鲁西南的人们也便紧跟效仿起来。几十年过去了，花姑的头发白了、背弯了、人老了，她把自己的青

春年华贡献给了高唐县的劳动人民。

又一个正月二十八的夜晚来临了，人们照例来到花姑家时，惊异地发现：花姑身着下凡时的服装，无力地仰卧在床铺上，她环顾一下周围的老年姐妹们，然后伸出双手，抖索着握住近旁一位老妇的手，缓慢而清晰地说道“你们一定要种好棉花，一代一代传下去。你们的儿子成家时，当娘的一定要嘱咐儿子，种好棉花、种棉花、种棉花……，让儿子记住娘的话……娘的话……娘……话……”（至今高唐人称棉花为娘花）花姑安详地合上了眼睛。呼之不应，动之无感了。这时在场的人们隐约听到高空中一阵悠扬的乐声渐去，最后消失在银河之畔。

噩耗不翼而飞。附近村庄的人们扶老携幼，倾巷而集于花姑的院内外，长跪于地，抢地呼天恸哭。随后，为花姑举行了隆重的葬礼。

妇女们牢记花姑的嘱托，在儿子结婚时，总是教导儿子如何立业。为让儿子永记娘的话，种好棉花，故在为儿子洞房铺设的被褥中总是要放进一把“娘花”（籽棉）。这一习俗至今尚见。

第二年，人们便在花姑的住宅旁，修起一座花姑庙，中堂塑有花姑神像。每年的正月二十八日，当地棉农齐集于此，焚纸烧香纪念花姑神，同时祈祷花姑神保佑棉花丰收。据传，此日花姑神塑像若带笑意，则预示当年棉花大丰收，如果脸色阴沉，则表示当年棉花要欠收，当地人则以此决定当年种棉花的多少。

岁月流失，庙塌神无，人们还是在每年的正月二十八日或焚香纸、或摆供品，在各自的庭院中望天致祭，并拟天气的阴晴为花姑神颜面喜忧的变化。因此，高唐便特有了花姑神节，并有“收花不收花，要看正月二十八”的农谚流传至今。

高唐县除有花姑庙若干座外，还于城西郊八蜡庙的八座神像一侧塑有花姑神像。自明朝始每年的正月二十八日，在八蜡庙赶庙会。除祭祀花姑神外，还购置生产用具，交流农副产品，是高、恩、夏、武一带的盛会，此庙会一直延续到1945年。

应当在高唐最冲要之处，立一飞天式花姑神像，做为高唐县的标志雕塑。



能借府库做买卖 敢与寇准争是非

张逊，高唐人，初隶赵匡胤帐下。太平兴国元年（976年），张逊迁任朝中左班殿直，后迁文思副使，再迁香药库使。因朝廷实力强大，诸国珍药贡品增多。象牙、犀角、香药等充溢府库。张逊以“珍异之药，入市贩卖，所得之钱，用济经费”为内容奏请朝廷，太宗允之。当年获利三十万缗，后增至五十万缗。在一千多年前，张逊就有市场经济的头脑，实属难得。雍熙二年（985年），张逊因功迁妫州刺史，兼枢密院事。

兼任枢密院事之后，与曾任枢密院直学士的宰相寇准共事。当时太宗非常信任寇准，将寇准比为唐朝名相魏征。在商讨国事、策定大计时，皇上也常让寇准三分。朝中他臣也便无人能与寇准争辩是非了。张逊参朝之后，为明是非，辨曲直，常与寇准相争论。寇准容不得威武不屈、刚直不阿的张逊，便借西蜀李顺作乱之故，命张逊赴蜀讨伐。张逊不畏，摈弃个人恩怨，以国家利益为大局，毅然出征。经细心谋划，正确指挥，以极小的代价出色地完成了讨伐任务。太宗嘉奖，赠桂州观察使。

张逊为正义不畏权势，为真理不顾仕途，为保国不惜生命和利用条件增值创收的经营心计，正是我们高唐人的传统素质。

不要乌纱要真理 敢为忠良鸣不平

高唐人何彦猷，字叔远，在朝为大理丞，是掌管刑法的大理寺中的一名小吏。南宋绍兴初年，秦桧为宰相，专横跋扈，众臣畏他三分。岳飞巡抚荆湖，湖北刑狱万俟卨受到冷落，怀恨在心，万俟卨便入朝与秦桧合谋诬陷岳飞。岳飞含冤下狱。此时，何彦猷与同事李若朴不怕丢官，冒杀头之险，为岳飞鸣不平，当朝申明：依据法律，岳飞无罪。公然与秦桧唱对台戏。当时朝中敢于公开站出来主持正义、维护法律的只有何彦猷和李若朴两位大理丞。此时，已升迁尚书右仆射的万俟卨在与秦桧密谋之后，劾何、李二丞“挠法异议”“即日罢黜”。

丢乌纱帽是在预料之中的事，何彦猷早有终止朝官的思想准备。自此寓居乡里，再不踏仕途。

风尘未掸救幼树 古槐有灵悼恩人

高唐原城池的无序建设，形成了为世人当做笑柄的“四大怪”，即“北门屯堵无北街，北关设在东门外，水不护城城环水，城中没有十字街”。因下述故事的方位与“四怪”有关，不得不交代一下。

出原城池东门，北转，顺北关大街北行十余丈，街东侧有一古槐，它便是故事的主角。古槐胸围9尺3寸，身高14米有余，遮荫近60平方米。观其枝干荣枯状况，可见此树曾有三次临亡之灾，又三次顽强地活下来。现为高唐的古今二十景之一。

相传，此树有灵性。每年季秋之后，尤其在祭祀节日的深夜，鸡狗入眠，万籁俱寂之时，于此树下或在附近人家的住房内，静下心来，凝神寻闻，总能听到有鬼神自空中过，车马人畜之声一一可辨。还可闻呜呜咽咽、忽高忽低、或促或缓的成群连片的众多成人的低声哭泣。声高时可辨出捶胸顿足之状，声隐时可随之有抽噎屈闷之感。每年从深秋的寒露到第二年初春的清明，哭一百六十多个寒夜。相传至今已哭泣七百二十多年了。任何无耳疾者只要在上述之时之地，均能听到这悲戚的声息从古槐上下传出，这并非梦幻，亦非错觉，更不是所有的几十辈子的人，逢到那时那地

就一齐发精神病吧！况且《高唐州志》中，《海市》条目之下对此亦有相应的记叙。

占槐为何这样长期悲鸣？这要追溯到七百二十多年前发生在高唐驿站的一段往事。

高唐城东门外的北关大街，是自古以来北京通南京的古官道在高唐城区的一段。因地处南来北往交通要冲，使其成为高唐城最繁华最热闹的一条街道。驿站便设在这北关街的东侧。来往信使、钦差、官员在此换马或暂住。

南宋祥兴二年（公元1279年），秋天的一个傍晚，这天正是寒露，北风劲吹，落叶满街。官道上有队元军号衣的骑兵拖着一股黄尘由南急驰而至，停在驿站门前。骑队前后的号衣官兵，将队中间那位须髯长蓄但不蓬头垢面、头发花白却不露衰相、面容憔悴仍气宇轩昂，身着宋朝官袍、年约四十余岁的男子扶下马鞍。从双方态度可见：因长途押解，虽不戴刑具，但肯定该中年男子是这干元军的囚犯。

囚犯名叫文天祥，在南宋官拜丞相加少保，后封信国公。率宋军与元兵战于潮阳，溃败后被元将张弘范所俘。他写有著名的《过零丁洋》诗，“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的警句便出自文天祥之笔下。风尘中的这队官兵便是押解文天祥北上赴京的元军人马。他们早晨由东阿县出发，至高唐时已是黄昏，欲在驿站住宿。

文天祥下得马来，活动一下手脚，只见高唐驿站小

门小户，乃是借一家临街客店改建而成。门前路边一字排开植有六棵国槐，北边的五棵因临近厩门，车碰马啃，矮处树皮全无，枝干早成鹿角，已是生气全无的栓马桩了。南边一棵最小，身如锄柄，高不过丈，叶已落光，不知何故已被连根拔起，歪在一旁，命在旦夕。

文天祥进入驿站之后，一刻未停，路尘未掸，不顾神劳身疲，趁钦差去吃饭之机，从驿站借得镢锹，在差人的跟随下来到街上，小心地将这棵国槐重新栽好，并以碎砖围起护栏，浇上井水后才回驿站吃晚饭。自命难保的文天祥，尽自己所能保护了一棵小树的性命。

夜过子时，万籁俱寂。文天祥仍端坐在独焰跳动的桌旁，注视着自己忽长忽短、摇晃不定的身影，思绪万千：大好的山河……坎坷的人生……为宋朝的败灭而愁，为失去报国的机会而忧，为国为民决心赴难……低吟几句后便索纸提笔一挥而就，写成了《夜宿高唐州》诗。诗云：

早发东阿县，
暮宿高唐州。
哲人达机微，
志士怀隐忧。
山河已历历，
天地空悠悠。
孤馆一夜宿，
北风吹白头。

天明起程，继续北上。祥兴二年底，到达北京。元

世祖或逼或劝，或刑或诱，历时三年，文方武法用尽，文天祥始终未屈，坚不降元。于元世祖至元十九年（公元1283年）深秋就义。

文天祥一腔爱国鲜血化为碧玉永照千秋。他在高唐救植的那棵国槐便成了高唐人寄托对其思念的载体。天旱时有人浇水，春秋季节有人施肥，再无人以其栓马，更无人采叶折枝，在格外的照顾中根深叶茂地长了起来。每年的寒露、春节、清明更有不少人特意前来守着这棵树站一会儿。

斗转星移，随着时间的流逝，槐树逐渐长大了，但人们对文天祥的思念却没因时空渐远而淡漠。专注的思念插上想象的翅膀，与变化的环境多次印证的结果往往出现奇迹：“古槐哭泣了”，“古槐永记救命之恩，为文天祥被害而屈、而悲、而痛哭。”一代一代传下来，一代一代在思考，同时也在寻找声源。慢慢地人们发现了“呜咽”的客观道理。

槐树东临两丈多深的排水沟头。此沟呈喇叭状东向扩展开来与天齐庙湾成为一体，西向逐渐缩小进入槐树下一个高宽各两米有余的砖砌拱形涵洞。涵洞在地下穿过北关大街直连东城门外北侧的护城河。这特殊的地形遇有东或北的风向时，空气由无遮拦的天齐庙湾水面吹向涵洞，气流由广路进入窄口，在涵洞口便发出响声，再加上洞内回声，便成嗡嗡哄哄的声响；遇有南、西风向时气流由护城河入涵洞，同样产生低闷的回声。这便是来自古槐树下的哭泣。此声常年存

在，只因太低太弱不会轻易听到，只有与来自古槐树上的声音合二为一时才会听到。

寒露之后，正是槐叶落光时，秋风吹过无叶的但是密集、多弯、硬抖的枝条时，便会发出比柳梢低沉、比松涛婉转的“呜呜呼呼”的低韵，这便是来自槐树之上的悲鸣。与树下涵洞之声组成超低音合奏，便出现了万众齐咽之效果。

清明之后，槐叶茂盛，有风掠过，叶子翻滚碰撞，发出“哗哗啦啦”的声音，此声盖住了涵洞中发出的声音，所以清明至寒露槐树有叶之时，是不能听到“呜咽”之声的；天亮之后直至晚上，人和物活动频繁，器物相撞、鸡鸣狗叫、车碾马嘶、人际应答……声响鼎沸，压过了古槐上下发出的所有声音，所以白天也是听不到古槐悲鸣的。

不相信这棵古槐会有灵性，但它的标致和象征意义却与爱国精神是连在一体的，早已被认定为高唐重要古迹之一。近几年来，多种原因所致，古槐衰败很快，如果管理不善，又遇不到文天祥式的救助恩人，将会很快失去生命。即使死了，这棵古槐也会在原地永远地站下去，不会倒下！因为它已生长在人们的心中

了。

此故事资料，早在1968年，笔者陪客在槐树南邻冯子亮小店中住宿时先听到其母亲讲述，后又听到居住在槐树附近的马希彦老人讲述，两人所讲故事情节一致，并同称文天祥为“天祥官”，不知其姓为文，也

不知其情始末，只知文天祥是好人，后来在北京被枉杀。因他们认为有迷信因素，从来不敢公开讲这一故事。



仗义执言做中流砥柱 纠误慰冤开平反先河

高唐县城西约十五里，有一村庄，名游家里。村内有王氏家族，系宋朝初期由琅琊迁来。族中有紫衣配金鱼袋者，在宋朝为官为将。金人入中原时，官、将随军南度，其谱牒轶于兵乱，爵谥不复见闻，详情不得而知。有族人名为王善者，留居未动。王善有子名进幼（王懋德之祖父），以孝悌闻名。二十九岁英年早逝。懋德任中书左丞后，封赠进幼为嘉议大夫、兵部尚书上轻车都尉、琅琊郡侯；进幼之夫人薛氏，追封琅琊郡夫人。进幼之长子王祐，字景福（懋德之父），元初用兵江南，奋身戎行，善书记，被推选为丹阳佐使，移溧阳后卒。多惠政。懋德任中书左丞后，赠王祐为中奉大夫和河南、河北等处行中书省参知政事，追封琅琊郡公；王祐妻吴氏，追封琅琊郡夫人。

王祐子懋德，为元朝中书左丞。

宋、元之时，王氏家族官高势大，祖茔建在游家里。经多年营造，占地百亩，坟墓封上高大，松柏葱苍蔽日。立颂碑，设供案，依律建有石人、石马、石羊等石雕分列两旁的神道。神道入口有高大雄伟的进茔石坊，俗称石门。茔地气势宏伟，建造豪华，驰名遐迩，远近百里无人不晓，“石门”成了附近一带的地名标志。比

游家里这个村的名气大多了。知“石门”不知游家里的人与时俱增，久而久之，游家里村就改称“石门”了。

王懋德，字仁父，生于元世祖至元年间，卒于元末至正年间。生得玉亭长身，具有德之容，有诗赞曰：“如珪如璋，令闻令望”。外貌伟岸，洵美且仁，韬略内藏。由宪府御史台中书掾升户部主事，后又任南行台监察御史、内台御史、都省左司都事、御史台都事、河南和燕南廉访司副史。天历初年（1329年），升左司郎中、参议。至顺元年（1330年），改任詹事参议、迁中书、拜治书侍御史。此后又改任淮西廉访使、江浙行省参知政事，又奉召任资善大夫、御史中丞、拜中书左丞。

王懋德，为国为民仗义执言。懋德父王祐任职间，“有窃人衣而偶伤人者”，依例当死。王祐则说：“良民也，迫于饥寒耳，盗已非其初意，岂有伤人之情乎。”故从轻发落。懋德甚受其父影响，在任职行台时，遇海北卫民之乱。懋德认为：“系有司不爱民所致，穷之以兵，不如喻之以理。”宪司如其言而处之，兵不用而叛者服，居者安。在河南任职时，权臣当道，朝中出现许多弊端，如台官多被罗织罪名下狱；对以贪获罪的官吏处理甚宽等等，朝臣都怕引祸及身，无人敢言。唯独懋德奏章斥之，引起皇帝注意，正气得辅，朝廷肃然。

王懋德敢冒丢官杀头之危险，为朝纠错为民平冤。在任淮西廉访使时，提郡县囚犯亲自审问，以诬误得释者六人；原判死罪得减刑者数十人；公示平反者甚

众。敢于将其他命官所定之案重新审理，然后从轻定罪，并开平反之先河，此举真乃前无古人。先帝宁宗常夸他说“王侍卿识治体，有君子之风，廊庙远大器也。”

另外，王懋德善书、工诗，有《仁父集》刊布于世。

元朝元统元年（1333年），蒙圣恩褒赠三代。懋德妻张氏，下邳人，封琅琊夫人。懋德子克修，任秘书监著作郎。

现今王懋德墓尚在，神道上的石人还存。是高唐古今二十景之一。



慷慨倾囊解人困 以德获恶心无悔

高唐人豪爽正直，不奢侈，也不吝啬，不见钱眼开，亦不挥金如土。

《滕县县志》上有这样一段关于高唐人品格的记述：晚清时，滕县一巨贾，赴东昌营货。由于山陕会馆出人相助，顺利地將货出售给山西商人。只用两天时间便货出手，钱进兜了。营商得意，心情愉快，一时兴起，便手牵坐骑，肩背巨洋，出得小店门，要选名寓住宿。转过鼓楼，见路南有一车马大店，足有八尺宽的双开大门之上高悬一黑漆横匾，上书涂金四字“东昌大店”。滕商脚刚入门槛，便高喊：“店家，我要住那套院内的上房！”他曾多次住过此店，只因店价较高，故带货时只住城内小店，携钱时便要住这大店的套院了。

“你是滕县的大商户，是敝店的老主顾，理应让你住上房。只是北房已在昨天就由一高唐棉商住进了，你就屈尊住东屋吧。”店家一脸的抱歉表情。可这滕商真是财大气粗：“我能比高唐棉商多付一倍的房钱！”

“我们店家不能不讲道理……”店家又换上了无奈的脸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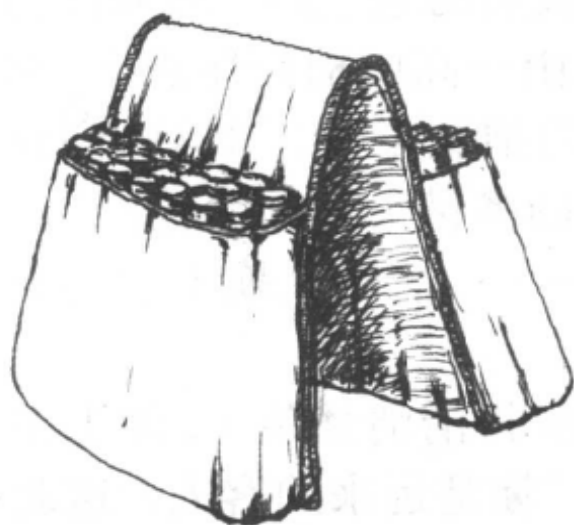
此时，高唐棉商在屋内已听得清清楚楚了，便走出屋门，面对台阶下的滕商道：“你是远来的客人，这北

屋就让给你住吧！”又面对店家：“帮我把行李移到东屋去！”

店家点头哈腰地去收拾行李，滕商昂头高视地进了北屋。

第二天拂晓，滕商与店主清了帐，骑马挥鞭登上了回乡的路程。店家不失时机地对高唐棉商道谢后，请其迁回北屋，棉商进了北屋卧室，突然发现一钱褡子立在桌上。两边褡兜中装满了由牛皮纸卷封的银元。这正是前一天滕商背着的那条钱褡子。定是滕商归心切，走得慌，忘记带了。棉商立马喊来店家，当面查清银元数量，并让店家将钱数笔记在流水帐后页上。然后提起钱褡子走出屋门，喊一声：“牵过我的马来！”

快马加鞭追出四十余里，眼看要到东阿县城了，才远远望见那滕商挥鞭摧马地急奔，马后扬起一股黄尘。距离逐渐缩短，能听到滕商在马背上随着马蹄起落，一顿一停地喊着梆子腔。在棉商撕破咽喉的吼叫中，滕商停了下来。露出了满脸的疑惑。



“你丢东西了没有？”

棉商盯着滕商气喘吁吁地问。

“马在胯下，衣在身上，何物可丢？”滕商漫不经心地反问道。

“你看，这是什么？”棉商突然从鞍套中掏出钱褡

子，双手举起来，上下托动着。只听“哎呀”一声大叫，滕商滚下马来，对棉商先作揖，后欲跪，棉商急下马将其架住，同时顺势将钱袋子递过：

“查一查，看数量对吗？”

“对！对！分文不少！”滕商没查，便从情理和诚信中感到自己的回答绝对正确。一袋子银元有数，这追赶五十里的情谊无法计量，这免于家破人亡大祸的恩情无法计算！

“今后要谨慎，再见了！”棉商翻身上马，扬鞭返程。此时傻傻的滕商望着棉商的背影醒悟似的大声问道：“你叫什么名字？”

“我是高——唐——人！”随风飘来短短的回答。

“他是高唐人，恩人是高唐人。做了天大的好事也没留名……他比我富有，不只是钱多。”滕商小声嘀咕着，牵着马慢慢走在官道上，品评着刚刚发生的事情的味道。一脸的敬仰，满心的佩服。

这段史实来自《滕县县志》，滕商没问出棉商的名字，笔者也就无从获知了。这一史实表明了高唐人对钱财的传统观念：“不义之财不能沾”、“属于别人的不能要”、“自己的劳动成果要维护”、“别人有困难时倾囊相助，为朋友两肋插刀”、“施恩予人，不期回报”。棉商与滕商的故事虽是个案，但能代表高唐人的品格。在高唐的历史上就曾发生过两则关系到高唐全县人民经济利益的真实事件。

据《高唐州志》载，明朝代宗景泰初，因临清遭水

灾，人、财损失巨大，使漕运偶遇困难。当时高唐丰收，便主动协济临清船夫二百七十人、银一千七百两。翌年，临清经济已复苏，但不愿承担应份之责，故高唐一直照额协济。时过一十八年至成化二年，协济之累仍然未除。是年，又因濮州水灾，田禾无收，应纳钱粮无有着落，困难程度远远大于临清，当时高唐又是大丰收，便又暂替濮州纳粮一年。不料因循成例，自此开始，在协济临清的同时，替濮州纳粮，濮州乐得巨利，高唐由双粮变成三粮。

协济临清之事，直到孝宗弘治十三年（1490年），陈良珊调任高唐知州后，具状当朝，方获悉数蠲免。自景泰初起至弘治十三年，计代临清出役纳粮四十年。高唐人的慈心并未因此受到创伤，只要能担得起，便会向他人伸出援助之手，仍替濮州继续纳粮。

高唐农田，原年纳税二分六厘，为濮州纳粮后，每亩增至三分六厘余。逐年双粮，民困加巨。至世宗嘉靖四十四年（1565年），已为濮州代交钱粮达九十八年之久，其中几遇颗粒不收的重灾年，其应税和代税亦照纳未免，使州民生活远不及邻县。生产不振，人口锐减。是年，州民于宠荣抱本赴控，未果。六年之后，穆宗隆庆五年（1571年），州民孙通又抱本赴控，仍未果。此时曹文铎为高唐知州，也曾痛哭上书，多方申请，并刻鸣冤录以志其事，亦终无效果。究其原因，均为濮州“有力者所挠。”清初，濮州所增丁银，亦由高唐承担。高唐每亩纳丁银增至四分六厘九毫余。到康熙初年，高

唐纳双粮已二百年之久。真乃“以一时之义举，贻百年之永患”。时任知州者刘佑，亲历双粮为高唐民众带来的痛苦，回环往复，百思不得解决办法，便以《代输议》为题书其事由，并将其文载录《高唐州志》，“以待君子”。不料，数百年后，刘撰之文竟成为豁免双粮的根据。

时至民国十七年（1928年），王乃栋任高唐县长。县人李济亭、刘清河以《高唐州志》所载知州刘佑的《代输议》为根据，奔走申请，具状上诉，请为蠲免。旅济同乡武兢民在济南配合各方呼吁，县长王乃栋极力赞助，方使时跨三朝、长达四百六十一年的高唐双粮始得豁免。高唐民众减轻经济负担，获得心理平衡，功在上述诸君。因此，高唐人不能忘记终止协济临清的明朝知州陈良珊，更不能忘记清朝知州刘佑和民国年间的县民李济亭、刘清河等人。

此将有关豁免双粮的三个重要文件录后。

知州刘佑代输议

本州条银原额，每亩二分六厘。成化二年，因濮州被黄河水害，寸粒无收，钱粮不敷。是年本州大丰，将彼处所欠额项，暂代解一年。此义举也，不意因循成例，以一时之义举，贻百年之永患，每亩加派至三分六厘有奇。时更而法不变，事止而赋犹存，张食李醉，李代桃僵。濮固乐于轻输，唐实苦于重累，势极难返，民

实难支。嘉靖四十四年，州民于宠荣，抱本赴控。隆庆五年，州民孙通等，又抱本赴控。

两奉明旨，着行抚按查勘具奏。州守曹文铎，复上痛哭之书。多方申请，有原刻鸣冤录可查，乃为彼州有力者挠之，事遂寝。苦乐不均，此万世之害也。佑职司民牧，极欲代为申请，乃细查代粮年月缘由，而无清楚确数，且恐徒滋翻复无益也，姑存此案，以待君子。

呈山东省政府文

呈为为他人代解丁粮，积久不返，公怨迟予减除事：窃高唐旧系散州，而州志所载本州条银，原额每亩二分六厘。成化二年因濮州被黄河水害，颗粒未收，钱粮不敷。是年本州大丰，将彼处所欠额项，暂代解一年，不意因循成例，以一时之义举，貽百年之永患，每亩加至三分六厘有奇，李代桃僵，濮固乐于轻赋，高实苦于重累。势极难返，民实难支。嘉靖、隆庆中，州民于宠荣、孙通等，两次赴控，奉旨查奏，均被濮人强有力者阻挠中止。苦乐不均，至于此极！清代藩司旧案，高唐每年代兑一五耗豆一千二百余石，即此事也，名为代购，其实不赏分文。再加征收贡献土产润布等等，故清季每亩丁银竟增至四分六厘九毫三丝有奇，拖延至今未改。近查恩县，茌平，博平，禹城等县，与高唐壤地相接，土质从同，且计亩之数均系二百四十方步，彼处丁银每亩仅三分有奇。两相比较，高唐每亩实多

纳一分六厘有余。值此革命成功，一切平等，青天白日之下，岂容再存此黑暗恶例，应请查照州志所载旧额，每亩仍按二分六厘办理。其为濮州代兑耗豆及贡献等均准一律减除，俾高数百年沉冤，得以重见天日，全县人民，庆幸何极！事关解除民众痛苦，想亦乐于赞同也，理合联名签吁请钧府鉴核，准将高民积年痛苦悉数减除，不胜激切待命之至！

山东省财政厅令文

案奉省府令以据本厅呈复该县民李济亭等呈请以三分三厘为每亩丁银则例一案，奉令呈及州志均悉，既据称邻封五县，每亩自三分五厘至三分八厘六毫有奇，且有州志证明独重原因，所请以三分三厘为该县丁银每亩则例，应准照办，以苏民困。除咨国民政府财政部查照备案外，仰即转饬遵照，并布告民众周知。州志随发等因，尾开合令该县长遵照，自十八年一月一日起，该县田赋，应按此减定则例办理云云。

敢对陋俗举叛剑 勇追郎魂赴黄泉

高唐人果敢、仁厚、勤劳，同时也注重亲情、友情和爱情。此篇叙述的是高唐的梁山泊与祝英台的故事。

征集编写《高唐县志》资料的公告，在县广播电视台台播发五六天后，就收到了百余件的文字资料，接待上门送口碑资料的乡亲亦有十多人。第七天上午，从城北某村来了一位年过七旬、须发全白的老者，要求与笔者单独谈话。谈话从上午九时开始，中午饭时也话不离题，直至下午四时告一段落。走时老者留下一份文字材料。因所谈之事及资料不属入志范围，故将其束之高阁。但其事之理之情，一直萦绕在脑海，不吐不快，故将其文字与口碑资料相互补充，整理成文。因当时答应那位七旬来访者对其姓名与村名保密，所以不在文中提及。至于故事中当事人的姓名已在明、清诸《高唐州志》中多次提到，文中就不再回避。

明末天启年间，在高唐县城北有两个相邻的小村庄，两村居民地靠地，亲连亲，一向和睦相处。其中一村的黄氏家族，地多丁众，读书人也多。有位名黄家相的人，自幼读书，后来随父从医。成人之后他边务农边从医，医术高超，以仁济世，经常施医施药，颇获附近各村百姓拥戴，是城北出名的良医。

黄家相依农从医，家道殷实。长子黄应乾，从事教学，是村中秀才；次子黄应坤，随父学医，接世传之医术。后生小女，取名黄云云，父母的掌上明珠，生得眉清目秀，端庄文雅，聪明智慧，是城北无人不晓的漂亮姑娘。

云云年幼时，性格就争强好胜，在家中说一不二，全家人都宠惯她。她常以哭闹撒娇的抗争方式，获得不守某些家规和风俗的权利。她除随两兄弟学点文化外，常伴随父母做田中活计。黄家的地邻是另一村的李家。李家有一子名曰李胤岐，与黄云云同年同月生，也常随父母去田中玩耍。日久天长，大人成了好朋友，两个无猜之童成了玩耍小伙伴，每逢下田均必跟定大人，每到田野必在一起玩耍。孩童之间免不了有青梅竹马之趣，互送瓜果之谊。

日月轮转，种收交替，孩童渐成青少年，都学有增进，双方常有学问讨论之趣，农活相助之谊。随着年龄的增长，登黄门的求亲者逐渐增多。每次均为云云哭闹而终止。而李家托媒到黄家提亲，云云则点点头。大人也早有所料，故经媒人几次来往便换帖认可，定了秦晋之好。双方家长将云云与胤岐之间的玩伴之火花燃成了男女之间的恋爱之烈焰。虽然思念加深了，却因风俗约束不能经常见面。

见面机会越少，云云与胤岐之间的相思越甚。相思由春到夏，由夏到冬。第二年春节刚过，李家突然派人报信：胤岐去世了！这是青天霹雳，这是天塌地陷！

云云哭得死去活来，痛不欲生，提出亲赴李家吊丧。父母据礼以拒，云云恸哭更烈，并欲自缢。父母只得应允。云云由父母相陪，身着皂衣，头饰白花，赴李家悼念。到得灵棚，云云不顾一切，冲破封建礼教束缚，直奔穗帷之内，抚尸痛哭几绝，所有在场之人无不被感动得涕泪俱下。回家之后，不临镜，不见齿，不吃也不喝，小榻孤灯伴泣声。后在父母苦劝下，才接下所送食物。

胤岐去世后，媒人上门求亲者争先恐后，络绎不绝。州志中写到：“好迷者，户外之履恒满。”均被云云拒之门外。

胤岐西归的第七天，按丧礼应是妻子为亡夫设祭的日子。是日云云至父母面前跪拜后，回到绣房穿扮整齐，卧榻而终。家人扫榻时发现榻下所弃食物堆积盈尺。

应胤岐父母之求，将云云与胤岐合葬与李氏祖莹。人称其为连理冢。

三百七十多年前，黄云云为争自由敢于冲破封建礼教束缚，生相恋，死相随，是可歌可泣的勇敢行为。人们都说：李胤岐与黄云云就是高唐的梁山泊与祝英台。

三百七十多年后的现今，人们自由了，社会民主了，虽然仍倡导感情的专一，反对朝秦暮楚，但再去为丈夫殉葬，那就是天字号的大傻瓜了。

水甘美病毒不侵 土洁净延年益寿

高唐自古为农业县。有马颊、徒骇两条大河从西南入境，由东北出县。土沃水冽，空气鲜净，既无自然吐污，亦无人为侵染。人们生活在绿色环境中，长寿者众多。六十称花甲，正当家主事；七十古稀人，不弃农活；八十、九十者，司空见惯；百岁以上称人瑞，尚能三五成群话当年。全县超百岁同时在世者不低于十人。尤其新中国成立以后，百姓生活逐步提高，平均寿命已由解放前的三十多岁提高到七十多岁了。近些年虽然环境污染之害严重，由于医药条件的迅速改善，营养保健消费的普及，全县平均在世百岁老人仍有三名以上。1987年，征集《高唐县志》资料时，有超百岁老人三名：杨氏，女，固河乡杨庄村民，1877年生人。纺纱织布勤劳一生，年过百岁后，仍坚持家务劳动。不饮酒，不吸烟，性格开朗。与采访后的第二年去世，享年一百一十一岁；薛朝桂，女，梁村街人，1886年生，勤劳俭朴，家人和睦，1987年采访时，岁及百岁，耳稍聋，眼不花，反应灵敏；田氏，女，赵庄田楼人，1883年生，性格豁达，勤俭朴实，饮食规律，记忆力尚好，1987年采访时已一百零四岁，生活仍能基本自理。1987年同时在三世的三位百岁老人都是女性，其寿高亦未能

打破高唐县的记录。

高唐有位男性老人名王连峰，字峻岭，谢里长屯人，明朝弘治元年（1488年）时，寿高一百一十二岁。耳不聋，眼不花，思维敏捷，行动自如，在世之时便创下了高唐的高寿记录。当时高唐同知周祥为其上奏请赐。获旨赐五品，奖“升平人瑞”四字表坊并赐建坊银六十两。此后何日终无记载。王连峰下有一子为千总，两孙分别为五品、六品京官。

为民请愿不惜命 留有美名照汗青

高唐县城以北有个朱楼村，村内居民大部分都姓朱。这朱姓之家是清朝康熙年间兵部尚书朱昌祚的同族。

朱楼村南有朱氏祖茔，原来坟墓封土高大，松柏蔽日，占地近百亩，其间立有御制石碑的墓主便是朱昌祚。因嫡系后迁济南历城，茔地少有人护，日久天长，松林遭毁，石碑淹没，但坟墓尚存，仍是高唐县的一处景观。

朱昌祚，字云门，初任宗仁府启心郎，顺治十八年（1661年），任工部侍郎，巡抚浙江。康熙三年（1664年），加任福建总督。康熙五年，任兵部尚书，总督直隶（河北）、河南、山东三省。朱昌祚心胸坦荡，无私无畏，勇于主持正义，敢于为民请命。将有史可查的三件政事记于此，以释主题。

一、朱昌祚上任闽浙总督之后，正逢办理伪王朱在钺的同谋施普之案。司官依例将施普族属以缘坐（株连）而逮捕，并将其所有财产没收。昌祚冒袒护钦犯依律同罪的灭门之险，据法上疏，其奏文辩明：大清律定：凡谋反大逆，皆凌迟处死。其祖、父、子、孙、兄、弟、叔、伯及兄弟之子，不限籍之同异，男年十六岁以

上，不分老少笃疾皆斩，年十五岁以下，发功臣之家为奴。其母、女、妻、妾、姊、妹及子之妻俱发功臣之家为奴。财产没官。此条专指凌迟正犯有期亲服者，乃缘坐。同时律载细注：其大功（注：大功——表明家族关系远近的一个等级范围。封建社会中，丧事的孝衣〔孝服〕规格、式样，因家族关系远近而有别。由近及远，分为斩缞、齐缞、大功、小功等类。后人便以孝服等级区分家族关系远近。）以下兄弟伯叔及兄弟之子及各妇女俱不缘坐。据此，吕祚指出：施普族属六十余人多大功以下亲，依律不当缘坐。几经君臣廷议，吕祚据理力争，申述再三，群臣认识逐渐统一。此时，全朝方知定鼎近三十年，凡逆犯亲属不论功缞服，只要是兄弟伯叔及子孙侄者皆缘坐斩，妇女财产皆没收归官，所断狱案舛错甚多，冤枉者众也。为此，圣上特旨：将吕祚奏议颁行天下。此举不仅使闽浙一方无辜者受益，且除天下相沿冤狱，使千万犯属或免于死刑之灾，或免于为奴之苦。在历史上被赞誉为：“百世明刑，功在社稷”。

二、朱吕祚在处理违规犯法者时，总是本着“重改过，轻刑罚”的原则，其仁政之声响遍天下。他在任闽浙总督时，部差员外郎蔡音、达里对两浙赋税进行清查，查出拖欠赋税者五万五千余人。半数少地贫困农民。当时严旨定例欠赋者“当分别流徙黜降”。有官的降职，欠粮者流放。因受罚者众，不但要影响官粮收缴，还会引发社会动荡。朱吕祚竟不顾“严旨定例”之

皇威，上疏求赦，获得恩准。史书记载曰：“此举使皇恩不独在两浙，而及天下矣。”

有律不依，上疏辩明；有律不公，上疏改法。上述政事两则，可见昌祚为黎民社稷而不惜生命、刚正不阿的德行。

三、康熙五年，辅政大臣鳌拜，以镶黄旗地亩瘠薄，传旨圈换正白旗地亩及开垦成熟的民田。令朱昌祚与户部尚书苏纳海、巡抚王登联办理此事。朱昌祚不愿做为满足鳌拜等少数人的欲望实行圈地，而造成数十万旗民离乡背井、遗弃祖坟、飘忽转徙、哀号遍野、泣涕难去的违心事。更不愿看到因此而产生的地荒粒绝，社会动荡的局面。故不惜自己性命，毅然将圈地引起的混乱情况上奏圣上，并与苏纳海、王登联共同要求停止圈地。

当时，康熙帝年幼，鳌拜以抚政大臣之威势，权倾朝廷，一手遮天。圈地遭阻便恼羞成怒，将忠良朱昌祚谋杀。昌祚被害后，直隶士民哭声恸天，有士大夫写哀鸣之诗三十章，可见朱昌祚在官民心中的位置。

康熙亲政后，佞臣鳌拜被以律治罪。康熙八年（1669年），圣上特谕吏部：“原任总督朱昌祚，巡抚王登连于拨换地亩时，见旗民交困，有地方之责，其疏奏闻。鳌拜非其职掌，妄行干预，不按律文，诬陷至死，深为可悯！予其昭雪，以示仁恩。”并复朱昌祚原职，赐祭葬，谥勤愍公。并荫其子朱绂四品京官。康熙帝特为朱昌祚书写《敕建朱昌祚墓碑文》和《御祭朱昌祚

文》。此碑文为高唐县唯一的皇帝为悼念臣子的碑文，此祭文为高唐县两篇御赐之一。

朱昌祚“宁为忠死，不为佞生”的高尚品格，永留史册。他是高唐县继华歆之后，在历史电视剧中再现的又一光辉形象。二十世纪九十年代播演的长篇电视连续剧《康熙大帝》中，较真实地塑造了朱昌祚。反圈地这一巨大的历史事件，在中国历史上占有很重要的位置。各种历史著述中都明确地阐明除朱昌祚敢弃命上谏反圈地外，“再无一人敢言者”，这无歧义也无异议的记载，竟被后来播放的电视连续剧《康熙王朝》给篡改了。剧中没有朱昌祚的形象，剧作者不敢删掉反圈地的重要历史事件，便将配角苏纳海硬扮成了唯一的反圈地上奏者。这不但违反了历史事实，也造成了对九泉之下朱昌祚的不恭和对朱氏家族及高唐百姓的歧视。《康熙王朝》已公演多时，其影响已无法挽回，但做为高唐的乡民不能不知道此事的真相。

附：

（一）敕建朱昌祚墓碑文

稽古建业，驱策群力，不吝爵赏，以劝有功，昭示后世，永垂不朽。所以励忠荃甚备也尔。朱昌祚性行纯良，才能敏练。总督三省著有功劳。乃因诬拔地因见民间旗下困苦，具疏奏闻，无辜诬陷。朕甚悼焉，特加追恤，谥曰勤愍。勒诸贞珉，永光泉壤。国典臣谊庶其昭彰，钦哉。

康熙九年五月十一日

(二) 御制祭文

皇帝谕祭原任总督直隶、山东、河南等处地方军务、兼理粮饷、兵部尚书兼督察院右副都御史、正一品加一级、谥勤愍朱昌祚之灵曰：鞠躬尽瘁臣子之芳踪，恤死酬荣国家之盛典尔。朱昌祚秉性纯良，居心敬慎。职任总督，著有劳绩。乃因诬陷，其悼朕怀。特加追恤，遣官致祭。呜呼！宠锡重垆，庶享匪躬之报。名垂信史，聿昭不朽之荣尔。如有知，尚克歆享。

康熙九年五月十一日

(三) 书香宦第

朱氏家族系高唐县之名门。不但有韬能治国安邦的栋梁，还有文能震动诗坛的群贤。昌祚之曾祖父志高、祖父仲卿、父亲美先三世同为光禄大夫。昌祚之兄辈、儿孙辈，多有功名，从政者众，且均有廉能之誉。昌祚胞兄光祚，封儒林郎内阁中书舍人；胞弟宏祚，官至闽浙两省总督、兵部右侍郎兼都察院右副都御史；昌祚之子朱绂，官至大理寺卿；昌祚侄朱彩，官至郧阳郡守，侄朱绛，官至刑部贵州司郎中、广东布政使；侄朱纲，官至福建巡抚，赠兵部尚书，谥勤恪公；侄孙崇豫在朝为官达三品。

朱氏家族的另一特点是满门皆诗人，且多有传世之作。朱昌祚有诗集《绿玉堂全集》；朱宏祚有《记事

诗》、《后纪事》，另有《忠清堂奏疏》四卷、《朱氏族谱》一卷；侄儿辈朱绡有《观稼楼诗集》、《枫香阁集》、《云根集》、《青壑书房诗》、《吴船书屋诗集》，《岭南草》；朱纲有《苍雪山房诗》；朱崇勋有《桐荫书屋诗草》，崇道有《湖上草堂诗》，怀朴有《复斋漫稿》、《桐社稿》、《鹅甫集》、《禹登山房诗》；令昭有《闽游集》、《皇葵集》。

陈一鹏参战收复宝岛 刘全五屯军落户高唐

近几年，“台独”狂吠声紧。台独者，妄想台湾独立也。企图将台湾从祖国版图中划割出局，故意制造台湾与祖国一向疏远的历史，妄想从历史上找到台湾独立的根据。更有甚者，台独分子的头目中竟有人无视大陆亲祠的存在，不顾九泉祖宗的斥责，硬说自己不完全是中国人。可耻！可恶！

几条疯狗的狂叫，只能一时骚扰一些糊涂人的视听，台湾与祖国的血脉亲情是任何力量也割不断的。不谈国际有《公告》、《协定》、《决议》的公认，不举国史省志有明确的记载，只在位不靠海、深居内陆、远离台湾、占地不足祖国领土万分之一的的小的高唐县中，就可轻易地寻到台湾一向是祖国领土的铁证。在收复、治理台湾的过程中，均有高唐人参与并做出了较大贡献。高唐与台湾的血脉关系在历史的进程中不断发展、加深。

在高唐县的历史上，不必远查秦汉三国，不需近找唐宋元明，只要翻开清朝的高唐地方志书，便会看到：

清顺治十六年（1661年）高唐朱楼人朱昌祚受命巡抚浙江，康熙三年又加福建总督管辖台湾。

康熙二十二年（1683年），高唐县城南周楼村陈一

鹏，在清军任左都督时，随水师提督施琅挥戈东海，收复台湾等三十六岛；

康熙四十三年（1704年）高唐朱楼人朱宏祚任闽浙总督，管辖台湾。

高唐人张与木，又名张兴木、张与朱，康熙五十二年举人。雍正七年（1729年），调任台湾府彰化县知县，任期八年。

乾隆十六年（1751年），高唐城南东白庄人氏白世悦，任台湾镇标右营守备。乾隆二十六年（1761年），调任台湾参将。乾隆三十五年（1770年）病故任上。

徐宗干，南通人，进士，道光十三年（1833年），任高唐知州。道光十八年（1838年），荐升台湾道。

道光二十八年（1848年），清平人吕恒安（字寿山，号松龄，历任花翎侍卫、江西南昌营都司、福建汀州中营游击、长福营参将、闽浙都标营副将），升任台湾镇标总兵。咸丰元年（1851年），因病谢任。

够了，够了。只用高唐境内一小段历史中的一小部分历史铁证，便可使“台独”分子在历史面前哑口无言。

本文不对上述史证一一陈述，只叙有关陈一鹏收复宝岛的故事。

陈一鹏，康熙初年已是清军中的参将。康熙七年（1668年），升为左都督，驻守山东东昌府。

刘福，字全五，福建省泉州府安溪县人，他身高力大，智勇超人。康熙二年（1663年）秋，随靖南王耿精忠入泉州港，以克取厦门、金门岛有功提升为游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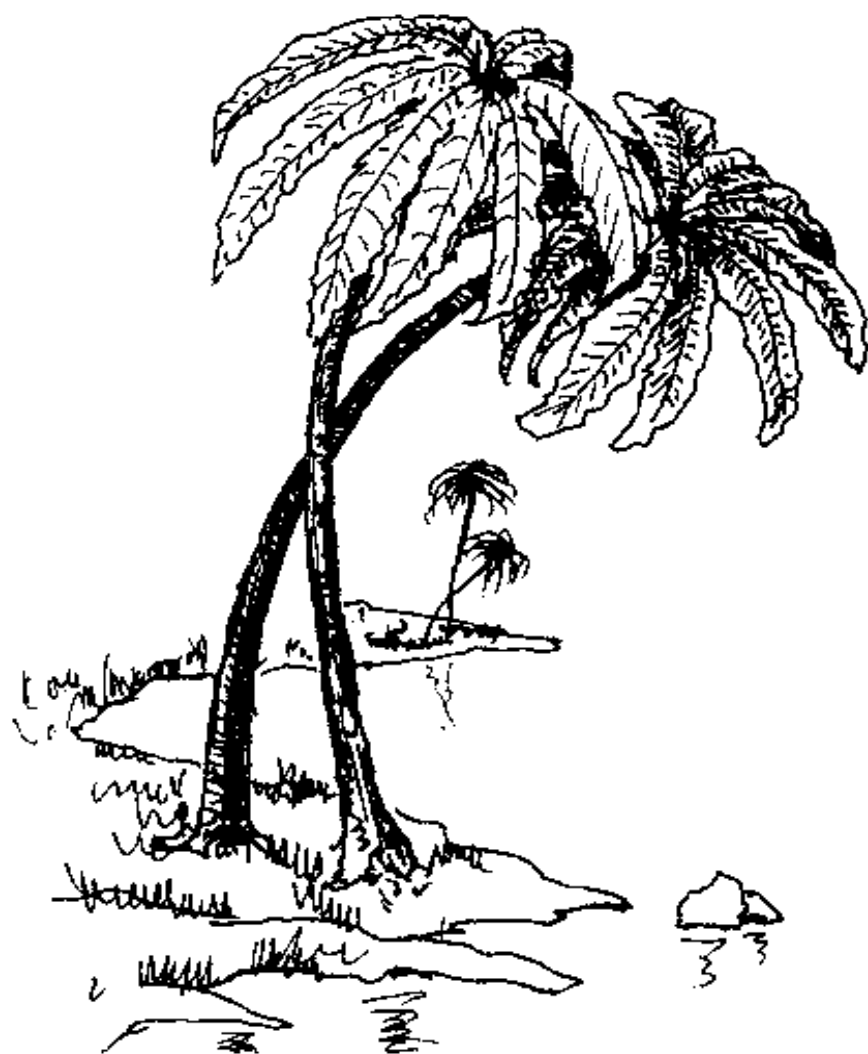
康熙三年，因平南山口有功，晋升参将。康熙七年，奉旨移驻山东，随左都督陈一鹏守东昌。

康熙二十二年（1683年），陈一鹏率刘福等部将，随清军水师提督施琅苦战东海，最后收复台湾等三十六岛屿。使台湾重新纳入清朝中央政府的权辖之下。为祖国统一立下汗马功劳。凯旋回师后仍驻东昌，陈一鹏先受封为哈喇世袭，后封光禄大夫，赠三代。刘福受旨垦地高唐尚官屯。陈一鹏因年老解甲回归故里，刘福仍执戈操矛。康熙二十九年（1690年），刘福再次奉旨镇守古北口，后班师仍回东昌，仍屯军高唐尚官屯。因其屡战屡胜，战功卓著，旨受镇国将军。年老后，请编入高唐民籍，安家尚官屯。现在尚官屯南刘家便是刘福的后裔。刘福辛勤劳作，传授武艺，高唐的“南拳”，便是他传延下来的。他又重视文化教养，其子孙多学有成。刘福九十一岁无疾而终。有子八个，均效忠朝廷，其第二子战死疆场。“文革”中，大部遗物被毁，现仅存刘福及其夫人画像一帧。其十代传人刘公辅，2004年尚健在。

刘福的协将洪圣，福建省长普县洪家大屯人。随刘福由明朝转清朝，南征北战。后又同刘福一起在陈一鹏率领下收复台湾等三十六岛。为祖国统一做出贡献。又一起被封在高唐屯兵，驻居蔡楼。其后又一起北征古北口，大战葛尔丹，有功劳簿十一卷。因功晋爵为绥远将军。康熙年间，战死在张家口。尸葬高唐蔡楼，康熙下旨为其立碑。洪圣下有二子，曰洪谦，曰洪仁。当

今洪氏家族已发展到六十余户，二百多人口。2004年十代传人洪保山已五十五岁，十一代传人洪泰安已五十三岁，洪泰国也已四十六岁了。

洪圣墓砖拱结构，民国初年被盗。1957年因抗旱打井，拆其墓顶。1958年因姜店修大礼堂，拆其墓壁。当今墓址上长有他处不见的一种多年生红草。墓碑被张井村村民做房基修在墙体中。遗物有近一米长的不锈宝刀一把、三刃燕翅矛一柄、铁头盔一个、大瓷碗一个。悉数被县图书馆借去展览。



两代受命督浙闽 台民三届受惠恩

清顺治十六年（1661年），朱昌祚受命巡抚浙江。康熙三年（公元1664年），又加福建总督，巡督闽浙两省。自古台湾隶属福建，向来为福建总督管辖之域。朱昌祚任职闽浙总督不足四年，期间，于《疏奏》、《部议》中查得其为正国法、为民请愿的奏折就有十一件之多，其中有两件涉及到台湾居民生计。

其一：康熙还未亲政时，辅臣议定：为避免海盗骚扰、为有利于收复台湾等岛的战略需要，限期将包括新迁大陆定居的台民在内的沿海居民迁入内地。将原有宅院全部烧光，夷为平地。因此，造成沿海居民失田弃宅、离乡背井成为难民。其惨苦之状实不忍睹。朱昌祚刚刚上任，便单骑访苦，遍巡难民居处，进行抚慰。即刻解囊出资，率属捐赈，解决难民吃住之燃眉之急。随即绘图行文入奏朝廷，请照云南赈例发帑给田，搭盖房舍。圣上照准，包括台民在内的十多万难民获得温饱。

其二：台湾每年纳军粮四万五千担，军粮入仓后，按月供给官军。顺治初裁军后，改纳军粮为折银交付。每担军粮折银一两。另加转输费用和胥吏常例，每担军粮折银增至一两七、八之多。台处孤岛，运输不便，

又无外贩，故每石粮只值银四分，欲售四石多粮才能顶一石军粮的折银。贻害颇甚，民困至极，已无力承担。朱昌祚据实上奏，其弊端悉除，吏静民安。此为朱昌祚带给属民的恩惠。

朱昌祚胞弟宏祚，字徽荫，号厚庵，生于明崇祯庚午年（1630年）。清康熙九年（1670年），选为盱眙县令。四年后任刑部广东司主事。后迁贵州司员外郎，又调兵部督辅司郎中。再升直隶天津道事。晋直隶守道，参议总理八郡钱谷。再受特命巡抚广东、晋都察院右佥都御史。继而署两广总督事。康熙四十三年（1704年），擢闽浙总督、兵部右侍郎兼都察院右副都御史。督抚闽浙的三年间，政绩卓著。在出自翰林院张贞之笔的《朱宏祚行状》中，有这样一段文字：“台湾孤悬海外，土著之民，多业耕猎，往往为奸弁侵蚀，公（指朱宏祚）皆严禁，乃止。”此为朱昌祚之胞弟朱宏祚再次带给台民的第二届恩惠。

朱昌祚与朱宏祚为一母同胞，先后任闽浙总督。他们的下一代、宏祚之子朱纲，继其伯父、父亲之后也受命任福建总督。

朱纲，字子聪，号忝齐。初为兵部武库，武选两司主事。后升刑部江西司郎中。转天津道副使，擢直隶巡道。迁河南按察使、湖北湖南布政使。晋副都御史，巡抚云南，调福建巡抚。尽瘁王事，积劳成疾，年五十五岁而卒。赐葬，谥勤恪。在任福建巡抚期间，为包括台湾在内的属民的安定和富足做出了贡献，且成绩显著。

此为包括台湾在内的沿海居民第三次享受到朱氏家族两代带来的恩惠。

白世悦治理宝岛政绩斐然 康殿惠爱上高唐乐不思蜀

白世悦，字颖亭，高唐县城南东白庄人，年幼时爱武术，青年时便精通了十八般武艺。清乾隆元年（1736年），白世悦三十二岁时，省试考中武举。乾隆四年（1739年），白世悦当年三十五岁，进京赶考，中武进士。其后寄居京旅，见习待委。乾隆十六年（1751年），白世悦持旨赴任福建省台湾镇标右营守备。第二年升为福建省建宁镇标营游击。乾隆二十七年（1726年），升为台湾参将，成为台湾的高级将领。台湾在其文管武治的协理之下，外夷不敢进犯，岛民安居乐业，百姓得以生息，各业迅速发展，社会安定，经济繁荣，人口骤增。白世悦在台湾任职八年，乾隆皇帝八次降旨对其褒奖。一个地方官员，年年受到皇帝下旨表彰，这在整个封建社会中是绝无仅有的。可见清帝对台湾政务的重视，亦可见白世悦业绩的辉煌程度。乾隆三十五年（1770年），白世悦积劳成疾，乾隆帝一方面安排名医为其医治，一方面派出御用画师为其描绘官服生象。无奈，病入膏肓，在任所去世。皇帝降旨：将其尸递运回乡。

于是一场少见的、涉水跋山的远途运尸行程拉开了序幕。

尸殓木棺，索紧封严，装上水师大船，离开台岛万人送葬队伍，开始水上行程。殡船到达大陆码头，水师将木棺交与福建行省官吏，开始了陆地上的逐县递运。两马并立，鞍前鞍后各以一横杠将两马连为一体，然后将木棺置横杠之上，双马驮棺并行。棺前由白世儁在台湾时的侍从康殿惠手擎一高丈余的乌木圆棍，挑着由御画师描绘的白世儁的画像，开始了千里陆地之行。

每遇出入县境，双方均进行交接。半月之后，棺到高唐东白庄。东白村民并州府官员为白世儁举行了隆重的葬礼，将其安葬于白氏祖茔。修《高唐县志》搜集资料时，得知白世儁墓已在“文革”中被破坏。但白氏家族的老族长白凤仪，历经土改、“文革”，顶住了追查、恐吓、揪斗的巨大压力，千方百计地将白世儁的画像及乾隆帝所降的七道圣旨原件保存下来，不但为高唐家藏文物创造了奇迹，更重要的是为台湾与祖国的关系提供了铁证。

康殿惠陪送白世儁遗体到东白庄，本已完成了陪送任务，但他没有立即回台湾。待到白世儁丧事完毕，三期、五期也已祭过，他仍没返回台湾。原来康殿惠来到高唐后，眼见地广土沃，亲历人情温暖，不愿再回台湾，东白村民也欢迎康殿惠留下安家。此后他在东白村民帮助下娶妻生子，子孙相继，繁衍开来。到二十世纪末，东白庄的康氏家族已有二十多户八十多口人了。康殿惠的后裔康岳顺虽年过古稀，但对祖上之事所知

甚祥。台湾与高唐的血脉关系还在继续充盈着。

附：

圣旨数量释疑

根据白世儁任职年限、述职次数和现存七道圣旨内容断定，白世儁应受存八道圣旨。

在白世儁于台为官的第四年，同族兄弟白××，因精神失常，从白世儁家中拿走圣旨一道，揣在怀中，直奔京城而去。到了北京，在紫禁城外大喊：“我是皇帝，为何无人接我？”“我是皇帝——”话未说完被卫军拿下，定为斩刑。几天后，押到菜市口斩首，当刽子手拔下亡命旗时，一道黄灿灿的圣旨从其怀中滑落，监斩官喝令止刑。后经验证，圣旨乃当时乾隆帝所降。故将白××无罪释放。并派专人护送回高唐白庄。但拿去的那道圣旨，却从此再无踪迹。故白氏家族现存只有七道圣旨。

家贫恒心在 香光照夜读

“头悬梁”、“锥刺股”、“凿壁偷光”、“囊萤映雪”，恒学苦读的故事传遍华夏，尽人皆知。高唐县有一个“香光照读”的真人实事，也应世代相传。

杜瀛，高唐城西杜庄人氏，生于清朝道光年间。年幼丧父，母子相依为命。因父病、父丧家产售光，已是一贫如洗了。仍遵父遗嘱，母纺织担起生活重担，子入庠求学进取。母亲五更早起上织机，夜半尚不停纺车，方得母子勉强度日。杜瀛白天就以地面为纸，柴棒做笔，边读边写，学个不停。到了晚上，别人家书生挑灯夜读，杜瀛却花不起灯油钱。但是，穷人就有穷办法。只要决心学习，就一定能克服困难。

一天过午，杜瀛手拿一封敬神用的香，脸上露出少有的笑容，对其母说：“有办法了，晚上你不用摸瞎黑纺线了，我不用等到每月十五前后月光强时再在户外读书了。”杜瀛晚上点一炷香插在母亲纺车线穗的近旁，只凭那点儿蝇头暗火的红光，就看清了线穗的所在方位，比摸黑好多了，线的质量也提高了，这便使此后的家织布好卖了。母亲因受益于儿子，便开心地笑了。

杜瀛也点一支香，左手持香，右手按卷，使香头之

火光贴近纸面，顺字行上下滑动，沿字照读，其动速与诵读相等。夜间能看书学习了！杜瀛也笑了。这种喜悦是从心底发出的。这一晚，这间茅屋中发出了少有的激动的笑声。自己创造的学习机会定会加倍珍惜，杜瀛学习成绩为同龄之冠，道光二十一年（公元1841年），考晋贡生，是当年贡生中最年幼者。

为担起养家重担，更为孝敬慈母，年未及长便应聘任教。在从教过程中，认真研究我国古典汉语，并有独到见解，总其所得著成《文法金针》一书，当时刊布行世，颇有震动。由于认真教学，其门人也多学有所成。其师生情谊也超乎寻常，杜瀛去世后，多数学生画像以祀，并世代相传。据说解放前还有人见过杜瀛的画像。

注：

头悬梁锥刺股——战国时代，有洛阳人，名苏秦者。自幼勤读，后专习纵横学说。出游数年，未得重用。回家之时，身无分文，衣服褴褛，面目憔悴，无功无利，颇受家庭蔑视：妻不下机，嫂不为炊，父母不予。苏秦被激，发奋读书。为防学习中困倦，用绳子将自己的头发吊于屋梁之上。如困倦袭来，使用锥子刺自己的大腿。后因勤学而识广，往说燕、赵、魏、韩、齐、楚六国，合纵抗秦，政绩斐然，终成六国之相。

凿壁偷光——西汉匡衡，山东枣庄人。勤学刻苦，因家贫无钱买烛，乃凿穿墙壁，使邻舍烛光射入，映光读书。后成西汉著名经学家。公元36年为丞相，政绩

卓著，被誉为“一代名相”。

囊萤——车胤，晋朝南平人。恭勤博学，因家境贫寒，无力点灯夜读。夏天，便捉来若干只萤火虫，置一囊中，夜晚借光照读，以夜继日。后官累护军将军，迁吏部尚书。

映雪——孙康，晋朝京兆人。发奋苦读无灯油之费。冬月，以雪光照读。后博学多通，官至御史大夫。

高唐人匡扶正义 太平军纪律严明

太平天国地官正丞相李开芳率骑兵六百三十多人驻守在高唐县城。城外先有清军江北大营帮办、军机大臣胜保，贝子德楞额及田在、田军，后有亲王僧格林沁督率重兵围攻。太平军竟然粮草不缺、火药充足、毫无困难地坚守城池292天。这其中一条主要原因是得到了高唐县人民的大力支持。城中百姓自动出工六百余人，帮其完成了开挖两条护城的深壕沟，使清军“不得近前”。又与太平军一起在城墙之下掏洞，连通城外百姓，及时运送粮食及火药。这在胜保的军情奏折中可获得佐证“迭经拿获剃发出城之贼及将硝磺接济贼匪之奸民，先后正法……”百姓不怕“正法”，冒死支援太平军，被“拿获”的当然是少数，奏章中却夸大称曰“迭经”了。多数高唐人为支持正义抛头颅洒热血无所畏惧。

太平军纪律严明是取得守城胜利的另一个原因。李开芳部进入高唐县境后，只在城北十里铺村东停歇一次，为不扰民，多数将士不进村庄，只在村东的打麦场上停歇吃午饭。为不给村民造成负担，分散到附近四个村去购买熟食。进驻县城后，不欺民，不扰民，买卖公平，秋毫无犯。高唐县广为流传的两个口碑故事

便是太平军纪律严明和公平交易的写照。

1854年夏的一天中午，有一小队太平军在城东张庄完成购买硝磺的任务后，天已过晌，准备回城。无奈烈日将大地烤干，几个军士的汗水几乎流尽，实在太渴了。便就近推开一户人家的大门进院讨水喝。见一口水缸安放在北屋门外东侧的院子中，缸口盖有草编盖子，上扣一水瓢，缸旁叠放两只水桶，担杖立在东墙根。一见水缸，几个军士同时伸出舌头添嘴唇，不约而同地围站在水缸周围。其中一个领头的军士便面对屋门大声道：“屋内有人吗？”

在那兵荒马乱的年头，只要一听到有兵进村的风声，不分是哪路兵，家的小媳妇大姑娘就逃的逃，藏的藏了。该家的女人当然也不例外，军士们没进大门前，早就藏好了。不过猛然听到有人发问，便习惯地脱口回答：“没有人！”

军士们寻声看时，发现回答的声音是从屋内门旁一卷起立放的苇席筒中发出的，一切也便心知肚明了：没人还能回答！人家怕我们，不愿我们逗留。于是，一边慢吞吞地离开水缸向大门挪去，一边嘟噜道：“想喝点凉水，人家不叫喝。”“算了，回去吧！”

听口音，知道这几个人是太平军的人，惊恐已去了大半，席筒中传出话：“水瓢不是在缸盖上么？！”

此话一出，几个军士便马上回身几步到缸前抓起水瓢，你一瓢我一瓢畅饮起来。喝了个痛快，道声谢，带上硝磺返城去了。

第二个故事则发生在第二年（1855年）春的一个下午。

被清军围在高唐城内的太平军，三五人为伍分成若干组，陆续出城去采购马料。其中一组由城东南的地道潜出后，到了金寨村。村民一看是太平军，便纷纷围拢来询问何干？当知太平军欲买麦麸做马料时，便争相送售，很快便满足了军士们的要求。因不是首次交易故没有讨价还价。一一过秤后，军士照数给付铜钱。接钱后的乡亲们一算计便异口同声说：“还是按麦子价给的钱！”“斤称不亏咱，价钱特别高。”

太平军在高唐城内驻守的九个半月里，无论需要什么，百姓总是鼎力相助。太平军也是不扰百姓，厚待百姓。后来有人把太平军这种行为说成“傻”。把不违民意顺从百姓、公平交易、让利百姓说成“傻”的人该好好想一想怎样才是“精”，到底是谁“傻”？

义正词严斥倭寇 殚精竭虑研金石

田士懿，字德宸，号稚庵，1870年生于高唐县田寨一书香门第。清光绪二十九年（公元1903年）中举。光绪三十一年（公元1905年）考入北京大学堂。光绪三十三年（公元1907年）肄业回山东，清政府奖中书科中书，先后在省优级师范、法政、农业、存古学堂任教。宣统三年（公元1909年），改度支部七品小京官，奏奖主事。辛亥革命后，经选拔任巨野县知事。当时社会秩序混乱，恶霸劣绅经常闹事。田士懿创办民团，躬督剿捕，几遇损命，其志不动，社会趋于安宁。后调宁阳任县知事，时宁阳盗匪益狂，上任不久，田士懿便摸清了盗匪与一劣绅连通作案的实情。掌握证据之后，将劣绅逮捕。不料，劣绅先走一步，已将贿金送至省府有关部门，结果，没过数日，士懿便被调离宁阳县，到省属部门任职。

1924年（民国三年），文官考试，士懿成绩超群，签发湖南省任嘉禾县知事。到任后，除陋规，建县署，兴学练勇，政绩卓著。后又调湘潭县任县知事。湘潭为商贸繁华之地，华洋商人难处，是非交涉常有发生，士懿均能处理得当。

民国九年（公元1920年）夏的一天中午，一艘日

舰，由长江进入洞庭湖，继而沿湘江南蹕，至湘潭，欲靠岸入市。上懿得报后，马上派警官率兵至江岸，阻其登陆。日舰旁若无人，强行靠岸，准备登陆。此时上懿赶到，高喊一声：“谁敢登岸，以法绳之！”日舰及其官兵立现定格状态。田上懿进一步大声斥道：“湘江为我中国河川，岸畔为我中国领上，日舰没有任意航行、随便登岸的权利！吾乃湘潭县知事，有捍卫国家领上、维护国家尊严、抵抗异国入侵的义务！事先未接到允许日舰靠岸的中国政府的通知，故不容留！”日舰上的官兵商人等，气焰大消，但舰船仍不离岸。田上懿继而严肃呵道：“将船掉头返航！不然，我们将采取果断措施！”日本人自觉理屈词穷，便灰溜溜地离开湘潭返航了。

田上懿的任迁随着国民政府风云的变化而变化着。1920年冬，卸任，客居北京，工诗画，吟诗词，倾力研究金石文学。收集碑版甚富，并潜心著述，昕夕靡倦。著有《山左汉魏六朝贞石目》，收录了散在山东各地的汉魏六朝碑碣五百零四种，并逐碑诠释。大家柯昌泗为之作序并题书名。此书资料性极强；《金石著述名家考略》四卷，著录了起自南梁直到清代的金石学家七百一十八人。专家王献堂为之作序。该书学术价值颇高。另有《金石名著汇目》、《宋存书室目录》一卷、《金石基录考》四卷、《金石吟呓录》一卷、《增广金石汇目》一卷、《化学丛钞》四卷、《饕墨厂文稿》一卷、《湘游诗草》二卷等作。

1928年，士懿因病由北京迁回高唐，于城内东街临城墙处建有田公馆。除整理文稿外，常与邻里乡亲在墙根下或树荫中促膝攀谈，甚得众人好评。1929年病故，其灵柩运回田寨祖茔安葬，街坊邻居自愿冒雨送葬者长达三里有余。

田士懿，从政不辱使命，执笔成作数卷，彪炳金石学域，是民主革命初期高唐县的名人。

因抗日救国走出学校 为逼蒋表态南下金陵

1931年“九·一八”事变，蒋介石下令“东北军不准抵抗”。将国家的工业重地、黑土粮仓，拱手让给日本。日军一枪未发便占领了东北三省。日军的侵略罪行、蒋介石的不抵抗主义，激起了全国人民的愤怒。爱国热情极高又易冲动的学子们，首先将愤怒转化为行动：放下课本，走出学校，联合起来，游行示威，赴京（南京亦称金陵）请愿。

高唐中学自建校以来，在有共产主义倾向的校长金石兰（高唐县第一位共产党员金谷兰的胞兄）的领导下，在身为共产党员的教师的影响与启迪下，多数学生成为争民主要自由的勇士。因此，县中学成为封建势力、土豪劣绅的眼中钉，于是，他们便以暗杀、绑架等上匪手段，对付手无寸铁的校长和师生。中学的师生没有因校长金石兰被反动派枪杀所吓倒，也没有因继任校长李济亭的父亲被绑架所动摇，而是在斗争中擦亮眼睛，认清了敌我，坚定了立场，与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展开了殊死的斗争，师生共同谱写出高唐中学反帝反封建的篇章，使高唐中学在高唐县的革命历史上一路辉煌。

“九·一八”再次引发了高唐中学的学潮。

日军入侵东北三省的消息传至高唐后，1931年9月25日，由高唐中学发起，联合城内及各区乡的学校，实行全县大罢课，一连四天在城内举行声势浩大的游行示威。同学们手擎红绿旗，肩扛标语牌，高喊“打倒日本帝国主义！”、“还我东北三省！”、“国家兴亡匹夫有责！”、“反对不抵抗主义！”等口号。在游行中，还布设了以要求南京政府迅速出兵，收复东北三省为内容的若干演讲点，使高唐县的绝大多数群众知道了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罪行和蒋介石不抵抗的嘴脸。

11月中旬，得到消息：济南的省立高中和一师领头组织山东省学生请愿团，赴南京请愿，欲当面要求南京政府立刻出兵抗日。高唐中学的学生经过充分酝酿，推选出当时在六级上学的郝炳扬、刘岐岭两位同学为代表，赴济参加山东省学生请愿团。经过多方准备，12月初，郝炳扬、刘岐岭身着全省统一的学生服装，肩负高唐县众学子的意志，到济南火车站集中待行。

当时济南市的最高学府是省立高中和省立一师。两校的学生亲历“五·三”惨案，早已对日寇恨之入骨。“九·一八”事变，仇上加仇，更激起他们抗日救国的热忱。对蒋介石的不抵抗主义也更愤慨至极。故积极组织游行示威、宣传演讲等活动，并领头筹划成立山东省学生赴南京请愿团。

各地学生代表陆续到达济南火车站。所有火车站的公用房舍都挤满了来自四面八方各县的学生代表。

按地区分组，每组选出代表，组成代表团。由代表团选出总负责人。高唐中学毕业后就读于省立高中的张玉泉，被推选为请愿团纠察队负责人。

请愿团要解决的第一个问题是交通工具，就是请派火车。火车站的各层工作人员，早想将这些影响日常营运工作的学生送走，故以为派车不难。没想到几经联系，火车站的领导人推辞不派。当然，请愿团知其背后的内在原因是南京政府在作怪，通过山东省政府进行阻挠。请愿团有请愿团的办法，不去找山东省政府，因为他们不能做主，只会推来推去，拖垮请愿团。于是在12月12日上午，经过严密组织，在十时的特快列车过站后，三千名学生突然冲过工作人员的阻挡，从所有检票口和出站口奔向各路站台。另有一批学生，穿过铁路下涵洞，从铁路西侧返转过来，按事先安排占据了车站西侧所有站台。十一时整，只听一声哨响，三千名学生一齐行动，从站台移位到铁轨上。或蹲或坐，或仰或卧，相互依靠着，学生身体遮盖了车站上所有的铁轨。这片人群的南北两端，各有百余人站在铁轨或枕木上，手执红旗快速摇摆，一刻不停。此时张玉泉正手持红旗站在人群的北端。郝炳扬、刘岐岭随队坐在正对检票口的铁轨上。两人因囊中空空，昨晚和今早已两顿没吃饭了，互相能听到对方肚内“咕—咕—”的叫声，两人只是对视着笑了笑。

车站上的工作人员全体出动，或劝导或恐吓，欲让同学们放弃卧轨行动，但是没有一人动摇。准是调度

科早已与南北有关车站进行了联系，因为自卧轨起，竟没有一列火车进站。

十二时过了，没有一名同学挪动；下午一时过了，没有一人表示不耐烦。12月的白天太短了，也是冬季中最冷的时候，三时刚过，天色就有点暗淡了。一冬无雪，干冷干冷的，顺铁路刮来的北风，从袖口、领口和裤管口钻进体内，争抢着不厚的棉衣下的那点温暖。脚痛了，手麻了，四肢五体抑制不住地抖动。同学们扣紧领口，揣起手，拱起腿，双脚快速交替蹬铁轨，与饥饿和低温斗争，不露半点难色。真正有难色的是南京政府，他们十分不愿意让学生到南京，更不敢让南北交通长时间瘫痪。必须做出二者取其一的痛苦选择。

天色将黑，南北交通的主干津浦路已阻断半天了。经再三交涉站长出面宣布：十五日上午，由济南火车站特发山东学生请愿团专车一列，送全体学生代表直达浦口。请愿团通过斗争获取了赴南京的交通工具。

14日过午，郝炳扬、刘岐岭收到了高唐中学师生募捐的部分货币，缓解了两位代表路途中的低水平的生活支出困难。

15日上午，以编队次序，郝炳扬、刘岐岭按指定的车厢登上了火车。原为十二节车厢的列车，为全部运走三千多名请愿团成员，不得不加挂到三十二节，客运列车长度创下了自有火车以来的记录。一个火车头拉不动，就增加一个火车头在列车后部推，这一推一拉，列车才缓缓开动。遇站必停，有时非站亦停。可能

这火车速度也创下了最慢记录。显然，这是有人在背后使坏搞鬼，想用“久拖”术将请愿团拖垮。在“拖”的同时发现司机情绪不稳，有寻机逃之夭夭的迹象，于是派数人在火车头上监视。火车行驶一昼夜方抵蚌埠。蚌埠的国民党政府以照顾食宿为名，马上派多名官员强行登上火车，其想瓦解请愿团的企图被识破后，所有蚌埠的官员都被赶出车厢。

12月16日过午，火车到达浦口，学生下车，乘渡轮过长江，至下关，进入了南京市。请愿团依乘火车之序，编成二路纵队，慷慨激昂地喊着：“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全国军民团结起来！”、“收复东北三省！”等口号，径往中央大学，住进国民大会堂。

12月17日，包括张玉泉在内的请愿团代表，带着预先写好的《请愿书》，前往民国政府，协商当面向蒋介石请愿的事宜。开始时，政府工作人员坚决拒绝，后经代表坚持意见，最后决定：次日上午十点，在国民政府门内广场，由蒋介石出面答复山东学生请愿团的要求。

12月18日早饭后，请愿团三千名代表，身着统一的学生服装，按原序编二路纵队，呼着抗日救亡的口号，进入国民政府门内广场。纠察队负责人张玉泉，手持童子军棍，站在演讲台边。郝炳扬、刘岐岭则在列队之中的前沿。不多时，蒋介石在戒备森严的气氛中走上演讲台。他眼睛不大，却贼光颇利，速瞄台下众学子，马上发现有异类人员，随即发问：“那个没穿学生

服装的人是干么的？”随行人员答道：“那人是负责救护的卫生人员。”此时蒋介石那毛毛的眼神才趋镇定，那慌慌的神色方渐消失。稍待，便以带有浓重江浙口音的国语开始讲话。不到二十分钟的讲话，充满了奸诈和搪塞。说什么“你们的爱国热诚我十分赞许，你们的来意我深刻地了解。”“要精诚团结，一致对抗日本侵略”，“政府早有策略……但须等待有利时机，不宜妄动，不到最有利关头绝不轻言牺牲……你们稍待勿骚……好好读书储备学能贡献国家，听我号召，一齐奋战。”蒋介石以“等待有利时机”、“不宜妄动”、“稍待勿骚”明确地拒绝了“马上出兵，与日开战，收复东北三省”的请愿的核心问题。将抗日行动置于“妄”和“骚”的范畴。公然暴露出他彻头彻尾的“我不抵抗也不许你抵抗”的丑恶嘴脸。对此，山东学生请愿团当然不满意，故决定：虽然蒋介石已接见了山东请愿团，因其不抵抗主义未改变，请愿团不能返回山东，仍住在中央大学，准备继续斗争。

南京到处挤满了来自全国各地的请愿团的学生，一致要求国民政府即时出兵抗日。但国民政府迟迟没有行动，这便进一步激发了学生的愤怒，将请愿转化为游行示威；国民政府仍无动于衷，矛盾便再次升级：学生认为外交部办事不利，教育部没站在学生一边，先后将两部捣毁；仍不见政府有出兵抗日之行动，学生又认为不抵抗主义是国民党中央党部所决定，便对其进行冲击；此时，《中央日报》在对学生行动的评论中

有不善之词，故在12月20日拂晓，上万名学生冲进位于秦淮河畔的《中央日报》社。此时，蒋介石刽子手的面目暴露了，国民政府“有动于衷”了，“有行动”了。

大批军警同时出动，对要求抗日救国的、手无寸铁的学生大打出手，殴打致伤众多，逮捕关押一批。致使一名学生代表溺死于秦淮河，造成惨案。学生抬尸示众，游行示威达到高潮。12月21日凌晨，蒋介石派出大批武装军警和便衣特务，将所有学生代表的住处封锁包围起来。便衣特务进入学生住室，将全部请愿代表控制起来。天刚破晓，张玉泉、郝炳扬、刘岐岭等山东代表便从梦中被喊醒，在特务的喝令下收拾行囊，并懵懵懂懂地在特务和大批军警的武装夹携押送下，经下关，过长江，在浦口被押上火车。军警特务与学生代表同车北上，当天傍晚把山东请愿团押回了济南。山东的省政府早有准备，将请愿团分别封闭在省立高中和省立一师的校园内，然后分批遣散回原籍。郝炳扬、刘岐岭也于第二天被押送回高唐。

这次南下金陵请愿，使全国人民看清楚了蒋介石的“不抵抗主义”面目，使那些寄希望于国民政府的人转变了认识，提高了觉悟，这对以后全国各地的抗日活动不无影响。

1935年8月1日，中国共产党发表了《为抗日救国告全国同胞书》（即震撼世界的“八一宣言”），呼吁全国人民捐弃前嫌，停止内战，集中力量，抗日救国。共产党的豁达大度，更使全国民众对持“不抵抗主义”的

蒋介石政府愤怒至极。北京六千多名学生，在中共北京地下组织的领导下，于1935年12月9日举行了声势浩大的抗日救国游行。在此求学的高唐学子多人参加了这次运动。其中黄振声（黄卓华）被选为北京与山东中学的联络员。此时高唐中学领头与县内的其他学校联合起来，于12月19日举行了全县总罢课。除游行示威外，还分组走上街头，大搞抵制日货的宣传，并在街头焚烧了敢于入市经营的日货。当时的国民党高唐县政府派出军警对学生行为进行阻止，并提前宣布学校放寒假。学生则借势将抗日宣传活动带入四面八方的农村。是年底全县范围内出现了反对不抵抗主义的抗日救国高潮。为“七·七”事变之后，高唐境内在短时间内组织起多股抗日武装做了充分的精神准备。

高唐中学的学生，经过南京请愿、“一二·九”运动的锻炼，认清了形势，提高了觉悟。抗日战争爆发后，多数学生投笔从戎，冲向抗日的最前线。不少人在战火中成长为人民军队的栋梁。另有二十多名学生，在抗日战争中为国捐躯，成为光荣的革命烈士。

现将与本文有关的四个主要人物简介如下。

山东省学生赴南京请愿团纠察队负责人张玉泉，字云庸，张庄乡解庄人，1911年生。1925年，高唐中学成立，张玉泉是首批中学生，编入二班。1929年考入省立高中。毕业后又就读于省立医学专科学校，此后寄居台湾。又先后就读于美国卫生勤务学校和中国

医药学院针灸研究班。先后在学校、部队任校医、军医。也曾在有关医药部门和院校任科长、主任、院长等职。他一生从医，终生爱国，情系故乡。1996年捐资人民币40万元，为家乡修建一处希望小学。2000年10月已年届九十，还特意回故乡参加高唐中学建校七十五周年紀念活动。直至现今的2004年，张玉泉仍然耳不聾，眼不花，步履健穩，思路敏捷，十分健康。

参加赴南京請愿团的高唐中学代表——郝炳扬，1917年生于姜店乡十里铺村，幼时聰穎好学，积极向上，青少年时在同学中頗孚众望。他就读于高唐中学前六级，是学生会会长，学生爱国运动中的积极分子。中学毕业后从事教育工作，参与秘密革命活动。可惜26岁英年早逝。其孙英超，在高唐县教育局任副局长。

参加赴南京請愿团的高唐中学代表——刘岐岭，字瑞周，三十里铺乡杓子刘村人，1931年时在高唐中学前六级就读。是高唐中学抗日爱国运动学生中的领袖人物。高唐中学毕业后考入山东省立高级中学。1937年，“七·七”事变后，在聊城爱国将领范筑先麾下政治干部训练处任职，投入了轰轰烈烈的抗日救国斗争。解放初曾在德州、邯郸等地区任要职。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奉命去北京任职。“文化大革命”期间曾受冲击，被迁置西安。因其多年未与家乡联系，对他的行踪知之不详。

“一二·九”运动的联络员——黄振声，字卓华，1914年生于韩寨乡黄圈村。1935年在北京山东高级中

学读书，积极参加抗日救国斗争，是“一二·九”运动的积极分子。193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日寇投降后，回故乡高唐从事教育事业，一九四九年调中共高唐县委宣传部，开始从事党政工作，先后任县委秘书、公社书记、高唐县报社总编、聊城日报社编辑科长、县广播站站长、计委副主任等职。自1952年起，享受县级待遇。年过八旬之后，还主编《养生集锦》、《领袖风采》等近百万字的文集。至今（2004年）已年过九旬，仍然思维敏捷，身体康健。

战日寇刘存福抡铡拼杀 犯高唐小日本胆战心惊

1937年“七·七”事变后，日寇冲过国民党二十九军宋哲元将军的防线，魔爪向南伸出。9月17日上午，一股由十八匹马组成的日军骑兵小队，携驮掷弹筒等武器，孤军深入，从县境西北的卞官桥过马颊河进入高唐，这是鬼子的兽蹄第一次踏进高唐县这块圣土。然后经柳庄、贾庄、韩寨，南侵过十里铺，折向西南，绕太和庄，穿绍庄至房庙，再转向东，在高唐县城西北的一块洼地内（现高唐一中校院的西南部），架起掷弹筒，向县城西门方向连开三炮。这是日寇在高唐境内第一次开火。第一发炮弹落入西门外王学河家院中，致使其在院中收拾农具的父亲王居宽被炸身亡。其余两发落入护城河中，没造成人员伤亡。日寇没遇到抵抗，稍停片刻后，便由北而南向城西门逼近。距西门不足百步时，埋伏在城墙之上女儿墙后边的国民党赵仁泉部的一个排的兵力，向日军开了火。这是日军在高唐境内遇到的第一次阻击，被迫进入城西门外路北的石坊院。一阵交火过后，日军不摸虚实，不敢恋战，且时过中午，便在石坊院北墙掏洞逃走，全部人马由原路返回。天近傍晚时，仍从卞官桥离开高唐县境。

日寇来了，放了三炮又走了。但鬼子打高唐的消息

不翼而飞，迅速传遍全县。引起强烈反响：富的打理细软，穷的准备衣食；胆小的欲离乡去逃难，胆大的要“骑驴看唱本”（走着瞧，等着看）；糊涂混日的寻思怎样保命，大义爱国的谋划如何抗日。有的车不解套，以车当床，随时准备逃难；有的弃农、弃商、投笔从戎，组织抗日武装。在这特殊时期，各自干着自认最重要的行当。

10月，日军由德州出发，过恩城再犯高唐。15日下午两点左右，日军松井部，七百余人，排成近二华里的长蛇阵，七辆豆型坦克拖着数尺高的黄尘，在四辆吉普车的指挥下，由高唐北部的茶棚村侵入县境。此系日军第二次侵犯高唐县。日军过一溜五屯、经梁村、二十里铺，铁蹄踏向县城。

秋后的鲁西北大平原，树叶已落光，田间无禾帐，一望可及十多里。日寇一过梁村，便被十里铺、崔庄的村民发现。于是十里铺、崔庄的百姓便慌乱躲逃，这又被邻村发觉，邻村马上行动，这信息又波及到邻村的邻村……

崔庄在城北，离城十多里。位于恩县通高唐的大官道东侧一华里处，是个较穷苦的小村庄。村中有一刘氏人家，家中顶梁柱名叫刘存福，他耿直厚道，勇敢善良。听到日军入侵的消息后，将母亲、妻儿委托给胞兄照顾，一起逃难，自己却留在村中。在送别亲人时，他拍着胸脯道：“你们放心，我誓死不当亡国奴！”

为防匪盗，崔庄人自建了土围子，那围墙又高又

厚，墙上可行人，有掩体。刘存福与村中留下的另外几个小伙子，用四轱辘车和石碾等物将崔庄的四个围子门闭严、顶实，然后在西围子门上看着日军直向县城开过去，没有骚扰左右的村庄。

日军入侵的消息很快传到了尹集村。村西头的明新寺中驻扎着由固河乡前辛庄人士吴子杰刚刚组建的抗日民团。这吴子杰曾在冯玉祥麾下当兵，与日寇多次交过手，有抗日的实战经验，又有带兵的组织能力。10月15日的下午，当吴子杰得知日军入侵的消息后，马上抽调三十名精干人员，皆骑自行车，速奔至崔庄。得知日军已路过南去时，吴子杰认定：日军不熟悉诸方面情况，也从不敢夜战，赶到县城时天色定晚，会不战而回。于是着人将村西的大官道横挖深壕阻断交通，然后将三十余战士分散埋伏在崔庄的西围墙上，枪口直指南北大官道，单等鬼子们返回。

没同家人一起逃难的刘存福，见有民团持枪埋伏在崔庄围墙上要打鬼子，欣喜若狂。他真想要支枪一同打鬼子，怎奈民团没有多余武器。他只好到每家去寻些饼子窝头来，再烧几锅开水，给围墙上的战士们送水送饭。

不出吴子杰所料，日寇经十里铺南行时，因官道地势较低，早已被决口的河水淹没，只好择路绕行。所择之路也是泥泞不堪，人难起步，车轮缠泥。越过曲庄转到五里铺时，太阳已经偏西。不得已，松井下令，日军原路返回。原来处在队尾的两辆吉普车，返回时便成

了排头。当来到崔庄西时，发现大路已被挖断，为首的吉普车在壕沟边停下来，司机刚刚出得车来欲看个究竟，随着“叭！”的一声枪响，司机被从崔庄围墙上射来的子弹击中倒地立毙。接着，日军官一声嚎叫，所有日本鬼子一齐卧倒，轻重武器同时向崔庄猛烈开火。七辆豆型坦克一字排开，离了大道碾着耕地直冲向崔庄。每个坦克后边，皆有一群弓腰弯背的鬼子紧紧相随。双方火力交织，枪声震天，硝烟弥漫。一方以围墙为掩体，居高临下凭地利坚守；一方以坦克为先导，靠武器先进猛攻。交火中又有两名日本鬼子在村西大杨树下丧命，一辆吉普车也被击中抛锚。待坦克猛撞围子西门时，又有三个日本鬼子被送进地狱。眼见西门欲被撞碎，吴子杰命令民团战士且打且退。在与日军的巷战中吴子杰的两个卫兵壮烈牺牲，一个是尹集镇的刘玉芳，另一个是武家花园村的武传立。寡不敌众，最后吴子杰率兵主动转移，离开了崔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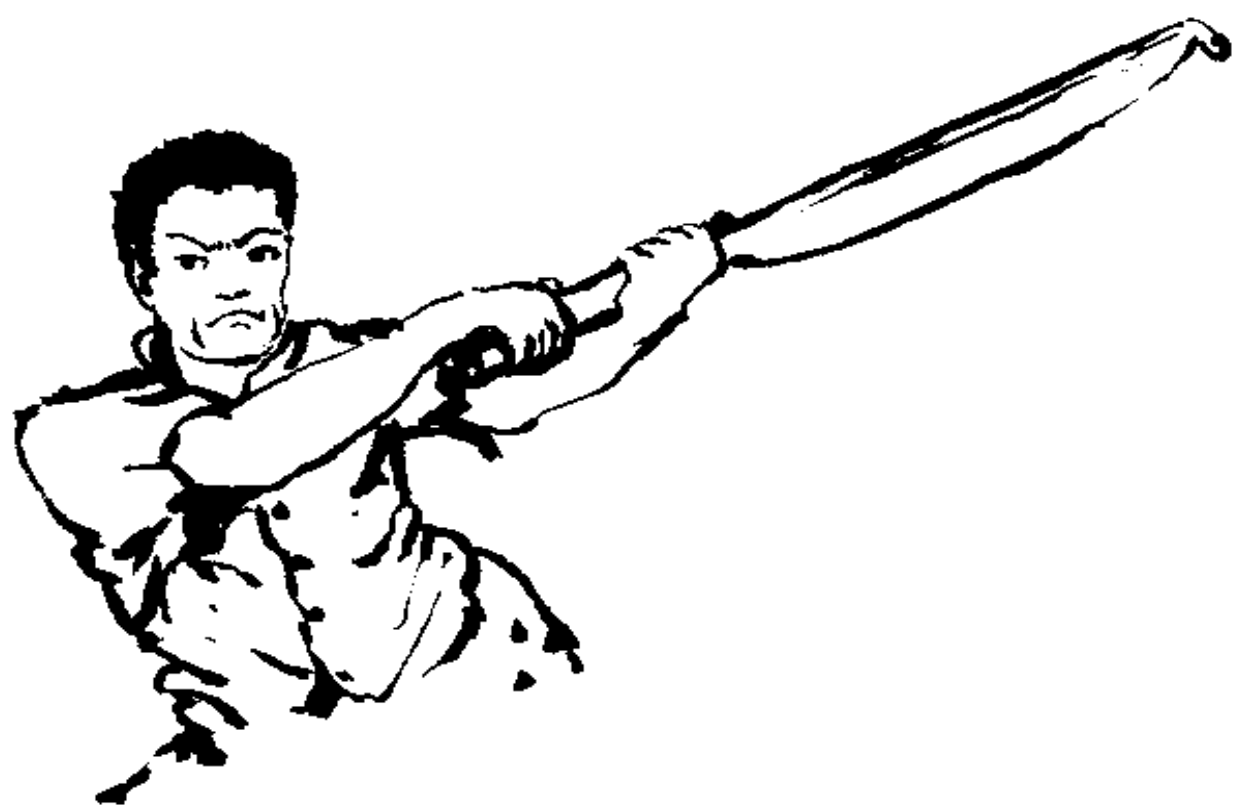
吴子杰指挥刚刚丢下锄把拿起枪杆的三十个农民，使用最落后的武器，与拥有坦克、火炮的七百多人的日军正规部队激战两个多小时，以毙敌六名的战果和牺牲两人的代价结束了战斗。这是日军在高唐境内第一次损兵折将，也是松井部在南侵的路程中第一次被牵着鼻子被动挨打。

在民团与日军激烈交火时，刘存福跑前跑后，帮助民团战士挖掩体，运子弹。待民团走后，刘存福巧妙地躲过了日寇的搜查，回到自己家中。卸下那口大铡刀，

在磨刀石上“嚓！嚓！”地磨了起来。刀越磨越快，心越跳越狂。这晚秋的夜晚，人们已穿上了棉衣，刘存福却扒下了棉袄，那紫赭色的胸脯、紫赭色的脊梁、粗壮的双臂、发达的三角肌，在缺袖少襟的衬衣下时隐时现。他看了看这熟悉的院落，这温馨的门窗，脑际迅速闪过一院子的天伦之乐，一屋子的幸福话语……国亡了，家也就不存了，是日本鬼子毁了这一切，愤怒仇恨的表情充满那张血红的面孔。刘存福倒提了铡刀走出门去。

来到大街上西望，只见村西头两个相连的大场院（打谷、打麦场）里烧起了点点堆火，每个火堆周围都蹲坐着一圈日本鬼子。坦克、吉普车在西边一字摆开，大枪在每个人圈旁支起一个伞形架子。他们围着火烧着什么，又是吃又是喝，又是大声嚎叫。场院的周围有三三两两的巡逻岗哨。

刘存福依仗地形特熟，利用地物遮掩，悄悄地向鬼子们靠近。五十步、三十步，离鬼子们还有二十步，进了一段没有遮拦的开阔地，刘存福顺势抡起铡刀大喊一声：“你娘的拿命来吧！”便飞快地冲向敌群。近处的鬼子们突然发现天降大汉，年约三十，身高六尺，体壮如牛，火光映出了那倒竖的眉、瞪起的眼、上牙咬着下唇的可怕面孔，高举着从未见过的雪亮大刀直劈过来！随着鬼子们的嗷嗷惊叫，数发子弹穿透了刘存福的胸膛，只见他身体前后一晃，又立马站定，将高举的铡刀狠命地掷向鬼子，在铡刀甩出的同时，刘存福倒



下了。那口雪亮锋利的铡刀落在鬼子们的脚前，将硬硬的场地砍进半尺深，稳稳地斜立在那里。此时刘存福支着头的下巴一歪，全身瘫软下去，但眼睛一直瞪着。第二天人们收尸时，那双血红的眼睛还在瞪着。

刘存福，这位高唐县普普通通的农民，大铡刀，这种在十五世纪也算落后的农具，却在二十世纪第二次世界大战时，配有飞机、大炮、坦克的日本正规军中，起到了不可估量的震慑作用。这股武器精良的七百余人的日军，被刘存福、被一口大刀吓跑了。他们赶快收拾行装，胆战心惊地用绿布将铡刀裹好装上军车，后退十里，在梁村度过了忐忑不安的一夜。

第二天日军侵占了高唐县城。崔庄的人们将刘存福葬于刘氏祖茔。

1937年12月18日，松井部七百多人奉调去禹城，结束了日军对高唐的第二次侵犯。1938年1月28日上午，日军一百七十多人，由禹城出发进犯南镇，在诸抗日武装组织的联合夜袭中，打死日军近五十名。日军29日仓皇逃至县城，守在城门楼上紧闭四门不敢走下城墙。30日黎明前便悄悄离开高唐。这是日军第三次侵犯高唐县。

1938年11月14日，日军丁田部由禹城出发进驻高唐县城，并建立伪政权。这第四次侵入，直到1945年日寇投降才结束。丁田部进高唐县城前，在张庄遇伏击，有两名日兵魂入地狱。进城时，惊魂未定的日军强打精神，吹打鼓乐，自壮虚胆。队前竟有四个士兵抬抗着用白布包裹的刘存福的大铡刀。不知松井部是如何将铡刀移交到不属一个军团的丁田部的，但这足以说明刘存福的铡刀对松井部、丁田部以及他们上司的震慑力度。这口铡刀，后经当时的棉栈经理韩松亭出面交涉，从日军手中索回，归还崔庄。

在编纂《高唐县志》时，刘存福的胞兄还健在。且耳不聩，眼不花，思维敏捷。其女儿在老汽车站对过开茶馆，在此多次与刘存福的胞兄长谈，每谈及弟弟刘存福抡起铡刀劈向日本鬼子时总是一脸骄傲。

金谷兰阻击关东军 日本鬼火烧东铺村

1926年的秋天，高唐县有了第一个中国共产党员，他就是谷官屯人金谷兰。他发展党员，建立组织，于1928年5月举行农民暴动，因走漏消息导致失败，当年9月被国民党反动派政府逮捕。在中共党组织及其他方面的全力营救下，1935年8月，金谷兰出狱。此后，在济南、金乡等地以修自行车、任小学教师为掩护继续坚持中共地下革命活动。“七·七”事变后，他回乡组织抗日武装，创建了冀鲁边抗日游击队，经常与禹城县的中共抗日武装一起活动。1937年10月15日晚上，金谷兰正与禹城党组织负责人研究抗日事宜，忽然听到日军松井部进犯高唐的消息，便拍案而起，表示刻不容缓，立马回乡阻击日寇。禹城友军为在禹城的高唐游击队员配齐自行车，当晚金谷兰便率队回高唐了。进入高唐县境后，他们侦知日军南侵到五里铺时，因天色已晚，不敢贸然攻城，便原路返回，在崔庄受到袭击，当晚退却到梁村扎营。金谷兰便决定在东铺阻击再犯县城的日军。第二天凌晨，金谷兰等十多名游击队员到达东铺村。

梁村通县城的南北大道从东铺村内穿过。前一天日军往返两次路过东铺，大部分村民已经逃走。金谷

兰等稍事休息，便组织人员在村北小桥北边横挖深沟以阻断日寇行军道路。东铺距谷官屯只有四五里路，金谷兰对这一带地形地势特别熟悉。他站在小桥上，看着桥下东西长六华里的深沟满是积水，南来北往的行人、车辆必经这座砖桥，在桥北把路截断，将给日军前进造成很大困难。深沟挖完后，队员们刚刚进入村子，便远远望见日军从梁村开拔过来。同时有一架日军飞机在上空来回低飞。游击队员们分散在村子内，利用院落掩护，找好有利地形，子弹上膛，准备阻击日寇。日军小坦克（时称豆型坦克）开路，行到断路的壕前，停了下来。此时游击队员在村内向日军大队连开数枪，日军马上组织火力反击，却找不到目标，乱打一阵又恢复了行军队形；游击队员又在新更换的射击点连打十数枪，日军又是卧倒、开火、然后停火又恢复行军队形……一个多小时后，三辆豆型坦克首尾相接，慢慢开进壕中，前拱后偎，将陡壕撞成缓坡。坦克上了南岸，其他人员车辆也随队进了东铺村。从小桥到村内区区几十步路程，日军却用去了三个多小时。眼见过了午饭时刻。无奈，松井命令在东铺村停歇，午饭后南进攻城。

此时，金谷兰已率游击队员向县城方向退去。

七百多日本兵在东铺村内没有找到一个村民，便自己生火做饭。由于前一天在崔庄受袭击的教训，他们在村子周围布满岗哨，不敢再大意了。

东铺是个穷村，盐碱地多，庄稼收成很少。老辈子

便传下了淋硝盐的本事。村头那些大大小小、高高低低的像塔似垛的泥丘，便是淋出硝盐后剩下的泥土堆积而成。如家中用土，便在丘下挖运，故在泥丘中形成一个个上洞。日军进村时，一村民外逃不及，便藏在洞中。不料出逃时，家养小狗紧跟身后，打不走，赶不跑，便与主人一块隐藏在洞中。鬼子在村边巡逻时，皮靴一响，鸟语一喊，小狗必然报以狂吠。日寇寻声而至，将村民枪杀在洞中。另有一村民，日前刚购得一辆自行车，那时的自行车比现在的汽车还金贵，逃跑时自行车放在家中，当然很挂心。听到枪声停了，以为日军奔县城去了，便迫不及待地回家探看，刚一爬上墙头就被在其家吃午饭的日寇枪杀。还有年过六旬的村民刘氏在村南耕地中逃跑时，被日寇枪杀在一土岗之前。日寇在东铺村共见到三个村民，全都被其枪杀了。

日寇吃喝已毕，便有组织地在全村放火。当日军离开东铺时，村内所有房屋已淹没在滚滚浓烟中。全村六十多户人家的五百余间房屋，无一幸免，全部被烈火吞噬。全村六十多家的财产也随之化为灰烬。所有的房顶燃尽塌陷，所有门窗烧完了，所有的断垣残壁都熏成了黑褐色，就连村内宅旁生长着的大树，也被烧着了，变成了黑色的鹿角光枝。当时在村民谢传山家的日本鬼子，不知何故将屋中的一把圈椅搬到了院子中，房子、家产化成灰烬，这把椅子却有幸留了下来，成了谢家劫后的唯一财产。椅子的背圈、扶手上密密麻麻布满了鬼子的刀砍痕迹。这把椅子被当做日军

罪证至今在谢家保存着。

金谷兰先期到达县城，在城东北日军犯城的必经之路上（现在金城广场的喷泉处），又深挖一沟。然后迂回城南，追赶逃跑了的国民党军，讨要枪支弹药。后又转向西，去袁庄、三十里铺筹划抗日事宜去了。

日军到城郊后，又遇到截路之沟。他们用坦克冲撞开路外，还抓来北关唐姓、李姓两村民，杀死填入沟内，踏尸而过。守城的国民党军早已逃跑，日军未遇抵抗，便进了高唐县城。日寇在城内当天枪杀四人，烧死两人，另有一人被逼溺于东门附近护城河中。

自卫队智袭倭寇 小日本血洗南镇

1937年12月18日，驻高唐县城的日军松井部七百多人，奉命全部移驻城南相距三十多里的南镇。南镇是古灵县县城遗址。西来的徒骇河在镇南左转弯向北流去，使南镇东、南两面临河。村南河上有桥。临村的堤坝弯曲迂回，深浅不一的洼坑相通相连。此处地形复杂，依水为险，自古便是兵家必争之地。因地处要隘，系高唐之南大门，金代时便被称为县内四大名镇之一。这次听说日军要侵犯南镇，村民大多逃离，日军分住在南镇民房中。当时十三岁的谢希孟因没来得及逃走，被抓去为日军做苦力劳动，黑白伺候在翻译官身旁。他从翻译口中得知：日军马上要攻打济南，松井部驻扎南镇是为阻止范筑先部去保卫济南。因范部未动，故没发生交火之战。25日夜，谢希孟听翻译说：“济南已经占领，明天我们就开拔了。”第二天，黎明，松井全部人马离开南镇，撤往禹城。这次驻扎南镇的日军，因与专事宣传并用小恩小惠笼络人心的“宣抚班”同在，故没有烧杀掠夺，倒有些给糖果、送大米的伪善行为，这群恶狼披上了羊皮。有些善良的南镇村民，被日军的假象所迷惑，所以日军第二次侵犯南镇时便吃了大亏。但大多数群众头脑是清醒的，在中共

鲁西区委的领导下，在范筑先决心抗日的影下，高唐县的许多村庄组织起了抗日自卫武装。南镇百姓有枪出枪，有人出人，也很快组成了抗日自卫队。

1938年1月28日，是农历腊月二十七，正逢春节前最繁盛的南镇大集。附近村庄的家家户户都要在这个集上卖点东西筹划点钱买年货，准备过大年。这天黎明，买卖摊点便从村北头顺街摆到了村南头。早饭后，赶集的人群便从四面八方带着节日的洋洋喜气，带着祥和发财的期盼，合拢聚集而来，南镇街上已是人头攒动、摩肩接踵了。

上午十时，正是买卖兴旺之时，突然村东枪声大作，买的、卖的四散逃走。霎时，集上便摊光人净了。一百二十多人的一股日寇，由禹城开出，骚扰张大屯后窜至南镇。由于上次日军在南镇没有暴露其劣根性，没有留下太坏的影响，故这次日寇再次到南镇时，多数村民没有逃离。南镇抗日自卫队除留一人侦探敌情外，全体撤出村庄。

日军进村后，因安排住处没有使其满意，便非常随便地枪杀了村长。这一村之长便成了南镇第一个被日寇杀害的村民。日军分住在村北头、村南头和村中间邢天成家三处民房中。三处均配有机枪二至四挺。摸清情况后，自卫队与范筑先部和花平民团武装取得联系，一致认为：这次日军只有一百二十多人，高唐县城无日军驻防，距禹城又远，这就形成了打击日寇的好机会。于是商定了当天晚上摸营的战斗计划。

当晚十一时，南镇自卫队由殷兆立、张秀冠带领沿徒骇河堤口经村东的坑洼地进入村内。悄悄向村中间日军驻扎的邢天成院落靠近。待到翻越围墙进入到院内时，才发现过午还满是日本鬼子的院子已空无一人了。狡黠的日寇在临就寝时偷偷地更换了宅院。自卫队只好边侦察边战斗了。他们爬上此院南邻人家的房顶，这是一连三间的平顶土房，多年泥房累积的麦秸土使房顶厚度超过一尺，悄悄地动作不会引起屋内人的注意。房内还亮着油灯。自卫队在房顶上趴定后，借着屋内发出的微弱灯光，发现该家那个乳名叫小秃的十多岁的男孩子在大门洞里卷缩着冻得发抖。

“小秃，小秃！鬼子搬到哪里去了？”自卫队员在房顶上压低声音问。小秃不敢答话，却用手狠狠地向自卫队员身下的房子指了两下。此时，突然从大门旁的厕所里窜出一个日本兵，刚才发生的一切他可能都已看见、听到，来不及扎腰，双手提着裤子只顾向屋内跑。说时迟，那时快，房顶突然一枪，出厕者没哼一声就重重地倒在地上。霎时，屋内嚎叫着，响起了枪声，小秃倒在了大门洞里。接着三个日本兵从屋中跳出，刚离开屋门就趴在地下，永远起不来了。鬼子不知自卫队身在何处，只是胡乱放枪。这时自卫队员杨胥金双手使枪，探身趴在房沿上，上身倒挂悬空，双腿叉开，分别有人按住，使其不能滑下房去。只要鬼子一出屋门他便准确地将其射杀，封住了鬼子的出路。另外几名自卫队员便以刀具迅速地在房顶上掘一透洞，给房

子开了天窗，这一瞬间，另有队员已将手榴弹四个一起绑了两捆，随手从天窗扔了下去。待鬼子发现屋顶军情时，手榴弹已“轰轰！”两下四方开花了。两声巨响使房子抖了两抖，浓烟从门窗口还有天窗处冲滚而出，屋内的日军全部上了西天。

随着第一声枪响，早埋伏在徒骇河南岸的茌平民团及范筑先部的武装人员和村西韩凤文带领的韩庄民团、村东王子范带领的民团，同时打响了包抄战。一齐向南镇发起猛攻。日寇被这突发的袭击打得懵头转向了。住在小秃家的鬼子全部被消灭，村南头的鬼子一边组织火力封锁南镇大桥阻止茌平民团的攻击，一边则拉出轻重机枪顺街向北扫射；村北头的鬼子，一面应战韩团和王团的进攻，一面组织火力顺街向南猛烈开火。南北两头的鬼子开始自相射杀。

村中的自卫队员趁机下得房来，收拾日寇武器，清点日寇死尸：屋内八具，院子中四具。同时在大街上寻好掩体，待南北双方的鬼子火力渐弱时便朝他们双方猛击一阵，斗得他们各不示弱，努力拼杀。队员们只听得子弹从头顶上尖叫着向南、向北飞过，村两头的鬼子继续自相射杀。

天近拂晓，东线王团、西线韩团退却了，南线茌平民团几次冲锋，被阻在徒骇河桥上，茌平县公安局长丁宗义不幸中弹牺牲，只好收兵转移了。南镇自卫队无伤无亡地悄悄撤走了。只剩下村两头的鬼子仍在相互射杀着。

天色大亮了，鬼子发觉上当了。两头活着的鬼子嚎叫着凑到一起顿足唾骂、厉声斥责、相互推打。不论怎样咆哮，被打死的四十多个日本兵中有三十多个是他们自己动手射杀的。这是日军在高唐县，甚至在鲁西北死伤最多的一次战斗。最终他们将受到的惩罚视为被欺，将自己战略战术上的失误迁怒于善良的中国百姓。

日寇的狼心兽性再也掩藏不住了，对手无寸铁的南镇百姓进行了骇人听闻的大屠杀，他们挨户搜查，见人就杀，妇女儿童、老弱病残者也在所难免。一时间大街小巷横尸遍布，血迹满地。鬼子怀疑邢天成给自卫队报信，将其全家六口一齐推进杜景武的猪圈内全部枪杀。邢天成十二岁的孙子长顺也未能幸免。村民王贵生躲藏在柴垛里，被鬼子用刺刀活活捅死。郭金连被鬼子剖腹，肠子被挑出。村民殷光灿等十一人被押到大街上，一字排开，强迫跪在街心，其身后的刽子手们举起了罪恶的钢枪……

没来得及逃走的二百多村民，被从家中赶出，押到村南头的郭家大院中。日寇又怀疑郭家给自卫队报信，便将其全家男女老少都捆绑起来，用随手拣来的顶门杠子，捅炉子的铁签子劈头盖脑地乱打一阵。接着在全村人面前，把郭景一的父亲郭佩德拉出来，强按其往刺刀尖上磕头，待双眼被戳瞎后，便将郭佩德及儿子郭景家、郭景东一起枪杀。

二百多村民，被迫分排跪在地上，把头低下，不准

活动。日寇们在人身上随意走来跑去，还将人拉出来当凳子坐。并将烧着的木炭放进村民的脖领里，烧得人大叫乱滚，鬼子们却哈哈大笑。鬼子将村民邢占元拉出用刺刀将其脖子后面的三条筋腱慢慢地割断，然后再拨弄他的头，邢占元在一阵阵惨叫中被折磨而死。更有甚者，他们见一村民长得体胖头圆，且刚刚剃了光头，便将他从人群中拉出，几个鬼子摁着手脚，一个鬼子使用刺刀在其头顶上划开一个十字大血口，刀刃深达头骨，血口长度均到发际，被害村民惨叫不绝，头上顿时血流如注，血口越来越大，头皮慢慢下滑，从头顶上脱落下来，血红的头顶骨露了出来，脸上五官迅速变形，脸面被扭曲。不停地挣扎着、惨叫着，其声不忍听，其状不忍睹。不多时就活活疼死了。围观的鬼子们得到了满足，又暴发出一阵狰狞的狂笑，这哪里还有一点人性？

日寇对南镇村民凌辱、折磨、糟蹋过后，从人群中寻出四十多名青壮年，捆连在一起，押至村北头古灵城墙脚下（原南镇乡政府所在地），用机枪集体枪杀。待日寇退走后，人们整理死尸时，发现村民徐永祥没有遇难，但当时精神已经崩溃。

这次南镇惨案共有八十三名村民遭残杀，其中六十岁以上的老人就有三十多名。

惨案这天是古历腊月二十八，因为这年腊月是小月，第二天便是除夕。在一年中最盛大的节庆日子里，南镇村却为八十三名村民出殡。

再说殷光灿等十一人被迫当街一字排开跪下后，刽子手们便从背后开了枪。十一个人倒在血泊中，不知过了多长时间，殷光灿苏醒过来，他睁开眼后看到相靠的那位理发师傅也睁开了眼，两人便小声商量逃跑。正要行动时，忽然由远而近传来皮靴声，两人便不约而同地屏住呼吸、闭上眼睛装死。“咚咚，咚咚……”皮靴声越来越响，来到跟前突然停止。随着一声怪怪的长嘶，鬼子们对每个血泊中的人开始穿刺。不一会儿刺刀便悬在殷光灿身体的上方，随着“哼嗤”一声鬼子短粗的出气声，又清楚地听到“吱儿”的一声响，刺刀扎进了他的胸膛，在刽子手向上抽提刺刀时，还觉着自己的身子“忽闪”了一下。然后又是什么也不知道了。又不知过了多长时间，殷光灿第二次苏醒过来时理发师傅已无任何反应了。殷光灿只好一人谋划逃跑了。准备再次行动时，又听一阵皮靴声，又是忽然停下，又是一声像命令似的鸟语，又是从那头开始，这次是用砍刀砍头。不一会儿刀就举到了殷光灿的头上方，随着“嗖嗖”的风响，他只觉得头顶头侧被砸了几下，便再次失去知觉。又一次苏醒过来时，天已过午。已是三次死亡的他意识到，这样躺在大街上，来往的鬼子拿这十一个人出气，这将是没完没了的杀戮，一定要快逃，不能再等了。他要起身时，双手撑地，头却重如大山，体不能支，无论如何抬不起来。便一手托着下巴让头抬起，以肘支地，一手撑体，慢慢向路西的胡同爬去。用尽平生气力，爬到胡同尽头，回头望时，见自己

的鲜血滴混在早有的血迹中，他顺手移开几捆玉米秸，藏了进去。又是一阵天旋地转不晓人事了。等再次醒来时，已是满天星斗了。殷光灿努力挨出村庄，爬越耕地直向邻村的女儿家爬去。不知昏死多少次，只要一苏醒便认准方向向前爬。衣服上的旧血结成了冰，鲜血还在热乎乎的往外渗。四肢已失去知觉，凭意识硬让手脚行动。天放亮时爬到了女儿的村旁，被人发现告知了他的女儿。

在女儿家经过医治，殷光灿奇迹般地活了下来。1988年在征集《高唐县志》资料时，笔者在南镇见到了他。他脱了上衣指着肩下铜钱般大小的一处圆伤疤说：“这是将我打晕的第一枪，子弹从后背进入，从肺左上角穿过，从这里出去，不是致命伤，因身穿棉衣，鬼子没有发觉。”又指着胸膛正中间的一处圆伤疤说：“这是刺刀伤，也是从脊背穿入，刀走心、肺、胃中间那一点点缝隙，没有伤着器官，稍一挪动位置就没命了。”当他摘下帽子，真能吓人一跳：头上盈寸的白发东倒西歪地长在一道道光秃的刀疤的两边。头顶左右各有一道刀伤，后脑壳有一道长疤，在衣领之上的发际处，有一深沟状刀疤，沟疤之长达两边耳后，沟疤之宽深可容一手指。殷光灿微微摆摆头说：“当时抬不起头就是因为脖颈上这一刀太深了。”

多年来殷光灿不愿提及此事，总觉得若大一个中国让小日本欺辱，太丢人！这是他唯一的一次畅谈。当谈到近几年来与日本国的关系好转时，他说：“日本国

也是好人多，坏人少。”这是何等宽厚的心怀啊！当谈到日本仍有少数人不承认在中国的侵略罪行时，他气红了脸：“教人寒心！天理难容！”

历史就是历史，任何人也不能将昨天的事情改换个样子。

故事中尚有一事需要交代：调查本文资料时，遇到一种看似合情却不在理的现象。南镇自卫队员当然是甘愿自我牺牲，爱国爱民的民族英雄。是南镇的骄傲，是高唐的骄傲。可是当时南镇大部分人认为惨案都是自卫队惹的祸！对自卫队员很反感，甚至敌视。于是自卫队员们也不敢承认自己是打鬼子的英雄。故在行文中没有写出更多队员的名字。

箭已上弦百姓临难 急中生智村民得救

1937年10月16日，日军松井部侵占高唐县城，同年12月26日，在南镇完成阻击范筑先部支援济南的任务后离开高唐。

1938年11月14日，日军丁田部，奉命由禹城西犯，再次侵占高唐。上午10时，配有战车、小炮、机枪的日军六百多人，行至距县城十里的张庄时，突然两声枪响，子弹飞进日军队列，两名士兵应声倒地毙命。全部日军立刻原地卧倒，枪声响成一片，子弹纷纷射向张庄。一阵火力过后，一军官挥动长刀，驱赶着该部约三分之一的士兵弓腰弯背、端着上了刺刀的长枪，狼群似的向张庄靠近。

张庄静悄悄。多数没来得及逃跑的人，各自闭门守在家中。日军很快便由村西头进入村庄，砸响了离公路最近的街西首路南的黑漆大门。

这黑漆大门宅院的主人，名叫张修一。

张修一，何许人也？

张修一，字献唐（愿将一生献高唐），清光绪年间秀才。1906年，经考试官费留学日本。先后在日本东京高等师范和日本东京大学攻读6年，获法学学士学位。1911年回国后，先在北京政府教育部任主事，后

离京到济南任职。1913年任山东省立高等师范学校教员和山东省高等审判厅司法官，督军署外交官等职。1920年，张修一因家事回到故乡。1935年应聘为《高唐县志》副总纂。1938年底歹人为了夺其德国造短枪，将其杀害。

张修一，事无巨细，求实认真，不入浊流，不随劣俗，民主自由思想支配言行。留学回来，沾点“洋气”，故获外号“大洋人”。知张修一的人不多，知“大洋人”的人颇众。

张修一是一个办事非常认真的人。有一次，在城内鼓楼东路北的饭店吃包子，张问：“什么馅？”店主曰：“韭菜猪肉”。张：“拿五个来。”张修一吃了一个，竟然全部是韭菜馅，没有一星半点猪肉。心中好怒：饭店竟这等欺侮百姓，赚昧良心的钱！口中便喊道：“这个包子没有肉——无效！”五个包子吃完，喊了三次“无效”。所以在结帐时，张修一斥责了饭店的欺骗行为，并坚持只付两个包子的钱，以示消费者对饭店的惩罚。这件事被那些自我标榜为大方的人当谈话资料，广为流传，并总结成为歇后语：大洋人吃包子——无效。

张修一是一个干事业的人，他将在日本学得的方方面面的知识，在教学的同时，编著成册，先后出版了《中国地理集成二十》、《代数精解四》、《数学通解四》、《物理学新编》和鼓词《环游山东全省》等著作。其内容翔实，字词准确，皆是精细之作。

张修一是一个不入浊流的人。他回乡后，发现村

长、保长等基层村官，欺人成习，沾贪成风。张修一多次拒绝了他们的笼络，不与其为伍。每逢年节，村长总是组织土台班子唱大戏，过后挨户敛钱粮，从中渔利。每逢村中演戏时，张修一便搬一条长板凳横放在大门口，正好将大门堵严。他便坐在板凳上，不让家中任何人前去看戏。过后也便以此拒交钱粮，使沾贪欺民者受到抵制。

张修一是一个非常俭朴的人。他珍惜每个铜板，不浪费一粒粮食。他认为勤俭是美德。穷人勤俭为穷所迫，富人俭朴更显品贵。他虽然粮满仓，钱盈箱，仍坚持过俭朴生活。他是一家之主，在生活上当然受优待，吃饭时只给他买半斤（三个）馍馍，放在他面前的餐桌上。他对排在一起的三个馍馍说：“等我吃个窝窝头再吃你！”吃了窝窝头后又对馍馍说“哈哈！骗了你了，我吃饱了。”就这样，风趣地带领全家吃粗粮。直到馍馍一次次受骗，最后因多次蒸馊色变黄了，皮开裂了，他才说：“吃了你吧，你生翅膀了，不然你要飞了。”张修一是不是有点“小气”“抠门”？否！该花的钱他毫不吝啬。

张修一是一个非常慷慨的人。1920年他由济南刚回到家，便想为家乡做点事，于是腾出家宅义务办了一所短期小学，并在小学大门上贴了自编的一幅对联，上联为：莫看小学是短期；下联为：造就人才成大器。横批为：乐育英才。到此，人们便找到了已是富户的张修一为何还要节省每个铜板和每粒粮食的答案了。

张修一还是一个爱国爱家乡的人。1931年“九·一八”事变，日本侵入中国后，他对祖国的命运担心，便以笔为枪，撰写出版了《中国痛史》，列数了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罪行，动员国民奋起抗日，保卫国家。继而创作了剧本《班定远平西域》和《战金山》，激励人们发扬战斗精神，合力抵抗外侮，借古喻今，鼓励人们丢掉幻想，拿起武器，打败日本侵略者。“七·七”事变后，国家形势危机，他又撰写了《醒世》鼓词，痛告民众：亡国之危就在眼前。自“九·一八”事变始，张修一还写了多首抗日救国的诗歌，可惜全部失落。

张修一留日不媚日。日军再犯高唐的这一天，张修一照例早起执笔写作，将刚创作完毕的《醒世》鼓词誊写一遍，已是上午九点多钟了。张修一还没有从鼓词中“强敌入侵，祖国危难，痛劝民众认清时局”的激愤之情中解脱出来，不平、愤怒、痛恨的波涛还在胸中撞击。早饭未吃，便走出大门，想在更大的空间中抖撒这满腹的憋闷。恰巧见到了公路上的日军。目睹了两个日军士兵被击毙的全程，他刚刚躲进大门，日军的弹雨便漫天而降。根据县内已发生的、由日军制造的南镇、王笠庄、孙家庙、吴官屯、辛庄等多起惨案推断：日军要血洗张庄了！这枪声表明刽子手已举起了屠刀，毒箭已在满弓的弦上了。

怎样搭救已处箭、刀之下的村民？

如何停止已拉开序幕的血火惨剧？

张修一想到日军的习性、信仰……急忙从书房的

箱底找出了东京大学毕业证书，端正地挂在北屋冲门的墙上。然后坐下来设想着应对可能出现的多种情况的方案。直到自感胸中已有“成竹”时，便稍微轻松地长出了一口气。这口气还未出完，便听到了猛烈的砸门声。

张修一急走着去开大门，鬼子已破门而入，两把明晃晃的刺刀已逼向张修一的胸膛，并迅速地拉开劈刺的架势，生命进入了读秒阶段。在这一眨眼便成刀下鬼的千钧一发之时，张修一用非常熟练的日语高喊一声：“不要发怒，有事好商量。”此语像神话中的定身法，行刺的架势凝固了。只见日军的脸上那刽子手特有的凶神恶煞表情瞬间发生变化：惊喜——好奇——懵懂，有点儿不知所措，也不失固有的警惕。但面孔已恢复了人的本来面目。刺刀虽然离张修一远了些，但一直端着不肯放下。

“屋里坐下，可休息，可喝茶。”又是一句日军罕闻的母语。院子中留有几个日军兵士，另几个士兵随张修一进了北屋。他们一眼便看到了悬挂在迎门桌上方的东京大学毕业证书，更清楚地看到毕业证书上方中间印有的那熟悉的日本天皇照片。屋内的日本兵同时嚎叫一声，立正，对天皇照片行军礼。此时，他们手中的枪方才竖提起来。屋外的日本兵也马上进得屋来，也行了军礼。紧张的空气逐渐消散，张修一与日本兵用日语谈了一阵子话，其内容大致为：枪击日军者不在张庄，日军应当收兵。然后日本兵从张修一家退出。

不多时，进村的日军撤走了。公路上的日军大队开拔了。

这一天，张庄村的居民都先后到张修一家表示感谢。

第二天上午，一股三十多人马的日骑兵，牵带一匹驮有布匹和整袋大米、白糖的白马，来到张修一家，放下礼物，让张修一骑马进了县城。

在县城内日军指挥部（人称红部），与张修一谈话的正是该部的最高首领丁田，其目的是动员张修一任高唐县维持会会长。维持会是当时地方日伪最高权力机构。张修一以身为学者，无能力从政为由，谢绝了这一汉奸官职。无奈，丁田又送一批礼物将张修一送回张庄。

智退日军保护村民的这一史实，至今人们记于心间，传于口头。此前，“大洋人”的称呼含有三分轻蔑，七分幽默；此后，“大洋人”的称谓却是三分肃然，七分敬仰了。张修一成了广大民众经常怀念的人物。

郭瑞林成亲出尔反尔 谢鑫鹤支招放猴捉猴

郭瑞林，高唐县清平镇许庄人。他本分守己，善良厚道，主持正义，帮贫助弱。在许庄有一呼三应之威望，孩提时便是群童的自然小领袖。1937年初冬，日军侵入高唐时，他已是23岁的棒小伙了。他以“无国便没家”的理由说服父母，率先牵出家中的耕牛换成了枪支组织抗日武装。村内十多人立刻响应，卖牛卖地出资购枪，到1939年，这支武装已发展到二十多人枪。他们提出“打鬼镇邪，护家保国”的口号（鬼指鬼子，即日军。邪指皇协，即伪军），宣布抗日民团成立，公推郭瑞林为团长。1940年初春，日军一辆汽车由东向清平城开来，被埋伏在小屯村南公路两旁的民团截击，只用三颗手榴弹就将汽车炸得热气冲天，三个日本鬼子命归西天。民团缴获了两支长枪和一支短枪。待清平镇内的日伪驻军赶来救援时，民团早已无影无踪了。旗开得胜，民团士气大振，村民受到鼓舞，有钱的出钱，有人的出人，民团很快便发展到有机枪、有马匹的二百多人的队伍，为当时清平一带实力最强的抗日武装。

团长郭瑞林，膀宽腰圆，脸方鼻直，粗眉大眼，身高五尺六七，威武勇猛之气溢露形外，儿女情长之念

动于心里。二十六岁，是想媳妇的年龄了。在几位弟兄的怂恿下，1940年4月下旬的一天清晨，在无媒人通气，无聘礼赠送，女方毫无知晓的情况下，将在张庙村住姥姥家的高唐县城内糠市街的大姑娘张秀昌强行用马驮到了团部于庄。

张秀昌年幼时曾从父亲那里学得一点文化，也懂得一些诗句，是远近出名的手巧、贤惠、漂亮的小家碧玉。从十三、四岁起就有媒人登门提亲，未遇意中人，又因兵荒马乱，一拖再拖，直到1940年，秀昌芳龄已二十有一了，还待字闺中。此时忽遭强抢，自觉生路已断，便欲从马背上一头撞下去了却一生，怎奈马两边皆有护兵，随时准备托救，故一路挣扎一路泪地到了民团团部。郭瑞林早已安排就绪，团部东临的独院做洞房，瑞林的婶婶和妹妹为新娘的陪伴者。哭声伴着新娘进了洞房，两位女伴贴身相随。新娘张秀昌自早至晚三餐不进，滴水不饮，一言不发，只是不停地哭。掌灯时分，郭瑞林来到洞房，见新娘子眼睛红了，鼻子也红了，还哭得上气不接下气。无奈，只说了句“我是诚心娶你做妻子的，绝不是乱抢民女”便退了出去。第二天张秀昌已是欲哭无泪了，有时隔窗向院子里望望。中午时正好看到郭团的战士们在院子里吃中饭，他们穿戴都象老百姓，每组七八个人围着一盘老咸菜，每人手中拿一个红色高粱的或是棕色杂面的饼子。那老咸菜是白萝卜腌制的，不切片、不切丝，一段一段堆在盘子里。那各色各式的饼子一看便知是从自家带来的

或是穷苦老百姓捐送的。这样的干粮每人也只有一个，没见有人再送，也没见战士再要。这样的饭食他们还很满意，吃得美滋滋的。他们边吃边闹，边说边笑。从他们的话中听得出他们为了打鬼子而来，从不祸害老百姓，纪律非常严明……

张秀昌还是不吃不喝，郭瑞林的婶婶、妹妹又陪了她一天。到了掌灯时分，郭瑞林再次风尘仆仆进了洞房，见新娘还在绝食、哭泣，便又说了句“早知你人品好，我是真心喜欢你，但也不会强迫你”就又退出了洞房。当张秀昌听到“不强迫”的话时，觉得这位民团头子还有点“言行有礼”，心中犯了嘀咕：早听说郭团是好团，所闻所见也证实了这一点……他到底是个杂团头子……夜间仍然睡一觉哭一阵，两天两宿没说一句话。

第三天早饭后，郭瑞林来到洞房，见张秀昌仍无从婚之意，便说：“结婚是两个人的事，你不同意就拉倒吧。前天接你来是鲁莽粗野了，别怪着。今天由我婶婶、妹妹送你回家，同时向你的亲属、乡亲说明你在郭团的两天是清白的。”说罢，将她们扶上马送出了大门。离开小于庄，直奔张庙而去。半途，只听张秀昌大喊一声：“站住”，这是三天来的第一句话。婶婶、妹妹的马向秀昌靠了过来。秀昌接着说：“婶婶、妹妹，你们陪了我两天，没有以势压人进行规劝。瑞林三次进屋，没有以威吓人，没有以力欺人，我不同意就真的放我回家，还考虑到要维护我的名誉，你们都是好人，瑞林又

是体貌、人品都占，我愿跟着他。再说，我回村后，不管事实怎样，也不管你我怎样解释，多数人总是在心中疑惑：一个大姑娘被团头抢了去，住了三天送回来了，还有清白吗？以后生活在吐沫和指点中，还不如与瑞林去一块儿打鬼子！”秀昌一口气把话说完，脸上闪过激动、兴奋和害羞的表情，婶婶、妹妹被秀昌感动了，探身抓住秀昌的双手，上下抖呀抖的只是笑。此时，护兵中有一个叫小敏的突然转身向小子庄跑去……

三位女人驳马而回，她们的笑声传遍秋后的旷野。郭瑞林快马迎出村来。在人们的欢笑中秀昌返回了洞房。

新婚之夜，秀昌声音怯怯地话锋却锐锐地戏问道“你先说‘要娶我’，后又说‘拉倒吧’，婚姻大事怎能出尔反尔？”郭瑞林反应很快，趣对曰：“最初你绝食抗婚，最后又自投洞房，没有我的‘出尔反尔’，能换来你的‘朝令夕改’吗？”

婚后，张秀昌很快学会了双手使枪，平素白天为郭团当文书，晚上替夫君查岗巡哨清点人员；军事行动时，秀昌便肩挎双枪，骑上高头大马，紧随团长之后，是郭瑞林的忠实护兵兼司勤。郭瑞林接受共产党领导后，秀昌与谢鑫鹤的夫人姐妹相称，以亲戚关系为掩护，长期生活在一起，张秀昌为革命事业，为抵抗日军做出了一份贡献。

郭瑞林抗日民团的迅速发展，一方面激怒了日伪

军，另一方面得到了群众的拥护，同时引起了共产党地方组织的关注。

1940年春末，博平县抗日游击队领导人周喜（周庆余），一人直入郭团，亮明身份后与郭瑞林长谈一夜，在周喜申明了共产党的抗日政策后，郭瑞林觉得“正合我意”，便主动表示接受共产党的领导。经过一年的多方考察后，1941年春，周喜在征得当时中共运东地委书记郭少英和地区专员谢鑫鹤的同意后，以中共运东地委的名义通知了郭瑞林：民团正式编为中共冀鲁豫军区第八团机枪营，是共产党领导下的抗日武装团体。郭瑞林任营长。谢鑫鹤兼任党的联络员。为集中力量抗日，避免国民党势力的干扰，仍保持民团面貌，共产党的活动秘密进行。

此后，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在抗日战场上郭团接连取得胜利。驻清平的日伪军多次吃亏之后，开始谋划进行报复，郭团有随时遭突袭的可能，敌我形势瞬息万变，谢鑫鹤与郭瑞林的昼隐夜出的联络方式已难适应战局的需要了。为了加强共产党对机枪营的领导，必须有一种在白天大庭广众之下与郭瑞林取得联系、又不被人察觉的沟通办法，使共产党的领导意图及时地传达到郭团。谢鑫鹤、郭瑞林两人共同探索、研究，最上策的联络办法终于找到了。

1942年冬季一个雪后的下午，万里无云，天空瓦蓝，照在雪的世界上的阳光多次反射后，亮度增加若干倍，刺得人们不敢睁大眼睛。扫出的褐色小路，弯弯

曲曲将各家的大门串在一起。行人很少，大都在自家的炕头上了吧。

“哐哐哐！”一阵锣声打破了小村的寂静，从锣声的节奏中人们判断出这是耍猴的进村了。当年，看耍猴就是小于庄少有的文娱节目了。人们迅速地寻声来到村中的一个打谷场上。场中扫出一个圆圆的场地，场地的外沿很快便挤满了里一层外一层的老少村民。只见场中一条汉子，身材不是太高，紫糖肤色，嗓音响亮，手脚利落，提一面大铜锣边敲边转场，流利地有节奏地叫着开场白：“耍耍闹闹，惹你笑笑”，“哐！”“哐！”用手中锣打“过门”。“不设局看牌”，“哐！”“不赌博顶牛”，“哐！”“都来看咱玩猴！”“哐哐哐！”果真是一把耍猴的好手；汉子肩上扛一小猴，它披一身滚瓜流油的黄色短毛，俯仰扭动的头上有一双滴溜溜不停地眨、快速地转的圆眼睛，那似坐非站的姿势调节着平衡，果真是一个有戏的上等好猴。

随着猴脖卡上铁链子的不同抖动方式和耍猴人的语言指令，一场猴戏开始了。伴着耍猴人唱词的内容和锣声，一会儿小猴自己打开柜子拿出面具戴上，扮成矮个子毛贼；一会儿又换成黄鼠狼的面具，要去偷鸡；一会儿又装成小鬼，扛起大刀去杀人……耍猴人越唱越带感情，看客们越笑越有所思。

天晚了，一位独身姜姓大爷留住了耍猴人，从此，姜大爷的东屋便成了耍猴人的落脚地。他每天早出到清平城内撂场子，晚上回姜大爷家住宿，果然是个勤

快的杂耍混迹者。

郭瑞林的小勤务兵名叫小敏，是个十四岁的孩子，为不当亡国奴，参加了郭团。不知是好奇心驱使，还是想学一门挣饭的本事，小敏每天晚上来看训猴，有时参与排练，而且非常专心。耍猴人、小敏、小猴，每天晚上不厌其烦地重复着一个套路：小敏一拍头，小猴快捷地抢过小敏头上那顶破黑线帽子，跳到房梁上，任凭小敏怎样讨要，小猴就是不还。耍猴人一甩鞭子，小猴马上跳到耍猴人的肩上，把帽子交给耍猴人。耍猴人再把帽子还给小敏。这样一个过程，每天晚上都要练几遍。

耍猴人就是谢鑫鹤，猴戏就是在非常情况下他与郭瑞林互通信息的方式。就在还帽子时的一接一递之中进行了“指示”或“请示”的一送一收。1942年以后的多次情报就是通过这样的方式进行了成功地交接。1942年冬季，就是这样及时提供情报，把鬼子一个小队全部送进地狱的。

农历十二月初五，清平大集。谢鑫鹤照例在清平城东门里北去不远的一开阔地里耍了一场猴戏，然后收拾起道具到对面茶馆歇脚、喝茶、喂猴。茶馆跛腿老板对谢鑫鹤低语了几句，谢便背起道具牵了猴自言自语道：“今天天气好，还要赶场耍一遭。”

转眼功夫，小于庄响起了耍猴的锣声。小敏是当然的看客，他刚站定脚步，只见谢鑫鹤偷偷地摘下猴脖子上铁链子，几乎是同时，小敏拍了一下头，只见小

猴抛下手中面具“噌”的一下腾空跃起，直扑向小敏，前爪抢下那黑线帽，后脚在小敏肩上一蹬，便敏捷地跳上旁边的一棵榆树，蹲坐在树杈上。小敏在树下又喊又跳，小猴却不理会。此时只听谢鑫鹤大喊一声“下来！”随即甩响了皮鞭，小猴乖乖地跳下将帽子交给谢鑫鹤。谢鑫鹤一边说着“对不起，吓着啦，猴子不听话……”之类的道歉话，一边把帽子平平整整戴在小敏的头上。小敏说了声“没关系”便退出了场子。一次接交情报的任务就在这放猴捉猴的过程中毫无漏洞地完成了。

团部中，郭瑞林展开从小敏帽子中取出的纸条。下午1点左右，十个日军兵带一挺机枪、七支步枪、一支短枪去仓上村抢粮。选二十个精干人员，仓上打伏击。

中午刚过，从城门岗哨抽出两人才凑齐十人的一小队鬼子，向仓上出发了。仓上在清平城东，相距约十华里。距仓上里许，鬼子小队长便刀出鞘、枪上膛地督促全队做战斗准备。他们越往前走，背越弓，步越轻。

仓上村西头有一关公庙，独院无邻，北距进村大道约三十米远。道北半里处有一桑树林，树下是因风携沙造成一段段一层层的高一米左右的沙土岗子。郭瑞林所带人员分别埋伏在关公庙和桑树林中，事先并做好了周密的安排。

鬼子刚刚接近村头，郭瑞林在关公庙的围墙后面勾动了早已瞄准鬼子的短枪扳机，鬼子小队长应声倒下。其余九个鬼子恶狼般向关公庙扑来，就在鬼子转

身的同时，背后的桑树林中响起一阵枪声，又有三个鬼子没吭一声就倒下了。剩下的六个鬼子被迫向桑树林反击，当然背后又有关公庙射来的子弹，没有几回合，十个鬼子就成了十具尸体。

仓上战斗一次全歼鬼子一个小队，是清平一带抗日战场上消耗最少、战果最丰的一次战斗。使驻清平的日伪军再也不敢轻易地出城骚扰了。

故事中主要人物后来怎样，在修《高唐县志》时，才将他们的下落查清。

谢鑫鹤（1912——1979）原名吉钊，字紫英。茌平县谢天贡村人。193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解放前曾任中共博平县工委书记、运东地委书记、专署专员、贵阳市委第一书记；新中国成立后先后任贵州省委书记、省政协主席、国家第二轻工业部党组副书记常务副部长、兼中国工艺美术协会理事长。系中共全国“七大”代表、全国第五届人大代表。

郭瑞林 1943年春，伪华北“治安军”妄图以高官厚禄收买郭瑞林，被他严辞拒绝，并痛骂伪军卖国求荣。伪军便勾结高唐、清平、博平等县的日军和集中聊城、临清等附近几个县的伪军共计两千余人，于1943年9月12日将郭部包围在于庄。激战一天后，郭瑞林在突围时中弹伤腿，小敏欲背他冲出，被他斥退。他端起机枪，向敌阵扫射，掩护部队突围。待敌人逼近时，他毅然向自己开了枪，实现了他“宁死不做亡国奴”的誓言。

张秀昌 于庄突围战的前一天，与谢鑫鹤夫人一起去秀昌的娘家串亲，故没有拼死在战场上。谢鑫鹤去运西受训亦未参加于庄战斗。机枪营解体后，谢鑫鹤调离，秀昌与共产党接触渐少，后来不知谢鑫鹤的去向了。解放后无法证明郭部是共产党的武装力量，郭瑞林被视为杂团头目，张秀昌也便是反革命家属了。多年被误会，受歧视，挨批斗，后无奈改嫁到城关康市街。直到1986年编纂《高唐县志》搜集资料时，才搞清郭瑞林的真实面貌。由县志办牵头让张秀昌与谢鑫鹤夫人取得了书信联系。张秀昌在医院的病床上看到谢鑫鹤夫人在信上喊她“三姐”时，再也按压不住四十四年的委屈，便由抽泣突然爆为撕心裂肺地号啕大哭。憋了几十年的冤气，化为一声长啸。最终没有实现“姐妹相见长谈”的希冀，半年后，张秀昌便怀着遗憾、但没带着冤枉辞世了。

小敏 即邢春敏，清平镇邢庄人。他在小学受老师影响，十三岁便义无反顾地参加了抗日武装，成为八路军某部机枪营长郭瑞林的通讯员。他始终跟随在郭瑞林左右。在于庄突围战中郭瑞林受伤后是他坚决要背郭突围，被郭斥止，但一直守在郭的身边。在无防备的情况下，郭瑞林举枪自尽以后，邢春敏躲在附近一棉柴垛内。后被伪军找出，与没有突围的其他十四名战友绑在一起。傍晚时分，九个战友被推出枪杀了，邢春敏与其他五名战友第二批被推出村庄，刚到村口的水井旁，忽听到一声哭喊：“敏弟——！”转头看时，

只见团部邻家金庆哥在井台上为日军饮马，同时顿足喊叫着。这喊声惊动了一旁执马鞭的翻译官，这位中国人一时良心发现，他马上喊了一声“站住！”赴刑的五个人都停了下来。“哪个是你弟弟？要是撒谎一齐杀掉！”翻译官恶狠狠地瞪着姜金庆。金庆跑到邢春敏跟前扯着他被捆的胳膊说：“他就是！他就是！”邢春敏得救了，胳膊上的绳子还没解完，西边就传来了四声枪响。

邢春敏解放后参加了工作，退休前在大连市任物资局副局长。因“杂团”出身失掉了多次提拔机会。《高唐县志》出版后，组织部门将其参加革命工作时间上移到1940年，抹掉了简历中的“杂团出身”，还原了“老干部、老革命”的真实身份。政治、经济待遇皆以政策规定得到了落实。姜金庆，原名姜金录，在家务农，邢春敏不忘救命之恩，以其象亲哥一样对待。

日本兵掉队迷方向 刘文豹徒手战顽凶

1924年的古历腊月初，固河镇后坡村一刘姓农民家呱呱落地一男孩，其父见他四肢粗壮，虎头虎脑，便起名叫小豹（因东邻已有叫小虎的孩子了），按家族所定“文”字辈，大名就叫刘文豹。虽然是粗粮饭、土布衣，文豹却长得泼辣，到1937年十三岁时，身架就象十七、八的小伙子了。

“七·七”事变后，日军铁蹄南踏，10月15日攻占了高唐县城，但不久就拔营南下了。此时，刘文豹正在本村小学读书，因距县城有四十华里，一时还没受到日军的骚扰。但老师停了课本的讲解，一连数日讲些日军的罪行和国家的耻辱等新闻，说些抗日光荣、逃跑可耻的道理；要求学生要热爱祖国、誓死不当亡国奴。同时教唱了几首抗日歌曲。

1938年冬，日军再次占据高唐城，并建立了伪政权。后坡村位于高唐与禹城日军来往联系的高禹公路南侧，离路不足五里，受到骚扰就是常事了。学校老师逃难了，学生停课了。刘文豹与一些“不当亡国奴”的同学们在一块商定也要打鬼子。他们开始准备“武器”，有的从家拿出盖房修墙用的瓦刀，有的拿出削谷穗专用的削谷刀，刘文豹则拿出了他二爷爷卖西瓜时用的

切西瓜刀。孩子们天天在道旁的碾盘上、湾边流水沟的石板上磨刀，一边磨，一边比，看谁的刀最快（锋利）、最亮。几天之后，刘文豹的西瓜刀一下能砍断手指粗的小树。再过几天，一刀能斩断满把粗的榆树……刀磨亮了，磨快了，文豹家临街的小树也随着“小鬼子看刀——杀！”的喊声没了头，断了腰，一直骗得与地平了。

刘文豹因为个头高、力量大、刀法最好，自然成了孩子们的头头。有时他学着老师的样子喊着“一二、一”的口令，带队在街上来回齐步走，有时指挥着唱那首老歌：“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

刀磨快了，可以砍鬼子了，鬼子在哪里？他们手中有钢枪，能砍着他们吗？什么时候能弄到一支钢枪？刘文豹成年人一样地考虑起实战的需求来了。

日本鬼子烧杀抢掠的罪行从邻县禹城、平原、茌平，从高唐当地纷纷传来。刘文豹听到鬼子的恶行越多越残忍，弄支枪杀鬼子的想法就越急越强烈。

1939年早春，柳树还没发芽，人们还穿着过冬的棉衣，清晨还常见霜雪。一连几天不是北风就是南风地刮个不停，树梢上能听到狂风挤过的声音，大道上能看见尘土塑造的风形。一天，刘文豹吃过早饭，照例背起粪筐，将粪叉头放进筐内，叉柄挽在右臂中，上路去拾粪了。这是农村常见的积肥活路，甚至走亲访友时也背上粪筐，遇粪便拾。文豹顺前街东行，见有粪便就熟悉地右臂一抬，转动叉柄，执叉锄粪，筐不下肩，

斜后方一撩，粪便落进筐内。一连串的动作像体操，似舞蹈，粪叉耍得快当，颇有几分潇洒。

“砰！砰！”几声枪响从东邻村李集传来，给后坡村增加了慌乱。男人们牵上耕牛，背上细软，女人们抹把锅灰搓在脸上，扶老携幼离村避难。国民党政府不抗日，日军未到，他们先逃了，为逃避开脱，便事先夸张宣传，将日军描绘成洪水猛兽，不可抵抗。又闻日军在当地惨绝人寰的罪行，使不少人得上了“恐日”症。一听到日军要到的消息，便携家室逃跑。

驻禹城日军为抢民粮，一个中队荷枪实弹，进入李集，鸣枪示威，然后牵牛、夺车、抢粮食。因离驻地较远，不敢久留，中午时分，便抓丁驱车向禹城退去。抢粮车已远去十多里了，李集村内后街的小胡同，晃晃悠悠走出一个日本兵。一看便知他在某人家翻到了白酒，准是误将这六十度的烈酒当成日本十四度的清酒灌下了肚，醉倒了。待醒来时，日军离村已一个多小时了。他东瞧瞧，西看看，向东走一程站一会儿，又向西走一程站一会儿。最后没认准回禹城的东北方向，却向西北的后坡村跌跌撞撞地走来。

李集的枪声使后坡不少百姓提前出逃避难了。没走的老弱残疾也藏在柴禾垛后或地瓜窖内了。整个上午，村里寂静无声。午饭后，留在村内的刘文豹背着粪筐向村东头走去。在村头的那个高岗上还没站定，就发现一个日本兵，肩扛大枪离开李集步履蹒跚地向后坡走来。文豹心想：机会来了，机不可失。待日本兵走

近后坡村边时，文豹肩背粪筐当面迎上去。日本兵见到文豹警觉地端起“三八大盖”指向文豹嚎叫了一声，也不知说得什么话，文豹只好停下脚步。对峙一会儿，日本兵认为自己身高马大，面前是个小孩子，街上不见其他人，不会有危险，便将枪收起扛在肩上，向文豹靠近了几步，从态度上看缓和了些。接着又哇哇啦啦讲了一些鸟语，口中喷着浓烈的酒气。文豹用汉语问了他几句，见他没有反应，也是一头雾水。对话双方谁也不懂谁的话。小日本边说边打手势，见文豹总不理解越发着急。文豹则趁机大声骂道：“你们是土匪王八蛋！没爷没娘的野种……你妈的……”愤怒激昂地骂他祖宗三代，骂到痛快处，解气地笑笑。小鬼子听不懂，只是傻傻地跟着文豹的感情变化而转化着喜怒表情。

从鬼子的手势中，文豹早就知晓他渴得厉害，要喝水，只是故意耍他一阵罢了。“绝不能失掉这次大好机会，一定想办法杀了他，把枪弄到手。”文豹琢磨着，领着鬼子去找水。街上仍然没有人，走近村中那口吃水井旁时，突想：把他弄井里淹死！便走近井口指指井里的水对鬼子示意：你过来看看是不是要这东西？鬼子小心地慢慢地向井口靠近，并将头探在井口上方向下瞧。此时文豹刚想动手，却发现钢枪挂在鬼子肩上，若与鬼子一起落到井里，他死了罪有应得，可是这枪湿了还能用吗？只好另想办法。鬼子看看井中水，舌头在上下唇之间转了几下，便笑眯眯点点头，拍拍文

豹的肩，示意赶快弄水喝。此时鬼子的警惕性已失去大半了。文豹示意：走！去弄水！鬼子跟在文豹身后，向村西头走去。

文豹大门前刚刨走几棵大树，刨树留下的坑又深又大。“就把鬼子在这儿结果了”。主意已定，脚下步子大了。鬼子求水心切，紧紧相随，有时走在文豹前头。文豹从鬼子身后端详（看着并琢磨）着鬼子头，头戴钢盔，身穿棉军衣，衣领与钢盔之间只有“二指”（两个手指并起的宽度）的露出脖子的地方，就是这“二指”的宽度还在随着小日本行走的动作忽窄忽斜地动着。难度虽大，也只能用粪叉子插这儿了。树坑就在前面了，文豹将粪叉柄攥出汗来了，他放慢两步，鬼子又抢在文豹前头去了。说时迟，那时快，文豹熟练地放下粪筐，抽出粪叉，调正叉头五个尖尖的排齿，瞄准钢盔与衣领之间的那条缝，使尽平生之力捅了过去！不知是没有瞄准，还是那条缝变化太快，只听见“嚓”的一声，眼见一溜火花，粪叉捅在了钢盔的下沿上。小鬼子向前踉跄了几步，差一点趴下，但枪一直没离手。没有捅到要害处，只在鬼子绿色的钢盔上造出了一道白印。小鬼子回过神来，眼珠子红了，重新上下打量了一下文豹，只见文豹手端粪叉，小脸紧绷，双眼冒火，随时准备招架。小鬼子蔑视地看着文豹，摘下肩上的枪扔在一旁，明显地表示出：“要用枪制服这个中国孩子，太丢日本军的面子了。”将衣袖向上一提，猫着腰向文豹靠来，要徒手与文豹较量。文豹根本没把这个身强



力壮的敌人放在眼里：“你徒手，我要用粪叉那算欺负你，不能给中国人丢脸！”想罢，便将粪叉一扔，迎向前去。小日本依仗身高体壮，泰山压顶扑过来，刘文豹凭借身体灵活，黄雀挪枝闪一旁；小日本扑空嘴啃地，刘文豹翻身压上骑毛驴；小日本飞脚倒踢力落空，小文豹回身一拳中后胸……

一个是扑撞踢捶欲以力取胜，一个是辗转腾挪要以巧对打。来来往往又多次交手，小日本本来酒劲未退，再经翻滚旋转，已不能掌握平衡。文豹心如明镜，不胜则死，国仇在胸越战越勇。多次将小鬼子摔倒在地，几次拳脚击其头脸要害，鬼子鼻子破了，嘴角歪了，行动迟缓了。文豹照准其双腿之间的那个最要害处，使足力气狠狠一脚，只见小鬼子杀猪似的嚎叫着捂着肚子在地上滚起来。文豹紧打不敢放松，又是一顿拳脚，小日本不动了。再牢牢地卡住他的脖子，一分钟、三分钟……直到认定这个小日本确实死了，才放手。此时的文豹，突然全身酸软，松松地躺在地上，一点力气也

没有了。忽听又有脚步声，刚刚平静的心又陡然提到嗓子眼，抬头看时，是闻讯赶来的陈团的手枪班长，他在鬼子头上又补了一枪，然后帮文豹匆匆将鬼子尸体埋在树坑中。

年方十五岁的刘文豹，扛起了那支夺来的“三八大盖”枪。

故事到此本该结束了，但还有两件事需要交代一下。

文豹的父母认为鬼子尸体埋在家门口早晚要招来祸事。于是当天晚上便偷偷移尸村西的耕地中。日军回禹城后发现少了一兵，便多次到李集一带来寻找，来报复。文豹主张将鬼子尸体归还日军，便一天黑夜将尸体放在高禹公路上。此后鬼子骚扰次数有所减少。

文豹杀鬼子夺枪的事很快传到杂团头子陈盛堂耳朵里。那时杂团为谋发展，都举抗日的旗帜，陈团便以组织抗日的理由将刘文豹编入陈团二班。陈盛堂系国民党的地方势力，虽不积极抗日，但也不公开投降日军。刘文豹所在的“二班”是一些自愿并且积极抗日的青年所组成。他们的抗日军事活动是不经陈盛堂批准的。“二班”很快发展成排的人数，人们称其为“老二班”。刘文豹随“老二班”多次重创日伪军。最后一次与日军交手是在夏津、平原、高唐三县交界处津期店村的遭遇战。“老二班”一行二十多人，出津期店回防地固河，遭遇日军一个中队在马颊河堤口的阻击。敌众我寡，边打边退到津期店村内，鬼子尾追不放，直战

斗到“老二班”人自为战。刘文豹被逼进一个猪圈坑内，他利用有利地形射杀敌人，在圈坑周围倒下的鬼子尸体有九具之多。刘文豹最后被炸死在圈坑内。这次战斗毙敌三十多人，“老二班”战士几乎全部阵亡，与刘文豹一起战死的同乡就有刘敏、郑福岭、王兴木等九人。只有两人活了下来，一个是顾克功，他用堤边青草塞住小腹的弹洞，挡住多次流出的肠子，顺河而行，突出围堵，没有阵亡。另一个是郑吉兴，他被鬼子装进麻袋中，抬起狠摔，昏死后，被鬼子认为已死，捡了条命。1986年纂写《高唐县志》时，正逢顾克功从东北回老家探亲，访谈中，他对抗日时期那段历史记忆犹新，对刘文豹赞不绝口。他最后提出的要求是：把这些事写下来，让后人知道现在的幸福之花，是用先烈们的鲜血浇灌培育出来的。

与刘化溥反目 使邓协忱变脸

“七·七”事变，抗日战争爆发。中国共产党号召“全中国人民、政府和军队团结起来，筑成民族统一战线的长城，抵抗日寇的侵略”。主张各党派、各武装团体，捐弃前嫌，团结抗日。具有革命传统的高唐县人民，很快就掀起抗日高潮。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武装迅速壮大，先是以吴子杰为营长的高唐抗日游击营，给入侵日寇以迎头痛击。相继冀鲁边抗日游击第七大队（前身为第四大队）队长、高唐县第一个中共党员金谷兰率队与日寇迂回。吴子杰、金谷兰遇害牺牲后，韩宁夫便返回高唐故乡，重建中共党组织，先后发展党员四百多名，成立基层党支部三十多个。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开展抗日工作。

此时，八路军一二九师东进纵队，出太行群山，跨平汉铁路，活动在鲁西一带。津浦支队，东渡运河，挺进鲁西，出没于高唐县境。中共鲁西区党委领导的先遣纵队和青年纵队第三团也经常与敌人周旋于高唐县内。高唐县中共领导的地方抗日武装有第六区60多人枪的朱九武任队长的游击队，有活动在梁村一带的抗日民团40多人枪的张春岭部，后在张春岭率领下，加入了先遣纵队特务第三大队（下称三大队），还有活动

在清平一带的自发抗日武装郭瑞林部，自愿接受共产党改编，成为中共冀鲁豫军区第八团机枪营。高唐的抗日形势非常乐观。

此时高唐境内还有两支非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武装，基于民族气节，他们决心抗日救国，是中共抗日武装的同情、协同者。

一支武装是邓团。团长邓协忱，高唐尹集东北朱双槐庄人，中师毕业，“七·七”事变前为县教育局巡视训导员。抗日战争爆发后，他弃教从戎，卖地筹款，置办枪支，组织抗日武装，人称“邓团”。1938年被范筑先编为高唐国民抗敌自卫第三团，邓为团长。当年10月又被国民党第四专区专员袁聘之改编为第四区保安第三大队，邓为队长。同年底又被高唐国民党县长颜景岳改编为高唐县国民抗敌自卫团，邓为团长。一年之内邓部三次改编，最后由专区所属改为县属自卫团。只换编号不组织抗日。在邓协忱彷徨郁闷之时，看到了共产党领导下蓬勃发展的抗日形势，便主动表示向共产党靠拢。邓协忱是当时地方抗日武装中文化水平最高的头领，有组织鼓动能力，其武装发展很快，共产党和国民党均派员进入邓团做争取工作。中共高唐县委书记庞钧派中共党员房雪蓑借与邓协忱的同学关系，进入邓团做争取工作。由于共产党的深入工作和高唐抗日形势的蓬勃发展，邓协忱很快便提出加入中国共产党的要求。1987年在编纂《高唐县志》采访资料时，遇到四个尹集镇大张庄的原邓团士兵，他们还清楚地

记得：房雪蓑上课讲抗日救国的道理，早操时齐唱中共抗日歌曲的情景。至今还会唱《大刀向鬼子头上砍去》等歌。操毕后，邓协忱训话，多次在训话结束时大声问：“你们说共产党好，国民党好？”所有官兵同时回呼：“共产党好——！”当时的政治气氛已达到一定高度。

请批邓协忱加入中国共产党的函件在传递中，高唐县境内发生了一桩违反统一战线政策的事件。

另一支非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武装是刘团。这支武装在抗日战场上，奋力杀敌，成绩卓著。团长是刘化溥。

刘化溥，字洪泉，从青年起便蓄八字胡，人送绰号“刘胡子”，高唐县尹集西双庙村人。家境贫寒，曾在吴佩孚部当炮兵小头目，1934年逃回故乡。为防盗匪，参加了双庙守村护寨自卫队，并任队长。抗日战争爆发后，村内大户人家出钱、出枪，在护村自卫队的基础上，吸收他村人丁入伙，很快发展到一百多人，改称抗日自卫队，刘化溥任队长，人称刘团。

1938年冬，刘化溥率队截获了高唐县伪政府搜刮的民财巨额现金，开始了与日伪的对峙。

1939年初，刘团发展到五百多人枪，于平原县第五区伏击日军，杀死二十多个敌人，刘团也付出沉痛代价：团副贺宗余及十多名士兵阵亡。

1939年春，刘团配合中共武装青年纵队袭击驻梁村的伪团长李曰瑞，不久出师夏津县，在段庄与日军激战一天，毙敌十多名。日军退却，刘团凯旋。将敌首

悬于战车和闹市，为当时的“恐日症”开出了一剂良方。

1939年秋天，刘团配合中共武装肖华支队，歼灭了有千余人枪的伪军刘宝善部。

刘团与中共抗日武装、王克寇任政委的三大队关系最密切。战事相互配合，给养相互支援。中共的干部可到刘团去给士兵讲课，刘团的士官可进中共的地方党校学习。双方的军事行动相互通报，相互策应。双方官兵关系很协调。三大队首领王克寇到刘团后，官兵都直呼其为“王政委”，刘化溥到三大队后，官兵都称其为“刘团长”。这两支武装在抗日战场上是配合最默契的友邻武装，是当时高唐抗日形势大好的保障。

当时，高唐县境有共产党直接领导掌握的青年纵队三团、三大队、第六区游击队、第八团机枪营千余人的武装力量，另外有一二九师东进纵队和肖华支队（津浦支队）经常往来于高唐。又有友军刘团八百多人枪与中共武装协同作战，还有邓团一千四百多人枪，欲接受中共领导，高唐的抗日形势是中共主持沉浮，一派大好。

人非圣贤，孰能无过！小过小代价，大过大损失。

1940年初，中共鲁西三地委主要领导同志在执行统一战线政策上犯了错误，认为刘化溥部已发展到八百多人枪，官兵思想基础较好，纪律严明，战斗力强，缴获日军武器较多，装备也优于其他民团，是鲁西北抗日民团中素质最好的一支武装。为防止被国民党拉入歧途，决定武装收编刘团。拟收编后，原团人马不

动，编制不调，刘化溥仍任团长，只是让其接受中共领导。认为这样更有利于发挥刘团的战斗力，更有利于抗日行动。当时三地委对武装收编很有信心，认为刘团不会对中共武装设防，可攻其不备；刘团的所有情况都了如指掌，可谓知己知彼，有取得全胜的把握。经过多方面分析之后，围攻刘团的命令便由三地委下达到三大队，由王克寇率部完成武装收编刘团的任务。

王克寇在布置完各队的战斗任务后再三强调：“枪一定向天上放！谁打着刘团的人谁负责！”。

1940年4月5日，刘团在平原县境与日军周旋了两天多，这天下午甩掉日寇来到王明庄，全团人马准备晚饭。太阳接近地平线了，西天无一丝云，照得直晃眼。去年冻死的蓬蒿，围绕村边，似黄褐色穗头连在一起的大片谷地。逆光看去朦朦胧胧，閃閃烁烁，别有一番景致。

身着黄褐色军装的日寇，在枯蒿的掩护下，由西向东顺着阳光悄悄地向王明庄扑来。待刘团发现时，日军已到了眼前。刘团警卫兵迅速组织阻击。枪声响起，刘团很快拥至村口，摆开阵势，与日寇短兵相接，血刃格斗。日寇见偷袭不成，自知人少力单便扔下八具尸首绝尘而去。

刘团晚饭未吃又迅速转移。第二天上午，刘团回防驻在梁村东的大刘庄和高庄，欲进行整休，刘化溥随队住在大刘庄。午饭刚毕，大刘庄周围排枪骤起，当即便有通讯员报道：“王政委打我们了！”

“三大队能打我们？胡说八道，我毙了你！”刘化溥怎么也不相信这通讯员的报告。但从枪声听出这也不是日军所为。刘化溥满脸疑惑地凝固了，一分钟、两分钟过去了……在战斗打响后的每一秒钟都是万分珍贵的。

“三大队从东、西、北三面向我团攻来！”这是身边副官探信回来的紧急报告。这报告虽然是对通讯兵报告的验证和核实，但刘化溥仍是满脸迷惑，自言自语道：“王政委疯了吗？”随即下令道：“命令全团：随打随向南撤，冲出包围后再集合。枪要向天上放！记住，枪要冲天打，不要打三大队的人！”

这命令正是全团指战员的心意。刘团与三大队的士兵多是高唐人，多数又是平素都能喊上名字来的熟人、老乡、同学，怎么能立刻反目，刀枪相向、相互残杀呀！

围攻者的枪弹飞向高空，突围者的枪弹亦飞向高空，好象双方在共同攻打高空的某个目标，又象双方在进行射高的团体比赛。当然刘团突围胜利了，当然双方均无伤亡，就是子弹损耗不少。

围攻、突围像场游戏，但这终究是一场真枪实弹突发的战事。对此攻方不好解释，直到四十六年后的1986年夏天，当时任三地委宣传委员的韩宁夫（时任湖北省人大主任），在县委招待所谈起了三大队打刘化溥的事情。在介绍了从研究决定到武装围攻的全过程后，他无限感慨地说：“是我们不够朋友，违背了统一战线政

策，打了自己的朋友，给当时高唐抗日形势带来负面影响。”“打刘团的初衷，只想收编，想把朋友关系变成同志关系。没想到把朋友给打跑了。”语气中充满自责和后悔。

当时不但打跑了刘化溥，而且还吓跑了邓协忱。在邓协忱加入共产党的手续正在办理的节骨眼上，发生了刘化溥被围攻的事情，使邓协忱认为：“刘化溥与共产党关系最好，还会突遭攻击，共产党是靠不住的。”于是邓协忱在外因影响下，内因起了主导作用，踏入与革命相悖的歧途，滑进了历史的垃圾箱。在禹城杂团头子、国民党专员李连祥的蛊惑下，割断与共产党的关系，带领高唐部分杂团武装投向国民党，变脸以后，成为杀害革命人民的凶手，变成共产党的敌人。在统战工作中，做错一件事使高唐县境内只有日伪一方反共、三方（共产党武装、刘团、邓团及其追随各团）联合的大好形势落入三方（即日伪、刘团、邓团等）反共的低谷。李连祥则借机组织高唐禹城两县隶属国民党的地方武装杂团，诱逼刘化溥参与组成反共大联合，并在高唐城东北的徐官屯点燃了反共战火，使日伪政权渔翁得利。

1940年5月初，中共鲁西三地委在高唐县境内、在三大队等中共地方武装保卫下以流动形式召集有关县的部分负责同志开会。此举被禹城杂团头子李连祥侦知，他便组织高唐、禹城的国民党杂团围攻中共鲁西三地委及三大队。

5月5日凌晨，李连祥率团并指挥陈盛堂、程荆璞、赵杏符、吴春阳、云茂才、袁采蓉、邓协忱、刘化溥等杂团二千余人，将三地委和三大队包围在尹集北的田寨村。三大队等中共武装保护着地委等中共机构人员边打边退，撤至徐官屯后，已被层层围困，再撤无路了。国民党杂团人多势众合力强攻，三大队以一顶十拼命死守。激战三天三夜后，三大队几近弹尽粮绝，面临危局。8日的晚饭后，三地委集合连以上干部在村中的坑塘内开紧急会议，决定发挥单兵作战的优势，分散突围，然后到大峰山根据地集合。正在准备处理文件和枪支时，三大队政委王克寇接到来自包围圈上禹城国民党地方武装团长赵杏符送来的密信。了解信的内容之后，紧急会议的情绪马上由低沉迷惘转为高昂自信，与会人员的脸上笑容驱散了愁云。不需分散突围了，会议布置了当晚集体行动的事宜。

深夜11时多，四处静悄悄，偶尔有几声马嘶在夜空回荡。三大队第一连为前卫，第二连为后卫，其余武装人员在两边，非战斗人员在中间，排成六路纵队在庄稼地中无声息地冲向东北方向。断后的人员将几匹善叫的烈马用缰绳紧吊在村边的枣树上，使它不舒服便不时地扬头嘶叫，给围攻者送去“三大队还在村中”的信息。这突围的东北方向正是赵杏符部的防地。抗日战争爆发前他是位名望甚高的教师，三大队政委王克寇是他的得意门生。此前赵杏符曾多次将有发展前途的抗日青年介绍给王克寇参加共产党的抗日部队。

师生关系一直很好。

中共鲁西三地委和三大队等中共武装，未遇一兵一卒便从赵杏符的防地跳出冲了三天冲不出的包围圈。然后，大队人马向东南急行而去。天亮时到达了禹城县的九寨寺村，所有中共机关人员和三大队指战员安全无损的走出了危局。保住了力量，但丢失了地方。从此，平原、禹城、高唐一带的抗日根据地又沦入日伪的铁蹄下。

徐官屯突围战之后，赵杏符被李连祥追赶到平原县境杀害。邓协忱率一千四百余人枪归顺了国民党。刘化溥坚持初衷，不睬国民党封送的武城县长的流亡职务，不能与共产党合作，也不再与共产党为敌，便率所属八百多人枪开赴聊城堂邑一带，另辟抗日战场。离开共产党支持的刘化溥，最后与二百多名官兵血染堂邑县张官营，壮烈牺牲在抗日战场上。

一次统战工作的错误，导致了两败俱伤的结果。这铁血的教训，再次证明毛泽东将统一战线列为革命三大法宝之一的伟大和英明。这教训时刻警示人们：统一战线工作，在特定环境中能起决定成败、胜负的作用。后来人必须认真执行统战工作的路线、方针、政策，不可有一时一事的疏忽。

白手起家创大业 自力更生不扰民

——（一）孙长山治军有方

孙长山于1910年生于高唐县城东孙家庙村的一个贫农家庭。虽因家境赤贫只上过一年小学，但他生性聪颖，毅力过人，凭自学摘掉了文盲帽子。由于家境艰难困苦、被欺压、受冷眼，使长山在少年时期便磨炼出疾恶如仇、刚正不阿、胆大心细的性格。待到二十岁时，已出落成一条汉子：身高近六尺，膀宽腰圆，行动敏捷，勇敢果断。一举一动干脆利落，一招一式恰如其分。话语精确，掷地有声。两道卧蚕眉微微上挑，一双透情眼闪闪有神，鼻直口阔，脸方耳垂，满脸充溢着智慧和自信，确是一位干练俊秀的小伙子。

1937年，“七·七”事变发生不久，日寇的魔爪便伸入高唐县境，激起了高唐人民的反抗。或投资，或出人，全县各地迅速出现若干支抗日武装。日寇则对抗日根据地进行疯狂的“扫荡”、“蚕蚀”，实行惨无人道的“三光”政策。先后在高唐县境内的南镇、王笠庄和孙长山祖辈生息的孙家庙村制造了惨案。国民党县政府则消极抗日，积极反共。抗日军民处于日伪和国民党军的夹击中，抗日形势非常严峻。孙长山目睹了日寇的罪行，辨清了国民党的嘴脸。再也按捺不住抗日

雪耻、救国救民的决心，毅然脱掉了民国县政府警备队战士的服装，于1938年别老母，弃妻儿，到禹城、齐河两县交界处找到共产党的队伍，参加了八路军。在王克寇任政治部主任的冀鲁边游击支队当战士。入伍后，他努力学习，刻苦操练，认真工作，成绩卓然，思想觉悟迅速提高。1939年被中共党组织吸收为党员。1940年，长山被部队选送到冀鲁豫军区第二教导队培训深造。1941年学业结束，分配到中共抗日根据地齐禹县第四区，任四区分队长。此时的四区分队只有长山一人。他在中共县、区组织的领导下，以华店村为中心，开展抗日活动，建立发展四区分队武装。一年多的时间，四区分队在与日伪军的多次较量中成长、壮大，发展到百余人枪，成了距敌占区和济南市最近的、战斗力极强的一支抗日武装。四区分队与百姓同舟共济，使敌人闻风丧胆。

孙长山治军有方。部队要打仗，要吃饭，要穿衣，要疗伤，要治病，还要制造和维修武器。四面临敌的封锁线，阻断了物资流通，百多人的队伍的给养，形成了沉重的经济负担。长山时时事事将祖国和人民的利益放在首位，立志不扰民，不劳民，走自力更生的路。在四区根据地内分散建立了七专业基地，解决了部队的所有费用支出，粉碎了日伪顽对抗日根据地的经济封锁。将四区分队发展成一支驰骋抗日战场的劲旅。孙长山常对战士们讲：“无论在什么情况下，我们也不能向群众伸手，只有反动军队才掏老百姓的腰包。靠捐、

摊、敛、要而生存的部队，绝不是人民的军队。”为了减轻百姓负担，孙长山同志六十多年前在齐禹县第四区就实现了“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的“南泥湾”精神。

在明机寨建立了医疗所。有医护等工作人员八名。除及时处理伤病员外，还为附近百姓服务；

在宋庄建立油坊，有六名工人，土法打制黑豆油。除供四区分队食用外，所有利润由四区分队支配；

在华店建酿酒店。当时经理为宋长文，带领五名工人烧酒。所有销售收入，全部用于四区分队开支；

在姜楼吕庄开地二亩，种粮种菜。供部队食用；

在棉花张庄建被服厂。有六名工人，专职为官兵做衣服；

在明机寨还设有养畜基地。大老孙和朱家航负责喂养马匹，可随时供部队使用；

在高桥村建有修械所，制造地雷、手榴弹，维修枪械。当时长山同志的夫人，便在此所当工人兼保管，保存的长枪全部藏在秫秸捆中，从未出现“闪失”。孙长山的儿子孙宝亭当时也随母亲住在此处，在学校中与其他同学组成儿童团，站岗、放哨、做宣传，亦为抗日做出了贡献。

由于孙长山的细心谋划，百余人枪的四区分队，由七大专业基地为其提供给养和临战服务，解决了所有的后勤问题。也为严明纪律、不扰百姓、提高队伍素质创造了有利条件。这不但密切了军民关系，同时提高了部队的战斗力，以孙长山为队长的四区分队多次与

日伪交战，均取得胜利。

1945年6月12日，抗日战争凯旋的前夜，孙长山同志与其警卫员丁传才、宋金山同时在与国民党军李连祥部的拼杀中英勇牺牲。鲜血尽洒在齐河县的棉花张庄。孙长山给华店、棉花张庄一带民众留下了永恒的思念。直到2004年10月，已是岁过半纪，人延三代了，当笔者与孙长山的儿子孙宝亭在棉花张庄村头遇见一位年仅二十多岁的少妇，为寻问道路申明来意时，那少妇竟然说“都知道有个打鬼子的孙队长，是英雄，是烈士，我母亲常讲他的故事。”

在少妇的带领下，找到了抗战时期的孙长山的房东——八十岁的王秀兰老大娘，她已是满头银发、一脸皱纹的老人了。当她知道站在跟前的就是孙长山的儿子时，老人眼睛一亮，嘴唇翕动不止，一把抓住孙宝亭的手：“山林！山林！你是山林啊！至今常念叨孙队长啊！”意识有点模糊的老人，却对五十九年前的事记忆犹新，口中喊着孙宝亭的乳名，老泪已沿着眼下的皱纹拐来折去冲过下颌。

孙长山是个好人，人们永远想着他；是位烈士，群众永远纪念他；是深入人心、世代相传的英雄，百姓永远把他当成崇拜偶像。

勇破敌阵救政委 敢入虎穴抓“舌头”

——（二）孙长山有勇有谋

1939年12月，中共鲁西区四地委决定：建立齐禹县委，辖区为禹城县和齐河县的津浦铁路以南地区（津浦铁路从齐河西北入境东南出境，将齐河县分成南北两片）。不久便成立了禹城县抗日民主政府和人民武装——县大队。齐禹县民主政权在斗争中巩固，抗日武装在战斗中壮大。到1942年，中共齐禹县委已发展到七个区委、区公所和武装区分队的规模。

齐禹县第四区，是北临津浦线、南近济南市的一块红色根据地，也是插进日伪要害部位的一把尖刀。战斗频繁，流动性强，今弃明占的拉锯现象最为严重。1942年四区分队已发展到八十多人枪，下分三个排的规模，武器装备为步枪和手榴弹，是中共齐禹县抗日武装的中坚力量。四区分队除抗日外，还需还击不抗日专反共的国民党地方军阀李连祥的进攻。

四区分队这把尖刀，在日伪和蒋军这两块顽石上砥砺而锋利，在两方战火中锻炼而挺拔。先后与县大队配合，在华店日伪据点攻坚战、闫庄偷袭战、薛官屯遭遇战、大马张突围战、油坊截击战等战斗中立下了赫赫战功。另外，还在范庄、伦镇、明机寨、小孙庄等

战斗中发挥了主力军作用。最能显示四区分队智勇能力的是小郎屯营救战和护送刘贤权司令员过津浦铁路的两次军事行动。

1942年，是齐禹县抗日战争打得最艰苦的一年。中共第四区委和区公所，在四区分队的保护下，不停地转移，基本是一天换一个地方。这年十月，秋收已毕，田中无禾，视野无遮拦，这便增加了游击战的困难。日军却借机沿津浦线一带开展“铁臂合围”的大扫荡。四区分队接到县委“保存力量，保护政权，寻机消灭敌人”的指示后，孙长山组织全队人员认真学习上级指示精神，并从思想上、组织上、物资上做好了粉碎敌人“铁臂合围”的一切准备。

十月十二日傍晚，县大队副政委张治安率领不足三十人的警卫排，由华店出发到小郎屯宣传减租减息政策，晚上便住宿在小郎屯。第二天黎明，哨兵突然发现日伪军分两股由南而北向小郎屯左右包抄而来，很快形成包围圈，在距村庄里许的地方停了下来，寻找有利的地形地物，做着战前准备。警卫排很快侦知：小郎屯北、东、西三面为日伪主力，南面为附近各据点抽调人员组成的临时联合部队。张治安决定，不能盲目突围，将防守重点放在村北，做好死守的准备，同时派通讯员小李潜出包围圈，速请四区分队和县大队支援营救。

十月十三日的拂晓，县大队警卫班通讯员小李突然来到孙长山所在的棉花张庄，通报了县大队副政委

张治安被日伪军围困在小朗屯的危情后，请求火速救援。孙长山一面派员去县大队求援，一面组织全队人员急速向小朗屯进发。

通讯员小李刚刚离开小朗屯，日伪军攻打小朗屯的枪声便从四面八方一齐响了起来。屯内张治安指挥着警卫排以一当百地抵挡来自各方的进攻。本来就不多的弹药越来越少，日伪军的包围圈越来越小，战情已十分危机。此时，孙长山带队赶到了小朗屯。根据小李介绍的敌情，他胸有成竹地命令三排快速迂回到村北，从敌人背后佯攻，吸引日伪火力，减轻村内压力。孙长山亲带一、二两排战士，在村南距敌约一里的敌后，摆开东西向的长阵，猛烈开火。日伪军背后受敌，惊慌万状，但包围圈阵线不溃。孙长山从警卫员梁连川手中接过步枪，连射五弹，五百米外的敌阵中应声倒下四人，这段敌阵出现骚动。孙长山命令全体战士上好刺刀，随其冲锋。他高喊着：“跟我来！”箭离弦般地跑在队伍最前边。队长冲锋陷阵，不怕牺牲，所有士兵不甘落后，争当英雄。在“杀”声震天的拼杀中，将日伪军的包围圈撕开一个缺口，杀出一条血路。留一个排就缺口处向东西两边扩展阵地，保住出路。孙长山带一个排突进小朗屯，与村内的警卫排会师后，保护着张治安由出口突围。孙长山高声喊着：“你们先走，我来断后！”最后一个离开小朗屯。四分队的战士已习惯了孙队长的指挥口令：冲锋时总喊“跟我来！”撤退时总喊“你们先走！”

突围成功后，县大队全体官兵也已赶到，对日伪军形成反包围之势，从更长的战线上向敌人开火。粉碎了日伪军欲组织追击的企图，敌人弃尸二十多具，仓皇逃走。此战四区分队无一伤亡。

此后不久，四区分队接到了护送刘贤权司令员过铁路的任务。

1942年底，日军已侵占大半个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抗日统一战线在全国已经形成，敌后抗日活动蓬勃发展。日军所到之处均遇到中国人民的强烈抵抗。数量不大的日军想霸占版图广大的中国，喻此为蛇吞象不为过之。日军为适应频繁调动军队和物资的需要，必须保障南北交通大动脉津浦铁路的畅通无阻。齐禹县第四区分队也将斗争目标集中在津浦铁路上。经常在夜间组织群众掀铁轨，拆枕木，阻断日军交通运输。1942年的秋天，运回的铁轨、枕木和电话线杆子就堆满了四区分队驻地棉花张庄的一条后街。

日军则集中优势兵力“扫荡”、“清乡”，动员地方伪政权全力保护津浦铁路的畅通。临路村庄不分大小均建据点、碉堡。距铁路十里之内“强化治安”。沿路密设岗哨，持枪守候，日夜不息。另有装甲车在铁路上往返巡逻，黑白不停。组成一道火力保护线，成了铁路两侧抗日军民不易跨越的屏障。

津浦铁路由西北而东南斜穿齐河县境，将齐河县一分为二，铁路南与禹城合并后隶属冀鲁豫军区；铁路北仍称齐河县，受冀鲁边（后改称渤海）军区管辖。

两大军区常有人员及物资往来，为安全横过津浦铁路，急需开辟一条安全通道。

津浦铁路上的三等小站王子庄火车站，位在晏城、禹城之间，不被日伪重视。又因抽调大部分兵员到站外易出事故的路段站岗防守，故王子庄据点的兵力设防较弱。因此，齐禹县委决定在王子庄火车站开辟横过铁路的安全通道。这辟路护送的任务理所当然地落在了距王子庄最近的四区分队身上。队长孙长山的肩头又增加了一副重担。

王子庄紧临铁路，车站与村舍相连。在火车站东南侧有一日伪据点，据点内有高高的两座碉堡，因堡高三层，人称炮楼。这炮楼居高临下，西北能控制整个火车站，东南可封锁公路和铁路的交叉口。据点内常驻日军一个排、伪军一个连的兵力，配有轻重机枪和三门小钢炮。为及时掌握敌情，孙长山借日伪抓役之机，派进了两名线人做炊事员，不定期地借买菜等机会将情报送往王子庄村头的老姚家。据此，孙长山多次顺利地完成了护送任务，亦多次获得上级表彰。

日军也非常狡猾。自护路斗争节节失败后，他们便三五天调动一次据点内的人员，时间、人数不定。兵器设备随人更换。岗位设置及换岗时间皆无规律。使原有传送情报的方式无法适应快速无规律的变化，给孙长山出了道难题。近几天孙长山正处在寻找解决难题方法的苦思冥想中。突然接到上级命令：当天（1943年元月16日）晚上12时前护送冀鲁豫军区第一军分区

司令员刘贤权同志跨越津浦铁路，去冀鲁边军区任政治部主任。

为万无一失地完成这不同寻常的护送任务，孙长山设计了随机应变的多种方案，但所有方案均以精确的敌情为条件。为了解16日当天据点内的详情，孙长山几次派人到王子庄老姚家联络，均没获得据点内的情报。时间一分一分地过去，孙长山在院子中一圈一圈地转着，眉头越皱越紧，脸色越来越沉。已是晚上八点了，必须在十点之前弄清据点内的情况，并回到防地棉花张庄迎接首长，刻不容缓，刻不容缓！突然，孙长山停住了脚步，只见他捏紧的拳头在空中一挥喊道“丁传才！”

“到！”话音未落，这十九岁的警卫员丁传才已站在孙队长的面前。他中等身材，反应灵敏，像只轻巧的小燕子。

“收拾一下，只带短枪和两颗手榴弹，随我出发，去敌营抓个‘舌头’！”孙长山命令道。

孙长山向一排长低声交代了迎送首长的第二方案后与丁传才轻装上路了。后来从一排长的口中得知这第二方案是：如果孙长山在晚上十点半前没有归队，那是在抓“舌头”的过程中与敌人火拼了。枪声定会将站东南铁路上的日伪岗哨招回据点。四区分队的三个排由一排长带队全部出发先迎接首长，然后在王子庄站南的小松林处护送首长越过铁路。

孙长山与丁传才进入敌占区后，在夜幕的掩护下，

利用道沟、堤崖、坟墓地势雀跃前进，很快到了王子庄。庄头有一个矮墙破屋的宅院，这是四区分队与碉堡内两位线人的联络点——老姚家。两人轻捷地翻过土墙，敲响了屋门。屋内并没有亮灯，屋内外几句低声的对话后，屋门开了，二人进了屋，仍然不点灯。

“据点里的人还是没送出情报来。估计敌情没有变化。前天晚饭后曾见炊事员跟着一个日本军官和一个日本婊子从据点内出来，到临近的一家酒店喝酒。我装做买酒的去店里转了一趟。半夜他们才回据点，据说那日本军官是军需长，是一个酒鬼。据点内不允许喝酒，他不得不在晚上悄悄地出来过酒瘾。”老姚将所知情况一口气儿汇报完毕。

随着老姚的汇报，在黑暗中就能发觉孙长山的眼睛逐渐亮了起来：“我们到据点门口看看！”

三人穿过一个长长的胡同，来到据点对过，刚刚隐身在酒店左侧的一家断墙之后，借着据点大门之上的灯光就看见紧闭的大门右边的小门慢慢无声地开了，接着钻出两个人来。从衣着上能分辨得出是一官一兵的两个日本人。

“后边那个就是军需长！”老姚非常肯定地说。

“认准了？”孙长山紧叮一句。

“绝对没错！”又是一句斩钉截铁地回答。

“你千万不能暴露。赶快回家，注意隐蔽。”随着孙长山命令似的低语，老姚消失在夜幕中。

日军士兵斜挎盆枪在前，军需官赤手在后，刚刚踏

进胡同口的黑影，酒店就在眼前，酒香扑鼻而来，口水直冲双唇了。孙长山像猫捉老鼠般，右手紧握手榴弹，陡然从断墙之后跃出，两步便到了军需长背后，随即用前胸紧紧顶住军需长的后背，左臂将他的脖子由前往后勒紧，用力一揽一提，阻其呼吸。这一套三式的动作是在一秒钟之内利落完成的。只见军需长全身酥软下坠，没有一点挣扎能力了。说时迟，那时快，前边的日本兵听到动静，回头的同时伸手胯下取枪。千钧一发之时，孙长山右手举起手榴弹猛力向日本兵头上砸去。只听“嘭”的一声，那日本兵顿时没了骨头，全身软塌下去，躺在地上。丁传才迅速转过来，又死死地掐住日本兵的脖子，确信他没有还阳可能了，才松开手，取下日兵的盒枪，然后将死尸掩藏在断墙之后。孙长山铁臂之中所夹的军需长一想挣扎，孙长山就用力一夹一提，然后松一下让其喘一口气。就这样紧一阵松一下地控制着军需长，既不能让他获得反抗能力，也不能将他勒死。孙长山装起手榴弹，丁传才斜挎上盒子枪，两人将军需长反手捆住，用毛巾将其嘴封牢，连推带架地将他带上了回营的路程。

急奔十多里，离开敌占区，回到了棉花张庄。找来四区分队的翻译员，开始对“舌头”审问。在军需长相信了我们的政策后，将据点内的所有情况都供述出来，孙长山将其口供与以前所掌握的军情对比分析，认定军需长提供的情况是真实的。有一句口供使孙长山兴奋不已：据点内晚11点半是站岗者与12点上岗者一同

到伙房吃晚饭的时间，全据点空岗半小时。对这一点，孙长山从不同角度再三对军需长提问，进行核实，均得到肯定的回答。孙长山觉得有了把握：“半小时足够了。”

十点半，审问结束。孙长山集合全队人员，在简短的动员后，强调指出：“今天护送的是司令员，要万无一失地完成任务，不管付出多大代价，也要护送司令员安全越过津浦铁路。”队长的命令很快变成战士的行动：一排悄无声息地出发，埋伏在王子庄周围，所有枪口直指日伪据点，只待队长一声令下；二排利用地形掩护，人自为战，分散埋伏在通向王子庄在敌占区的路段两侧；三排随队长行动，出村去迎接司令员。

刘贤权司令员及夫人王晴军医由冀鲁豫军区姜科长和两名警卫员陪同相送。进入齐禹县境后，县长孙馨远、县大队副队长李达、副政委张治安带领县大队一个连将刘贤权司令员一行于晚11点前准时护送到棉花张庄。护送过铁路的任务则由四区分队完成。军区姜科长奉命不过铁路，当夜与县大队的一连战士一起押着日军军需长原路返回。

时间太紧，来不及进营，就在村头，孙长山向各位首长做了简明汇报后，其事先布署和过铁路方案均获得诸位首长的一致赞同。

孙长山先让战士用早已备好的粗线棉包皮布折叠数层后，分别将八只马蹄捆包起来，给战马穿上了棉软的消声鞋。然后嘱咐大家：“前面不远就是敌占区，

由我领路，三路纵队并行，一切行动不准出声！”说罢，孙长山走在队伍前头，尖兵似的离开大队约十几米远。后边中路是县大队的两位领导，紧随其后的是县长，再后是两匹战马上的司令员和夫人王晴，最后是司令员的两位警卫员。两边是第三排战士。这支长不过十米不足三十人的精干队伍，在黑夜中向王子庄进发。

这元月十六日，正处“三九”寒天，是一年中寒冷的时段，夜间又是一天中最冷的时候。满天星斗像凝固的冰点，村庄黑影像是泼墨的国画，急进的队伍像无声电影中的镜头。呼出的热气凝在胡须和眉毛上成了水珠，瞬间转为冰珠。周



围一片寂静，虽然看不见路两边早已埋伏好的一个个的战士，但心底却感觉到那一双双机灵的眼睛。队伍进了王子庄，仍然是一片寂静。

“现在是十一点三十五分。”李达低声告诉孙长山。

“正好！”孙长山加快了脚步，同时低声命令三排战士：“做好战斗准备！”战士们边走边从肩上摘下步枪，提在手中。这支三路纵队紧跟孙长山绕过日伪据点大门，急转弯，紧贴碉堡外墙沿小道向铁路奔去。

离碉堡不远的铁路两旁，有两堵高高厚厚的石墙，顺路长约二十米，给铁路制造了一个短胡同。这是为防抗日空军袭击而给火车修筑的掩体。因该掩体只能掩藏火车头，故人们称其为“钻头不顾腩”。这高高的石墙，晚上正好遮挡住火车站射出的灯光，同时投在地上两片浓浓的黑影。孙长山带队就从这黑影中穿过了铁路。然后向北快速地冲去。约行五里路，按计划遇到了齐河县长李聚五带队来接。短暂的对话后，孙长山带队返回，在王子庄带上一排，沿路收起二排，很快回到营地，胜利地完成了护送刘贤权司令员的任务。

齐禹县四区分队完成了任务，文章到此应该止笔了。但是，齐河县在这次护送中却遇到了麻烦。不能不在此赘述梗概。



齐河县大队在县长李聚五带领下，保护着司令员一行继续北行。只要过了脚下的这大李庄便到根据地了。护送队伍在大李庄穿小巷，走僻路，来到村北头，就要出村时，以天际一抹白云为背景，突然发现一股敌军向大李庄扑来。李聚五马上命令队伍返回，从西口出村。到村西口时，发现敌人已摸到村边。无奈，队伍退回村中。经侦知大李庄已被伪军张德新部及日军一部团团包围。

突围战从夜间1点打响，一直战到第二天的中午，战斗十分惨烈。齐禹县大队副队长李达及王晴同志在战斗中不幸牺牲。刘贤权司令员虽然在众战士拼命护卫下冲出了包围圈，但也身负枪伤。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刘贤权同志受少将军衔。先后在解放军中任要职，于济南军区任副司令员时还多次提起齐禹县四区分队护送他过铁路的往事。

现将该文涉及到的几个人物的资料附后。

刘贤权 1914年生于江西省吉安县。1929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0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先后任连指导员、师卫生部政委、师政治部民运科长。参加二万五千里长征。后任八路军一一五师三四三旅政治部民运科长、东进抗日挺进纵队第五支队政委、运河支队政治部主任。1940年9月任中共鲁西区第一军分区司令员。1941年7月，任冀鲁豫军区第一军分区司令员。1943年1月任冀鲁边军区政治部主任、代理冀鲁边军区司令

员、渤海军区第三军分区司令员、第二军分区司令员。后调牡丹江军区，先后任副司令员、司令员、东北民主联军第一纵队三师政委。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副军长。后赴朝任志愿军军政委。回国后先后任海南军区第一副司令员、沈阳军区参谋长、兰州军区副司令员兼青海省军区司令员、铁道兵政委、司令员、济南军区副司令员、军区顾问。1955年授少将军衔。第四届全国人大代表，中共第九、第十届中央委员。

李达 原名李荫楠，1910年生于禹城县三里桥村。193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任八路军一二九师武装工作团参谋。1940年任禹城县独立营营长。1942年任齐禹县大队副大队长。1943年元月护送刘贤权司令员时在齐河县大李庄遭遇日伪军，英勇杀敌，中弹牺牲。

孙馨远 原名孙德明，1911年生于齐河县孙庄。1937年9月自发组织抗日游击队，任队长。1938年任山东省第六区抗日游击第二十八支队副司令。不久任齐河县长。1940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42年夏任齐禹县县长兼县大队队长。1945年秋，随军北上，先后任内蒙古库伦旗旗长兼旗大队队长、东北北镇县县长兼县大队队长。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先后任辽西省交通厅副厅长兼公路局局长、粮食厅副厅长，1959年1月因腐化罪入狱，1962年1月提前释放。1965年任沈阳市第一粮食库副主任。1981年1月离休，1990年2月病故。

李聚五 原名李建奎，1903年生于山东博山县。山东省立济南第一师范专修科肄业后，于1929年在青岛海滨女子中学任教。1930年在平度中学加入国民党，并任县党部委员。后任教济南第二中学。1931年任教齐河县乡村师范。1935年弃教从农，于齐河县铁路北福王庄买地80亩，植棉花，栽果树，种蔬菜。“七·七”事变后，毁家纾难，在齐河县组织起一支几十人的抗日队伍。1938年5月，任范筑先部第十二支队参谋长，后任鲁北支队参谋主任。1941年任齐河县抗日政府县长兼县大队队长。1943年元月率县大队护送刘贤权司令员时，在齐河大李庄遭遇日伪军，尽全力保护刘司令员突围脱险。1946年4月25日，率县大队抵抗国民党军进攻中牺牲。渤海军区党委，据其生前意愿，追认为中国共产党党员。

张治安 原名张泰祥，又名张子安。1917年生于长清县庄稼村一贫苦农家。“九·一八”事变后，他参加了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七·七”事变前便参加了长清县各届人民抗敌后援会组织的游击队。“七·七”事变后，便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先后任长清县大峰山抗日游击队司务长、八路军山东运河支队连指导员、冀鲁豫军区第一军区特务营总支部书记。1942年7月，任齐禹县大队副政委，后任冀鲁豫军区三团政治处副主任、齐禹县委书记兼县大队政委。1945年后任冀鲁豫军区第一军分区团政委、晋冀鲁豫军区第十一纵队团政委。1949年任第二野战军五兵团十七军五十师一五

0团政委、后任师政治部副主任。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先后任五十师政治部副主任兼贵州军区镇远军分区政治部副主任、主任、副政委、西南军区铁路工程兵师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师政委、解放军铁道兵政治部副主任、顾问等职。1985年1月离休，1987年11月病故。

王克寇 1916年生于禹城县董屯村一农民家庭。原名王汝廉，又名汝清、禄清，字明波。193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7年8月于平原乡村师范毕业时，请求校方在毕业证书上改名为“克寇”以表抗日到底的决心。先后任禹城县第八区青年抗日救国会政训主任、中共禹城县委员，后任书记、中共鲁西北特委委员。1938年7月任八路军冀鲁边游击支队政治部主任。1939年1月，任八路军津浦支队新一营武装部长，后任中共鲁西区委委员、战争动员部长、八路军一二九师独立旅武装工作团团长。1939年9月任一二九师先遣纵队第三大队政委。1940年9月，任中共鲁西区五地委书记兼战争动员部长。1941年任冀鲁豫军区第四军分区基干团政委。1942年12月，任第一军分区二团政委兼政治部主任。1944年5月，在东阿县牛角店（原属平阴县）战斗中牺牲，英年早逝，年仅二十九岁。

三条好汉被追尾 一双旧鞋打突围

李佩明，新中国成立后的高唐县第七任县长。革命军人出身。1945年10月，平汉战役负伤致残，走路跛脚。但他从未认残，凡是健康人能干的事他都能干，就是行路也不比健康人逊色。他开朗健谈，心胸坦荡，他任县长时两位副县长也都姓李，一听喊“李县长”经常是三人同时发愣。有一回李佩明笑道：“这样吧，我叫瘸子县长，李风强常不刮脸，他叫胡子县长，李雪云是女同志有辫子，就叫辫子县长。”是玩笑话，也实在是区别称谓的唯一方法了。李佩明从无官架子，工余时间与同事或下级常是拍肩搭背地讲些或荤或素的故事，同志们与他都无间隔。人们口中的“瘸子县长”，绝无半分不尊重，而是无比亲切的昵称。

李佩明的党性、原则性又特别强，对党忠心耿耿，为人民服务一心一意。县内几次河水决口，他到现场一声令下，身先士卒，群众一呼百应就堵上了。县际间多次边界水利纠纷，械斗一触即发，李佩明到了，双方火气小了，问题很快解决了。

为革命需献身视死如归，遇危难动脑筋逢凶化吉。李佩明的忠心和解决问题的能力，早在他青年时期就表现了出来。下面要叙述的故事，便是他人生长河中

的一朵浪花。

1947年，冬天过去一半多了，小雪也没有下一场，干旱，下冷。

解放战争在全国正如火如荼地进行着。

由南向北的马颊河，在鲁西北恩县、夏津、高唐的交界处，右转向东北方向奔去。这里夏天流缓河宽，冬天，它缩成一条细流，在河心的冰盖下流淌着。宽阔的堤内河滩上是一眼望不到尽头的枯黄的芦苇，寒风吹过，干死的苇叶飒飒作响，抖光了苇絮的秃穗机械地随风起伏着。这兵荒马乱的年月，人们只忙于打仗、保命，没有人记挂着那儿亩苇子，所以它们从秋天站到了冬天，也没等来主人收割。

这马颊河西岸的小李庄，是一个五十多户、二百余人的穷村。村东头有一个四邻不靠的小独院，房舍整齐，围墙甚高，门前宅周收拾得干净利落。一天下午，太阳离地还有一杆子高的时候，河堤口处走出三条汉子，一个高个子，三十岁左右，手提驳壳枪，一步一颠地急走在前，身后紧跟两个身材瘦小、年龄不过二十岁的小青年，他俩每人手中提一个手榴弹。这领头的汉子便是李佩明。

此时，李佩明已是中共正式党员，在武城县，任武装工作委员会主任。五天前接到上级命令，由武城县组织五十副担架，即刻南下，支援濮阳战斗。李佩明亲自组织并与两名民兵一起带领一百二十多人组成的担架队南赴濮阳。在前线交接完毕返回的路上，遇上国

民党军一个排的追击。从黎明发现敌人跟踪到太阳偏西，经过近百里的急行迂回，才甩掉了敌人。此时，一天滴水未进的肚子“咕——咕——”地拖着长声叫了起来，三人都感到饥饿难耐了。来到村头独院门口，见此院房、墙皆高好守，又能四面出走易弃，就打算在此处歇脚吃饭。

进了独院，一位年约七十多岁的老大爷迎出屋门，老大娘在屋门口看着。

“我们是武委会的，公差路过，一天没吃饭了，想……”话没讲完被老大爷打断：“进屋，进屋，我有面条，一会儿就煮好。”三个汉子七手八脚生火，老大娘添水下面。

面条煮好，李佩明刚刚把写完的借餐纸条交给老大爷，大门外突然一声喊叫：“你们听着，你们已被包围了，赶快投降！”

三人一起意识到是敌人又追上来了。李佩明一边安排大爷大娘贴墙站在门窗之间的安全处，一边将面条捞到三个碗内，同时对另外两个小民兵说“不要慌，首先想法突围，突不出去，就等敌人围拢后拉响手榴弹。”两个小民兵点头会意。“我老两口都已年过古稀，死也不算少亡，你们三个，还是小青年哩，太可惜。”老大娘的声音有些发抖。

在三个人吃着面条的同时，李佩明的眼光扫在一双旧棉鞋上停住了。立在墙根的这双棉鞋，少说也穿过三冬了，帮面破碎，棉絮外露，鞋底沾有湿泥，看来

已升级为河边水畔专用鞋了。李佩明习惯地收一下下巴，嘴角闪过一丝笑意道：“有办法了，你俩听我的。”又转向大爷：“这双鞋我要了，过后给你买新的。”说罢，将鞋口朝下，底向上放进锅底下的暗火上。大门外又传来第二遍嚎叫了。

“放下碗，把手榴弹弦挂在手指上，攥紧弹把。”两个小青年跟着李佩明急促地安排，做好了突围的准备。此时只听见大门“哐当”一声响，随着十多个敌兵端枪弓腰冲进了院子。

“跟上我！”李佩明低声命令，随即右手提枪，左手从锅底掏出一只旧棉鞋，向院子中心扔去，同时口中大喊一声：“看家伙！”伸手又提起另一只棉鞋，腾身而起，跃出屋门。

敌人寻声一看，只见屋内抛出一个方不方、长不长、团不团、圆不圆，冒着一缕青烟的东西，不用多想，准是解放军常用的那种炸药包！不等长官下令，他们动作整齐，异常迅速地趴在地上，身体紧紧地贴在地皮上，只恨地上没有可以钻进去的洞洞，尽量减低高度，没有人敢动一下。李佩明带领两个民兵，三步并作两步在敌人的躯干旁、四肢间迈了过来。大门外的敌人正在疑惑：院内进去十多人，为何无动静？这是几秒钟的呆立，李佩明已站在了大门口，又是一声“看家伙”地呐喊，又是一个飞舞的“炸药包”，又是一片应急的军事动作，所有的敌兵都是非常标准地趴在那里。李佩明等人三分钟后消失在马颊河边的那片芦苇

中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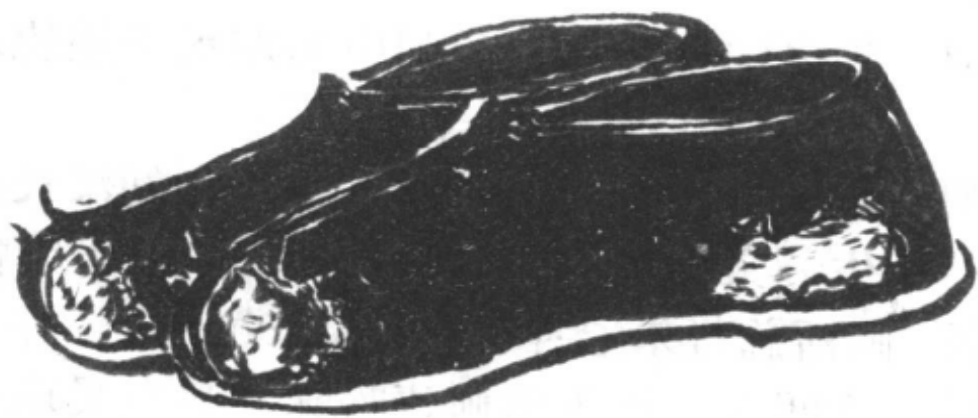
时间一秒一秒地过，离爆炸也就一秒一秒地近了。敌人非常明白，随着时间的延续，危险越来越近，身子就越与地面贴紧，就越不敢动，心中只有一个念头：“老天保佑，千万别炸着我！”

一分钟过去了，没有人敢冒生命危险抬起头瞧一瞧。二分钟过去了，真有大胆之徒，眼睛一瞥见还在冒烟，也会马上恢复趴下之状。三分钟过去了，五分钟过去了，可能离旧棉鞋近的人品评到了脚汗臭与棉絮烧焦的混合美味，冒着丢头的危险，睁开眼，看见了旧棉鞋，才勇敢地站了起来……

李佩明等三人一口气跑出足有三里之远，才听到小李庄传来欢送的枪声。

李佩明和二位青年真是三条好汉。

1949年冬，李佩明特意买了一双新棉鞋、带着收回餐条的钱，到小李庄看望了二位老人。



传统渊源丹青秀 门第无类翰墨香

书画乃高唐传统艺术，其历史渊源可及春秋战国，其普及程度不分朱门柴扉。自古至今，家家客厅挂堂画，户户门上贴楹联。能挥笔染色者每村皆有，能执毫行墨者邻里不乏。只须翻开地方史籍，便知固河出土的汉画像石、谷官屯出土的金墓壁画皆为书画珍宝，同时可见纵及千年、非常庞大的书画传承队伍跃然纸上。根据史籍记载，将高唐的书画专家、名笔和颇有影响的高手随笔点出几位。

汉朝，鲁相乙瑛，善书法。他为孔庙首请置百石卒史的奏章，供存曲阜孔庙多年。其流畅的汉隶墨迹，被世人誉称为汉隶之楷模。到了后汉，将其奏章原文刻石永留，立于孔庙，是当世汉碑之最完好者。存于曲阜魁文阁。

三国，魏之国相华歆、元朝中书左丞王懋德均善书。

明朝，举人李种善楷书。举人姜广和刘汉长绘画及楷书。贡生苏文、崔璋工诗善绘画，崔仪善染翰。

清朝，闽浙总督朱宏祚、朱纲及朱纹、朱怀朴一门同世祖孙三代四人，皆善书画喜吟咏。另有吴璋善篆籀。梁智能诗善书。刘崑嗜古法书。崔若诺善绘事长于

竹菊。王栋隆善绘事精于草虫。张诚善楷书。王慢坡善草书。李素善精于画葡萄。王连奎善画芭蕉山水。

民国年间，李光前，殷楼人，精篆刻金石之学，善画。吴协冉，吴庄人，工楷书。王粹然，王笠庄人，工楷书。另有冯鹤年、唐文霖等皆以书法闻名。

高唐历史上书画名人群星布空，驰名遐迩。当今书画大家各领风骚，蜚声艺林。三十里铺镇李奇庄的李苦禅，创大写意花鸟风范，为全国画坛一代宗师；三十里铺镇孙庄的孙瑛，被日本美术界权威誉为：“中国水墨画的天才，是中西绘画的高度合流”；杨屯乡谢庄的谢家道，被国内外画界称为：“中国杰出的边塞山水画家”；张庄乡李明桥村的李奇，被美国邀请长期讲学。另外，李苦禅之子李燕和韩静霆、赵安民、朱希江、张望等已是著名国画家，其作品在国内外很有影响；张庄乡赵八里村的张洪泽，其书法在二十世纪四、五十年代艺盖全县；文化馆美术工作者程辛木，专攻木刻，其作品闻名全国，并多次出国参展。

近些年，习书学画者甚众，有的在桑梓挥笔，有的于异地泼墨，有的居台港染色，其中扬名一方者颇多。据笔者所知，书法奇才中有董凤基、高志新、李煜昕、孙庆禄、傅传武、陈洪岭、王守仁、唐康和、杨系双、罗东河、何庆臣、张进忠、王百魁、苏同海、白忠海、张祖信、纪明坤、鞠立楷、傅登勤、牛凤玉、杨凤成等；绘画精英中有辛守庆、董仪亭、巩德春、李航、赵子青、崔明达、胡茂德、朱宝华、张炬、董善印、田士义、

李近山、林国秀、丁守信、高兰青、邱士杰、王玉峰、崔涛、韩晓博、卢青、秦丙云、李若阳、王经福、闫晓萍等。

高唐区区小县，面积不及一千平方公里，人口只有四十多万，但书画人才麇集。上有顶端国手，下有奋进群贤。纵有历史渊源，横具群众基础。1996年12月，由国务院文化部命名为“中国书画艺术之乡”。

当今高唐县建有书法协会和美术协会。书画爱好者的活动中心是孙大石（孙瑛）美术馆。

孙大石，原名孙瑛。1919年生于三十里铺镇孙庄村。自幼爱画。“七·七”事变后从戎。1949年赴台。1974年旅居美国。1982年回国定居。是位爱国爱家、德艺双馨的画家。是六、七、八届全国政协委员、中国美协理事、文化部侨联主席、中国华侨文学艺术家协会会长、中国画研究院研究员、国务院特殊津贴获得者。

孙大石美术馆隶属高唐县文化体育局。座落在风景秀丽的东北湖北岸。1992年由高唐县人民政府和孙大石先生共同投资修建。占地面积二千零八十八平方米，建筑面积为一千二百平方米。2004年春县政府再次投资二百多万元开工北扩，扩建后总面积达三千六百四十平方米，建筑面积达二千四百平方米。整个建筑为青砖仿古二进庭院式风格，后院为二层建筑。除院内一览阁和挎院大石居室外，其余建筑由长廊连为一体，内设值班室、办公室、三座大型展室、接待室、

学术报告厅、书画创作室、休息室、碑墙和库房。

展室设备齐全、高档。拱式玻璃展柜、背景音响、监控摄像一应俱全。高三米的全封闭玻璃展橱，内有人体感应射灯、感烟报警器、电动换气扇等设备。2004年4月，按国际标准通过了国家旅游局的创优检查验收。

一览阁底层藏有“天下第一砚”。这块龙腾巨砚是河北省易县古砚雕刻厂给孙大石的赠品，孙先生将此转赠高唐县政府。此砚重十一吨，由匠师五人精雕三年而成。整方巨砚透雕有三条大龙，代表当时的三个直辖市；二十八条中型龙，代表二十八个省、自治区；五十六条小龙，代表五十六个民族。另有长城、黄河、瑞云、峻石等雕刻，做工精细，立意深邃，堪称天下奇观，石雕一绝。

孙大石美术馆落成十多年来，已举办各类展览六十余场。举行书画笔会四十余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纪委书记吴官正、北京军区司令员李来柱、中央文史研究馆馆长张世简、著名画家许麟庐、台湾画家陈丹诚及省地各级领导都曾到馆参观指导。

馆内除收藏孙大石的精品画作和八十多件珍贵文物外，另存有丰子凯、李苦禅、启功、李可染、欧阳中石、范曾、沈鹏、刘海粟、孙轶青、赵少昂、于希宁、武中奇、胡昌炽、刘炳森等诸多名家大师的力作。

孙大石美术馆，经几年的经营，成为高唐县最高雅的一处景观。

国宝盼子之墓

高唐县固河镇村西有一古墓，封土高大，占地五亩，为其群墓中之首，故俗称大冢。多年来，没有保护，村民从周边挖运封上，致其在1958年砖砌墓道暴露，可见墓中蓄满清水。当时恰逢干旱，人民公社的生产队使用大马力抽水机汲水灌田。昼夜不停机，其水从未竭。此大冢之南曾有观音寺，1958年可见断垣瓦砾之遗址。《高唐州志》记载，固河村西里许，观音寺北有盼子墓。据此，这称大冢者，无疑便是盼子墓了。到1979年10月，被高唐县革命委员会定为县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时，才将墓道封盖。现今封土还有近四米高，基部直径约有二十米。

盼子何其人也？乃战国时代，东周显王年间的齐国将领。姓田名盼，故除称盼子外，亦称齐盼子或田盼。是齐国屡立战功、威镇邻国的名将。有两个历史故事可证其威名。

齐国之宝

威王时，遣盼子守高唐。那时还未建高唐县，高唐只是齐国西陲的一个重镇，称高唐邑。其位在今禹城市境内的伦镇村西北，大城子坡、小城子坡和堂子

街三村中间。当时，黄河自西南而来，在高唐邑西转弯北上，过固河村西后又转向东北。盼子凭河为险，设防卫齐。齐威王二十四年，公元前333年，齐王与魏王狩猎郊外，间歇时，魏王问齐王：“你有国宝吗？”齐王答曰：“没有。”魏王说：“我这样的小国还有光照十二乘的径寸之明珠十枚。怎么这样大的齐国反倒没有宝贝？”齐王说他对宝贝的看法与魏王不同“要说宝贝，齐国有四个真正的宝贝。”接着将盼子等在军事、政治上大有作为、为国立功的四位大臣一一列出。说到盼子时，齐王说：“吾臣有盼子者，使守高唐，则赵人不敢东渔于河。”“他们才是齐国的国宝。他们光照千里，何止十二乘！”

威镇邻国

高唐邑是齐国西边的重镇，以黄河为界与赵国为邻。盼子守高唐时，赵国人不敢到界河中捕鱼，可见盼子对赵国的威慑程度。齐国南邻为楚国，当时楚是经济、军事强国。时有侵犯邻国的霸道行为。威王时，楚军与婴子率领的齐军交战于徐州，齐军败。楚王依势欲令齐王将婴子罢职逐出齐国。此时，燕王刀下亡命至楚的张丑对楚王说：“你在徐州取胜，是因为齐王没用盼子出战。若现在将婴子赶出齐国，威王必定重用盼子，重组兵将，再次交战，这对你楚王有好处吗？”楚王被张丑说服，不再逐赶婴子了。

盼子并未与楚军交战，只是张丑的战略假设，便使兵强马壮的楚王改变了初衷，可见当时盼子的雄威。

相国华歆之墓

固河村北三华里有村叫大华庄，村西北有一古墓，封土高有三米，直径七米，封土顶部有一透洞，借此可观墓室。此墓为砖室结构。圆形拱顶压在平面为八角形的墓墙之上。华姓家族辈辈相传认定此墓为华歆之坟。《高唐州志》记载为三国时期魏臣华歆之墓。现为县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墓主华歆，字子鱼，公元157年生于高唐县固河大华庄。在历史上是个多智果敢的伟人，在家乡却是一个神秘、敏感的人物。他处世于沧海横流的三国时代，效力于欲统天下的曹操魏阵。东汉末举孝廉，受郎中一职。后因病辞官。汉灵帝驾崩后，大将何进辅政，征华歆为尚书郎。汉献帝初平元年（190年），华歆迁任豫章太守。任期为政清廉，深得百姓爱戴。汉建安五年（200年），曹操以汉献帝的名誉征华歆到朝内任职。离开豫章时，其部下、百姓送了许多礼品，华歆当面全部收下，注明送礼人姓名后，分别保存。临别时，攀辕挥泪相送者过千人。此时，华歆将礼品全部拿出，对送行的人们说：“情意已经收下，非常感谢。这些东西不便携带，不得不请大家各自取回。”华歆的德行获得众人钦佩，真乃“冰清玉洁华子鱼也。”

华歆入朝后，先后任议郎、参司空军事、尚书、侍

中等职，后为尚书令。他全力支持曹操统一中国的大业。敢冒万死之险协助曹操打击擅权的外戚宦官，收伏皇后，整顿朝纲。为最后统一中国奠定了基础。汉献帝延康元年（220年），曹操病故，子曹丕称帝，华歆为相国，加封安乐侯，后改为司徒。226年，曹丕亡，其子曹睿继位。华歆任太尉，封博陵侯。公元231年，华歆病故，终年七十五岁，谥敬侯。

华氏家族是高唐县的名门望族、官宦贵族。华歆的儿子华表，于西晋官拜太子少傅，迁太常卿，谥康侯；华歆的孙子华峤，在西晋被封乐乡侯，转秘书监，是继司马迁之后的著名史学家，撰成《后汉书》九十七卷，其中《十典》未竟而卒，谥简侯。华峤次子华彻，任佐著作郎，踵成父书，亦未竟而卒，华峤第三子、华彻之弟华畅，任佐著作郎，继父兄未竟之作，《十典》终于撰成。

华歆在国史上的功绩不可小视，为中国统一所做的贡献千秋未泯，在近几年反复播放的巨型电视连续剧《三国演义》中，就有对华歆的刻画。

华歆在国史中的面貌却与在家乡的形象判若两人。

翻遍古籍，阅尽方志，综其所述，认为华歆少不安分，后为佞臣。

所谓“少不安分”，是指孩童时与邴原、管宁三人一齐读书、游戏过程中发生的故事而总结出的定论。三人一起做耍龙游戏，华歆为龙头，邴原为龙腹，管宁做龙尾，以此斥华歆有“官欲”；三人一起刨土翻地时，

突现一金器，邴、管二人不屑一顾，华歆拾起，辨看一番也弃之。据此，论定华歆“爱财”；三好友在室内读书，恰逢一美女从门口路过，邴、管二人目未旁视，华歆匆匆向外看了一眼，据此定罪为“好色”。此为“少不安分”之据。

所谓“后为佞臣”，是指华歆帮助曹操统一中国。由于封建正统思想作怪，认为三国时期，刘备为刘汉氏嫡传，是正统。曹操、孙权便成了叛类。帮助曹操统一大业的华歆也就成了助纣为虐的佞臣。《三国演义》在正统思想影响下，给曹操、华歆加上叛逆之罪，于是，以《三国演义》为蓝本的各类文艺作品均给曹操和华歆画上了奸臣的脸谱。一百年这样传，五百年这样说，一千八百年了，一直这样传说着。高唐县也不乏封建正统思想的拥护者，于是在封建思想占有统治地位的解放前，高唐的官民之中便经常出现违理欺华氏的事件。在乡里，如有人与华姓人发生矛盾，虽然华氏占理，那人也不顾理亏之疚，在附近集市街头扎一草人，上写“奸臣华歆”，用牛鞭笞打，致使华姓人不敢赴街市；乡间如此，官方也不讲理。若华姓与人发生纠纷，即使对方无理，也敢入衙状告。进堂之后，对方便会指华姓大呼：“他是华歆的后代！”只此一句话，官司便定了输赢，不需程序，不问情由，更不用调查，不允辩论，县官便随即宣布：“华氏败诉，轰出门去！”一场官司便这样结束了。多少年来，多数华氏小心从事，低头做人，有理不能争，受害不能告，忍气吞声度日月。

对这不平之事，众人敢怒不敢言。对华氏的同情心还是时有表露。如关于“鬼见华歆也要退避三舍”的神话传说，不但民间久传不衰，就是官修的几个版本的《高唐州志》中也均有记载。可见多数吏民乡众还是敬重华歆的，最低也是认为华歆不是一个凡人。再如，京剧中有《白逼宫》剧目，以《三国演义》中收伏皇后的一段叙述为内容，对曹操、华歆极尽污蔑、丑化。此剧在高唐县尤其固河镇一带禁演，就是偶遇别有用心之人点演，剧团及演员也会拒演。这虽无明文法规所定，但已约定俗成。可见高唐乡民反对给华歆抹黑的心理。

三国时代的恩怨旧帐，却让子孙蒙冤一千八百多年。近代的民主革命，虽不彻底，但也使封建势力有所收敛。华氏家族有所抬头，便出现了“华二少”（即华杏田）那类性格变异的人物。直到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末，在编纂《高唐县志》时，借郭沫若为曹操平反的胆略，根据充分的历史事实，第一次在县内公开为华歆正名，第一次以正面人物形象在重要位置写进《高唐县志》。还原了历史的真实面貌。

行宫大觉寺

十八世纪之前，高唐为南北通衢，明、清诸帝或巡察，或狩猎，南北往来，多取道高唐，且多驻蹕。高唐有行宫两处，一是城南三里有回銮殿，即今皇殿村，一是城内大觉寺。回銮殿只有明成祖、明宣宗先后两次驻蹕，其余皇帝多次巡察均驻蹕大觉寺。有史可查者，明朝的成祖、仁宗、宣宗和清朝的康熙、乾隆在出巡或回銮时来过高唐，同时对高唐有所赠赐。

明朝永乐丁酉年（1417年）三月，成祖出巡，驻蹕高唐大觉寺，赠僧正员道琬神僧传经袱；永乐己亥年，（1419年）四月，仁宗巡视，驻蹕高唐大觉寺，赐主持僧道琬宝钞二十锭。

清朝康熙二十八年（1689年），帝南巡过高唐；康熙四十二年（1703年），帝又过高唐；康熙四十四年（1705年），帝再过高唐。三次均驻蹕大觉寺，并分别御书唐诗三首，赐当时高唐州知州龙图跃。

第一首为：

九龙盘烟动，
四照烛花生，
即此流高殿，
比持待月明。

下有落款：赐高唐州知州龙图跃。

第二首为：

千岩一尺壑，
八月十五夕，
清露坠桂花，
白鸟舞空碧。

第三首为：

石路泉流两寺分，
寻常钟磬隔山闻，
山僧半在中峰住，
共占青猿与白云。

下有落款：赐高唐州知州龙图跃。

乾隆十三年（1748年）、乾隆十六年（1751年）、乾隆二十八年（1763年）三次出巡路经高唐，均驻蹕大觉寺。留有《高唐怀古》和《十里园》诗两首，并赠高唐州知州马而良御笔书扇。

高唐怀古

春风偶此经齐邑，
行雨非关梦楚王，
见说东风待金马，
何如盼子守高唐。
玲珑日影标穹塔，
旦水波流簇远樯。
为忆绵驹能变俗，
深惭刑措让成康。

十 里 园

高唐北十里，
厥有十里园，
一例村社中，
名幽地较偏。
绿树团郭外，
新水流门前，
场圃筑于旁，
菜畦开其边。
诂夸亭台丽，
而于农桑便，
想有幽人居，
颇宜诗老传。
昨来苦风尘，
车帷曾未褰，
今日策马度，
景物看暄妍。
绯桃花已开，
绛杏蕾早嫣。
韶今与行人，
争进无留延，
几曾飞落英，
胡至武陵源。
即景有会心，

稍为停吟鞭。

来往皇帝所以驻蹕大觉寺，一因佛之圣地，清净。二因群体建筑美观。既能使皇帝安然度时，又能容下仪仗、护卫等随行人马。大觉寺是皇帝较理想的行宫。

大觉寺为唐贞观年间创建，同时修塔。塔十三级，高三十六丈，平面八边形，周长二十五丈四尺（此为古时的丈、尺，比现在丈尺小得多）。宋朝元丰五年（1082年）和元祐二年（1087年），两次对大觉寺扩建、维修。后毁于兵燹。

元朝廷祐六年（1319年）重建。元末寺院建筑毁于兵，独宝塔完好无损。

明朝洪武初，开始复建大觉寺，经永乐、正德、嘉靖年间的重修和扩建，再由清朝乾隆十九年和二十一年的维修，大觉寺成为鲁西北一带规模宏大的名寺。前有山门，门内东首有宝塔一座。门内中路自南而北建有金刚殿、天王殿，天王殿之后为寺院中心，建大佛宝殿，宝殿之后有千佛阁，阁之西建地藏王殿，殿中塑地藏王及阎罗十帝。千佛阁后，中建法堂，东建观音堂，西建禅堂。此为进得山门后的中路建筑。其东西两旁各建有廊庑若干间，分别为僧房、廩舍、厨湑等。全寺共计有殿舍二百余间。当时各尊塑像金碧辉煌，幡幢隐映，钟鼓相设，塔矗入云，寺外树茂，环境幽雅，是高唐县著名景观。

清乾隆之后，经济衰退，寺院无人维修。晚清又多兵乱，日久寺庙倾圮。古塔自明朝嘉靖举人梁公奭铁

宝瓶封顶之后，再无人关注。春秋频更，风霜久度，圯坏渐重。道光九年（1829年），因地震塔身微倾。道光二十一年（1841年），塔倾。塔内发现一铜佛。地宫内发现一石匣，长约五尺，宽三尺。匣上有盖，盖上有字，但已模糊不清，可辩者，依次有“池州东流县尉监博州高唐县酒税”等十四个字。开始由衙门保存，1937年，铜佛仍存放在民众教育馆，石匣存于县政府第四科。日军侵占高唐县城后，两件文物不知去向，至今杳无音信。

2003年，原城池内三街六巷所有民宅和部分公房，拆迁完毕。经殚心规划，欲再造新城。原南半城居舍全部拆迁后，于原南城门和三清观原址两处，掘地开湖，将东南湖与西南湖相通连。南半城区被两湖拥抱在水中，成为四面临水，两桥接岸的宝岛，形成城市建筑中罕见的城中有湖，湖中有城的格局。从地图上看，西南湖与东南湖相连接后，水面形成南突北弯的新月形，这新月湖中心的宝岛当然就应称月亮岛，是建造月宫的地方。无疑，此处为金高唐县城中最美丽、最圣洁、最金贵的地方。为弘扬高唐的古典文化，为旅游事业张目，重建的高唐大觉寺便选址于此。占地远远超过原址，所有建筑一律仿古，不惜代价，请曲阜专业工程队施工，均用曲阜仿古建材，以超越明、清两朝的气势，欲将大觉寺建成鲁西北最大的寺院。待这新建古迹工程结束，名主持僧驻入后，一定会出现游人不绝、香火旺盛的气象，成为高唐经济效益最好的景点。

古塔浴晨曦

去高唐城北三十里有梁村，村东侧有兴国寺，寺南首有浮图十三级，俗称梁村古塔，塔北十米处有古槐。

梁村塔，青砖白灰砌体，高十三级，上设葫芦压顶，计37.5米。平面为八角形，单边长2.85米，对边距离6.85米。第一层重檐斗拱，北有塔门。二层以上均有东、南、西、北四门，逐层收分。梁村塔的建筑年代，高唐县地方史籍记载不一。有“唐槐宋塔”说，有“唐塔唐槐”说，亦有“唐塔宋槐”说。诸说均无确切史证。

曾有位当代建筑学家，在其著作中列举宋建筑物时，高唐梁村塔出现在他笔下众多提名的行列中。该专家从未到过高唐，对梁村塔的认定当然来自间接的二手资料中的宋塔说。

笔者不懂建筑学，只根据生活常识和民间传说，谈点糊涂意见。认为“唐槐宋塔”之说欠妥。先植树木后搞修建不合一般建设流程，再者，宋时建塔，还是采用堆上抬高法，修建十三级砖塔需二至三年时间才能竣工。槐树距塔不足十米，能在土中活埋二至三年吗？故先植槐后建塔之说有误，建塔时间一定早于植槐。

建塔的时间是唐朝，还是宋朝？唐朝建塔似为合理，笔者并非出于偏袒高唐的主观成见，故意将建设时间提前一个朝代，提高塔的历史价值，而是有四点

理由。其一：民国年间所撰《高唐县志稿》的主编、副主编皆系日本留学生。主编还担任京津几家大报主编，知识渊博，涉猎广泛。副主编高唐人，长于法制和地理。他们经过实地观察对比研究和广征有关学者的意见后，将清光绪《高唐州志》中的“宋塔”纠正为“唐塔”；其二：民间一向有梁村塔与大觉寺塔是姊妹或姑嫂塔的传说。且此口碑较广；其三：从《高唐州志》中的画图看，大觉寺塔在结构、外观等方面与梁村塔相同。《高唐州志》记载：大觉寺塔为唐贞观年间尉迟敬德监修；其四：寒山寺、灵岩寺……等唐建砖塔，在平面结构、出檐处理、外观建设诸方面都与梁村塔相同。总上所述笔者认为1936年修撰的《高唐县志稿》中的“唐塔唐槐”之说是可信的。

在此应说明一点。新中国成立以来，政府曾两次拨专款对梁村古塔进行维修。第一次只对塔基进行加固处理。第二次（即2001年），对塔体进行了动大手术式的维修改造。用维修之前的古塔照片对照一下维修后的古塔现状，数一数级数，看一看外观，不难发现这次维修是脱去唐装着宋袍，改头换面，缩首剑颈，硬让梁村古塔年青了三百六十岁。这次美容的主要奇迹是现在说梁村古塔是宋塔那就很像了。

历史不是分析、推断出来的，梁村塔到底是何时的建筑，等待后人对史证的发现吧。为方便后来人，交代一下有籍可查的有关历史资料。

明成化十年（1475年），甲午科举人刘汉撰文的《兴

国寺记》碑，有望释疑，但碑至今无踪影，碑文亦未入志书。

明成化十四年（1479年），举人李翀撰文的《敕赐重建兴国寺记》碑，于1986年在加固塔基施工时，在距地表五米之下的深处被发现掘出。此碑文在《高唐州志》中也被收录。其内容略云：寺毁元末，塔顶倾圮，正统九年（1444年），大觉寺僧正行殷率善士冯志公、马文理议请高僧行深为化主，上肯其奏，敕名兴国。行深弟子正省，扩建殿宇、山门、廊庑、僧房等。

清康熙七年（1668年），六月十七日地震，兴国寺塔圮四级，维修。

清乾隆四十三年（1778年）吕英、李翀再次重修。出自光绪《高唐州志》的此条记载有误。李翀为明景泰元年（1450年）庚午科举人，于三百二十八年后的清乾隆年间参与维修兴国寺是绝对不可能的。李翀是高唐县历史上的名人，其翀字在姓名中也不常见，也不会是同姓同名。所以说《高唐州志》的此条记载是错误的。

不管是唐塔还是宋塔，都不影响古塔的历史价值及其美妙的景观，“古塔浴晨曦”便是高唐现存二十景之一。

夏末秋初，天高气爽，刚刚在雨季里冲刷过的天空蓝得透明。天空的流云，不像夏天那样灰灰青青，低垂翻滚，匆匆来去，眨眼便掩日遮空；也不像春冬那样，如丝如纱，或鱼鳞形，或搓板状，高高贴在远空，看不

出动意，初秋的云若茧若棉，成朵成团，边沿清晰地空中慢慢变换着形状。尤其黎明观云，更为有趣。只见东方欲晓，朵朵白云在橘黄色的天幕上跑动，有的像猴，有的像狗，有的像头大象。一会儿像马，一会儿像牛，眨眼变成一棵大树……似正月十五看转灯，若童年儿时看皮影，真乃七月八月看巧云。如在梁村塔西观此景，又是别有一番风味。

在曦光初露之时，于塔西二百多米的一处高岗上，屏息东望，高高的十三级古塔，以版画般浓重的份量印在黄中透红的天幕上，其棱角边沿十分清晰。塔顶宝葫芦基处多枝杈的小榆树就看得清清楚楚。那千变万化的天幕上，组成一幅幅不断翻新的画面，出现一个个生动美丽的镜头。

由于浮云的移动，光线时隐时现，天空出现忽明忽暗、此明彼暗的奇观。天幕上的古塔黑影也时而镶上黄边，时而换成红沿，其色调与浮云、天幕完全一致地变换着，俨然是一幅变色的重彩油画。

太阳还没露脸，塔顶的宝葫芦首先沐浴在阳光中，亮了起来。随即，第十三层、第十二层……由上至下逐层被阳光涂上金黄的亮彩。第三层、第二层亮了，太阳从东方的地平线上跳出来了。整个古塔被阳光脱掉了黑装，洗出了本色模样。阳光渐强，浮云远去，古塔开始鸟瞰新一天高唐百姓的行踪。

这“古塔浴晨曦”与县城的“浮图（指大觉寺塔）映日”，都是高唐县自古以来以塔为主体的重要景观。

据传，这两座塔是同年施工、一人监修的姊妹塔。

唐太宗李世民为秦王时，尉迟敬德在其麾下任右府参军，屡立大功。当时，太子以金皿一车请尉迟敬德受职，被其坚辞。助李世民登基之后，尉迟敬德被无端怀疑谋反。他当朝脱下官服摔在地上，指其遍体伤疤，证其耿耿忠心。其后，李世民以公主相许，尉迟敬德以“妻虽陋，相与共贫贱久矣！”拒之。从此，自为识破红尘，不再一心政事，而专事佛事，游览各地，多处建造佛塔。

贞观年间，风调雨顺，百姓富足。尉迟敬德出京南巡。一路上筹资建塔多处。在平原县城北建造佛塔之后，顺官道南下，过腰站镇，进入高唐县境。来到梁村，被那一望无垠的良田沃土所诱，被那淳朴忠厚的民情所感，认定此处便是一方洁净圣土，是建造寺庙的宝地。于是就地边化缘边兴工建寺造塔。不久，化缘范围延扩至高唐城内。城内的众多商铺大户、官宦贵族在施舍的同时，提出在城内大觉寺也建一座与梁村塔同样的宝塔，并也请尉迟敬德将军监修。迫于筹资的需要，尉迟敬德应允建塔要求，并将修建大觉寺塔的工程与梁村塔的修建合并同时进行。

因大觉寺塔的修建并非尉迟敬德的自发自愿，虽然两塔同时施工，但能工巧匠多集于梁村，优质建材也先满足梁村需要。所以，建成后的两塔相比，大觉寺塔除采纳城内施主第一层多设三个门洞的意见外，其他外观完全与梁村塔一致。但大觉寺塔比梁村塔矮了

一截，瘦了一周。建筑质量较差。所以道光九年微侧，二十一年倾圮。

梁村塔先期完工，尉迟敬德参加完“开光”大典，记事碑立竣之后，便回京城。大觉寺塔工期较长且无塔帽（塔厦），竣工后，尉迟敬德因故不能参加“开光”仪式，其怠慢态度引发城内几家施主的不满。于是，几家施主便差人将梁村塔修建记事碑偷运至大觉寺，经磨消改刻立于塔右首，成了大觉寺塔修建的记事碑了。不知历经多少年，此碑也不翼而飞了。所以现在梁村没有古塔初建的记事碑，大觉寺也没有记事碑。

梁村塔初建碑刻实物不存，但初建碑刻的只言片语还能从《高唐州志》中存留的其他碑文中寻到。如明宣德九年的大觉寺重建碑文中记道“高唐州东北有净地焉，唐时有僧于此创立大觉寺，于寺之东北偏建舍利宝塔……”明记唐事，当有转抄之疑。但《高唐州志》中，多处出现“高唐州东北有梁村”的方向定位的语言，同版同籍中的“高唐州东北”，还能指大觉寺吗？如果是抄录或刻字者笔下或刀下误，将“城”刻写成“州”，不会将一句话中相连的“东南”也刻写成“东北”吧。故此句话应出自原梁村塔初建碑文。宣德碑文中，还有多处疑指梁村塔。

这些都是“据传”。没有史证的传说，永远是传说，但传说也是口碑历史。

附：

姑嫂塔的传说

梁村塔与大觉寺塔是姊妹塔的传说很广。房庙村房玉泉提供线索，于房庙村走访多人，采得的传说内容与县城内的相同。

唐朝初，现在的这个高唐县城从禹城的大城子坡村、小城子坡村之间的旧址迁来不久，便有僧人在梁村和城内大觉寺建起了姊妹宝塔，大觉寺的塔为嫂子，梁村的塔为小姑子，故亦称姑嫂塔。两塔同时开工，经三年施工，近于竣工时，工匠发现只有一个塔厦（塔帽）的材料。因重新烧制塔顶专用瓦料时日太久，故在嫂子塔顶先修成塔厦。梁村小姑子塔便成了无厦塔。

小姑子生性奸诈，从不吃亏，便在一个狂风暴雨的夜晚，招来平素要好的伙伴，七手八脚地将嫂子塔厦强抢硬搬地弄到梁村塔上去。自此，梁村塔再不怕风推雨浇、地震山摇了。牢牢地矗立在高唐梁村，俯视着鲁西平原的自然进化和人类演变。大觉寺的嫂子塔，上无塔厦，一遇到风雨便砖动身抖，自建成以来，不得不多次维修。直到明朝嘉靖举人梁公奭加宝瓶封顶后方有塔厦。但因多年无厦已造成的隐患使宝塔寿命大减，于道光九年塔斜，二十一年塔倾。

大觉寺塔倒掉多年，小姑欺嫂的姊妹塔故事却久传不衰。

水牢困铁牛

相传，唐初疏浚护城河时，在县城西门向南十数丈处，清淤下挖不足三尺，便听得一声雷似巨响，爆出口粗如盆的喷泉，水柱射天，高过三丈，清澈甘冽，冲涌不绝。人们以为这不尽的大量泉水，一定来自大海，故称其为海眼。所出之水顺护城河北泻，三个时辰，围城一圈的护城河积水已满。泉水仍照涌不减，护城河水却不外溢。原来在西城门以北，正对十坊院的护城河底，出现一漏水地穴，口径如同海眼，泉水由此泄入地下。相对的水面上形成一漏斗状水窝，快速旋转着，呼啸着，任凭水面有柴棒杂物漂过，也便吸了进去。人们以为这永不满溢的泻水洞定通地宫或龙宫，故称其为宫漏。

所漏大量泉水流向何处？

原来，大觉寺正殿之下有一地下涵洞，高能容人，北向经城圈出城，北延数里，据传与梁村塔地宫相通，无人敢探其险，故不知其尽头事。宫漏之水沿地下暗道冲入这一涵洞，向北流去了。这地下暗道之说，正解释了城内历来人们传说中常听到地下流水声的现象。或者是人们早有地下暗流传说在胸，心领神会悟出了流水之声。总之，关于海眼的传说已由来很久。上个世纪五十年代，还真的引起了县政府的注意，曾组织寻

找海眼的工程，但以徒劳告终。

海眼之水从唐朝喷涌到宋朝。徽宗统治天下时，高唐知府是当朝高太尉的堂弟高廉。高廉想在靠近城圈的围墙内打一生活用水井，不慎打在有暗流的涵洞上。只好将井中的暗流出入口用铁篦子封好，改做地牢了。牢中流水过膝，故亦称水牢。

铁牛是黑旋风李逵的乳名，也是外号。他母亲叫他铁牛，后来梁山上的领袖及众好汉也喊他铁牛。他如何困在了高廉的地牢？对此，《水浒传》中有记载。第五十二回《李逵打死殷天锡 柴进失陷高唐州》中写道“李逵打死殷天锡为柴进惹下祸端。高廉派二百余人，各执刀杖枪棒，围住柴皇城家……缚了柴进，绑到州衙内。驱翻在厅前阶下，把柴进打得皮开肉绽，鲜血直流……取了一面二十五斤的死囚枷钉了，发下牢里监收。”在第五十四回中写道：为救柴进，宋江率军打败高廉官兵，“已知杀了高廉，收军进高唐州城内，且去大牢中救出柴大官人来。”先后救出“三五十个罪囚”、“柴皇城一家老小”和“沧州提提到柴进一家老小”，“数中只不见柴大官人一个。”后听当牢节级蔺仁说：“高廉要取柴进出来施刑……小人不忍下手……回称柴进已死……昨天引柴进去后面枯井边，开了枷锁，堆放里面躲避，如今不知存亡。”“宋江听罢，慌忙着蔺仁引入。直到后牢枯井边望时，见里面黑洞洞地，不知深浅。往里面叫时，哪得人应。把索子放下去时，约有八九丈深……宋江垂泪。吴学究道：‘元帅且休烦恼。谁

人敢下去探看一遭……’话犹未了，转过黑旋风李逵来，大叫道：‘等俺下去。’宋江道：‘正好。当初也是你送了他，今日正宜报本。’李逵笑道：‘我下去不怕，你们莫割断了绳索。’……接长索头，拉起架子……李逵脱得赤条条的，手拿两柄板斧，坐在箩筐里，放下井里去……去井底下摸时，摸着一堆骸骨，又去这边摸时，湿漉漉的，四边却宽，一摸摸着一个人，做一堆儿蹲在水坑里。李逵叫一声‘柴大官人！’哪里见动，把手去摸时，只觉口内微微声唤。李逵道：‘谢天谢地，恁地时，还有救哩！’……把柴大官人抱进箩筐里……到上面众人看了大喜。宋江见柴进头破额裂，两腿皮肉打烂，眼目略开又闭。宋江心中甚是凄惨。”

至此，施耐庵因塑造人物的需要，要维护宋江等人的英雄形象，不敢把将李逵遗忘井下的情节写进《水浒传》。致使这真实的故事不得不离开线装文学，转入口头文学，世代传递下来。

宋江眼见柴进三魂出窍，命系一丝，哪容怠慢，立叫请医师调治。急令众人把柴进抬上车，将柴姓两家老小并府库财帛及高廉所有家私，尽数装载二十余辆车子，匆匆离了高唐州，急急回梁山山寨去。

柴进提得井口时，黑旋风李逵便在井下发喊大叫，怎奈井上众人见到柴进，又惊又喜又担心。呼叫忙乱混成一片，早盖过了井下的声响。李逵耐着性子，等了半天，不见有绳索放下，侧耳听时，一时杂声全息。发喊一阵，没有回应。便高声叫道：“井上甚鸟东西！不

放下绳索提俺，待俺出得井去，看哪个鸟人能吃俺三斧头！”边发喊边敲击井壁，嗓子哑了，拳头疼了，全不抵事，才知井上已无人了。

井下一片漆黑，哪晓昼夜交替，李逵只是蹲依了斧柄发闷气。

宋江一拨人马，前怕官军截路，后怕敌人追杀，胆战心惊，一路快行。眼前就到大寨了，悬在嗓子的心开始落下了。这时吴用突然以掌猛击自己前额，同时大喊一声：“不好！”惊得众人停步，军师接道：“铁牛还在井下！”这一声喊怎了得，恍然大悟乱了营。宋江从马上翻滚而下，话不答理直是摇头跺脚，欲驱马杀回高唐州。吴用转过来劝道：“柴大官人尚未脱险，东昌、冠州官军闻讯定已开赴高唐去援，这时回高唐，岂不自投罗网！后果是铁牛救不得，柴大官人不被人杀也被折弄死。”随叫朱仝、秦明两头领附耳过来，如此这般一番低语。

第二天，朱仝挑一精壮军汉，秦明却折腾半天才找到一个根发不生的秃头军汉后，四人同时徒步离寨。第三天中午过后，朱仝、秦明二人，长衫礼帽穿戴着，跟在货车后面，扮作行商；两个军汉五短衣衫，扮作脚夫，各推一辆独轮小车，每车左右各装一筐红枣，分别走在行商之前。四人两车，沿高唐城西门外的护城河旁大道由南而北行走着。那位精壮军汉一边走一边哼起小调：“秃秃秃，夜明珠，省灯油，省蜡烛，不用花钱买木梳……”这军汉未及唱完，推车在前的秃头军

汉先是脸颊红，接着额头紫，眼看就到宫漏处了，便将推车用力一蹲放在护城河边，急回转身去打另一个推车军汉，口中喊到：“爷便是头上根毛没有的秃子，今天让你知道马王爷三只眼！”说时迟，那时快，只见秃头军汉飞起一脚向那军汉踢来。虽然是假戏，却有几分真演了。对方轻移一步躲过，那秃头军汉用力过猛，一脚踢在后面车的枣筐上。只见车子晃了一下，倾进护城河。秃头好象气消了些，怎奈另一军汉不依不饶，抢过一步，将秃头军汉的头巾扯下，露出了秃头，真是根发无生，又滑又亮，光芒四射，然后那位精壮军汉又将秃头的货车也推进护城河。霎时，红枣浮满水面，随水漂向宫漏处，众枣在旋涡中急转后没入水中。两位商人惊叫不已，厉声斥责脚夫。两个脚夫手忙脚乱，跳入水中抓着车把，拦在宫漏下方，眼见着红枣全部没入后，才挣扎到岸上。此时两个行商站在一起，两个脚夫立场一致。一方说“丢了货”，一方说“命要紧”，四人随大声吵嚷着离去。他们心中却是明白：红枣已随水进入谋划中的流程。

吴用说得正是，宋江督人马离开高唐州不久，东昌、冠州两处官兵齐至高唐，驻守在府衙之内。李逵在井下已不知几日，想来井上已换了主人，不敢做声。井内有流水，渴了喝喝，饿了也便喝喝。肚内咕咕之声由小变大，由短变长，且觉得肠胃的翻动。再次用手捧水时，只觉有物碰手，口中嘟噜道“甚鸟东西！”捏时象干枣，一吃果然，便张开双臂一阵打捞，只恨全身一丝

不挂，枣子无处掖放。只能在井底四周的湿地上堆些。直到再也碰不到东西才停了下来。李逵吃着枣子，兴奋不已，生有望了，火气小了。只有在井下等，等。

几天来，为计谋救李逵，大寨中庆柴进上山的筵席也懒得细备。直等得远探侦马报告：徽宗将派呼延灼攻打梁山，新任高唐知府将随官军两旬之内到任。东昌、冠州两处官军在呼延灼到阵之前务将粮草先行运到。听罢，吴学究笑道：“有了。要在官军未到、东昌和冠州的军丁已撤出高唐的间隙中搭救李逵。时间虽然短暂，但是可乘之机。”宋江等听后又合计一番。谋划定准，军众开始行动。

宋江、吴用、林冲、雷横等头领率二十多军汉组成的一彪人马，都是训练精熟之士，各跨战马，星夜悄悄直奔高唐州来。吴用真乃神机妙算，到高唐天将黎明，城内已无一兵一卒，官军半个时辰前刚刚拔营离去。二十多人很快来到枯井口，宋江低声向井口：“铁牛，铁牛！”李逵一听公明哥哥在呼唤，便一拨爬起发喊：“公明哥哥快快救我！困煞我也！”军汉放下绳索，李逵缠在腰间，喊声“起！”不一会儿铁牛被拉到井半腰。突然李逵将绳索抖动喊到“停下，快停下！放我下去，放我下去！”宋江认定铁牛在使性子，便急切地劝道：“我们只顾柴大官人，他性命危急，因此忘了你，休怪！我这里赔礼了。”铁牛忙解释道：“误会！我只激动，一心赶快出去，把双斧遗落在井中，让我去取。”军汉依了。待上得井来时，只见这黑旋风双眼不敢睁开，赤条

条一身黄泥，头发散乱，满脸憔悴。宋江看了甚是心疼，一把将他抱在怀中，口中道歉，眼中泪流，随脱下长衫披在铁牛身上。李逵擦拭着宋江的泪水道：“一切都好了，流甚鸟泪！快走！”一千人马疾风似的离了高唐州奔去大寨。

这段经历虽然没被写进《水浒传》，但高唐众生崇爱英雄，爱屋及乌，把那眼困过李逵的枯井保存了下来，都叫它“李逵井”。白驹过隙，经千年演变，高廉的府衙早已不存，大牢也无踪影，只有那口李逵井还证人似的蹲在鱼邱湖的南岸，向人们讲述着发生在它肺腑之中的故事。

李逵井，1999年被聊城市政府定为聊城第一批重点保护名胜单位，立碑保护。

海眼喷水，从唐至宋，由宋及元。明初因修城墙再疏护城河时，为方便施工，需暂时堵泉断流。众工役奋战三日，土石难掩，泉水照涌不停。后来众人中走出一老者，顺手提起工地行炊的十印大铁锅，底朝上口向下扣向海眼，水涌随止，土掩其上。待修缮结束后，再寻海眼，掘地三丈也不见踪影。海眼从此匿影藏形了。

圣殿环灵光

圣殿指文庙，亦称孔庙。宋时高唐的文庙不在城内，而在城东十里园附近。后晋末，契丹入中原，有一孔氏家族北迁。后周时，该孔氏家族又南迁，欲回故里，路过十里园时，因爱其风土，便于高唐城东寄居下来，今张庄乡的孔氏家族便是该族后裔。他们安家之后，修孔庙，塑孔像，其后便在孔庙办学。宋末孔庙倾圮。到元朝至元年间，选址在城池中心钟鼓楼西北侧重建文庙。初名文昌宫，改名启圣祠，人们俗称孔庙或文庙，是供奉圣人孔子的地方。经明洪武三年（1370年）、清康熙四十八年（1709年）和乾隆七年（1742年）多次重修扩建。最后形成较标准的县级文庙规模。南由灵星门进院，迎门有半圆形泮池，意在表其为泮宫之地。过得池上拱桥，便至正有大殿、旁有廊房的供奉大院，正殿供有孔子灵位，东西廊供有七十二贤及本县去世之著名学士牌位。院后还有配院配房。正殿面阔五间，进深四间，为歇山式建筑，顶部正脊前后以灰瓦为底，中间以黄绿色琉璃瓦各砌出三个菱形图案。檐下斗拱，四出挑角，美观大方。东西廊房各有前厦，内无隔墙，五间相通。灵星门、廊房、正殿所有墙体均着红色，太阳一照，四面对映，反复回射，满院彤红。离庙远观，丹色外溢，故称此为灵光环庙，亦谓圣殿环灵

光。

圣殿环灵光的真正含义在于它对教育事业的贡献。清末以后，学堂逐渐替代私塾。文庙便成了高唐县第一所洋学堂——文庙小学。此后较长一个历史阶段，文庙成了高唐人才的摇篮、栋梁的苗圃。这便是“灵光”所指的实际意义。

光阴荏苒，文庙在天灾人祸中倾圮。后只剩一座大殿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曾两次拨专款对其维修。正脊、垂脊、戢脊全部更新。正面恢复了通天木格式门窗。这座古建筑，显出了原有的古朴庄重面貌。2002年被聊城市政府定为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并由高唐县政府立碑喻众。

最具保护价值的是原立于大殿前的“大观八行碑”。碑高二点二八米，宽一米，厚零点一二米。此碑为宋代大观年间立于城东十里园原孔庙之殿前。碑额为“大观圣作之碑”。瘦金体楷书。其碑文内容讲述了诸士应有的孝、悌、忠、和、睦、姻、仁、恤等八种行为。碑末刻有“太师尚书左仆射兼门下侍郎上柱国魏公食邑一万一千三百户食实封三千八百户臣蔡京题额”及“通直郎书学博士臣李时雍奉敕摹写”。元朝至元七年高唐城内修建文庙之后，此碑即移之城内大殿之前。明景泰元年因碑之跌后淹没且毁，以西郊闲置之趺石匹配，胜其原美。这通圣作之碑于1958年躲过了充当石灰岩烧制石灰的火炼之灾，却没有被“文化大革命”的浩劫饶恕，被“红卫兵”推倒、砸断。其后又因保护

失当，除身断三截外，其碑面剥脱甚重，字迹能辨者寥寥无几，已由县博物馆保存。

文庙在清末、民国年间是高唐县的文化教育重地、民主自由思想的传播中心。当年进步学生经常在此开展反封建、反军阀、争民主、要自由的民主革命活动。

1927年春，高唐县还是北洋军阀政府的属地。国民革命军的北伐炮声，宣告了统治者的末路将至。于是县长张振声、地主恶霸李长兴、土匪强盗李采题、道会头子孔庆广、封建劣绅陈毓三等沆瀣一气联手挣扎。除政治上迫害、经济上暴敛以外，在思想文化方面利用儒教中反对民主革命的只言片语迷惑众生。高唐中学的学子们在校长金石兰（高唐第一个共产党员金谷兰的胞兄，金谷兰系随其兄求学、成人）的影响之下，民主革命情绪高涨，是当时高唐县反封建、反军阀的劲旅。他们已不满足游行喊口号之类的活动了，便由中学的师生们排演了独幕话剧《子见南子》，对封建理论的创始人——孔丘进行讥讽，晓明师生反封建的决心，借古讽今以使统治者当局有所收敛。特意邀请张振声等头目们看了《子见南子》的公演，但见他们装聋作哑无动于衷。师生们不得不指名道姓进行声讨了。

这是1927年的3月，春已暖，花未开，每年此时，县政府总是要大喊种树。只是喊，种不种却从不理会。这一年又喊了，于是中学师生响应号召，择日去文庙植树。

这天正逢高唐大集，上午十时左右，街上已是人头

攒动了。此时，中学门口鼓声咚咚，群号齐鸣。军乐队在前，后有八个学生分别抬着两棵满把粗的小桑树，再后边是两出话剧的人物造型，以简单的动作形成街头活报剧。一出为前几天刚刚公演的《子见南子》；另一出则是中学教师李曰句编剧、学生郭宗伦主演的《打倒陈毓三》。最后是整齐的师生队列。大队人马浩浩荡荡出校门向西奔文庙而去。一路上喊着“打倒军阀！”、“打倒封建主义！”、“打倒陈毓三！”的口号。赶集的群众立马停止了买卖，夹道观看，人山人海。更有不少人跟在师生队伍后边，要看个究竟。

文庙的灵星门上早有人贴上了对联。上联为：“舞台上鞭鞑圣人借古讽今”，下联是：“生活中迁怒侍从指桑骂槐”，横批是：“植树以志”。这对联诠释了这次活动的主题。为使影响长效，在灵星门内两侧原有的国槐南边，师生动手种上了抬来的两棵桑树。

这次植树活动激怒了张振声、李长兴等高唐县封建反动势力的头目们。对联中的“古”指圣人，今指谁？当然陈毓三是侍从是“桑”。谁是对联中的“槐”？脸皮再厚也被戳破了。但是国民革命军的逼近，使他们忙于自保，已无暇对师生进行报复了。

当时的在校学生苏兰生，五十多年后的1980年暂住城内东街时，还多次笑谈“指桑骂槐”一事。

那两棵桑树后来很旺。2001年招待所改建时刨掉了。因修路拓街，院落北退，又将槐树遗之门外。2003年，东边的一棵槐树已经干枯了，但中学师生的革命

精神却被继承发扬开来。



一步三眼井

当今称柴府的地方，其前叫后花园。后花园是后乐园的讹称，后乐园是高唐驿站的组成部分。光绪《高唐州志》载，高唐驿站自建成以来，地方官员曾多次对其进行维修、扩建或重建。元大德年间、明洪武年间均有较大规模的工程施工。到明弘治十四年（1501年），驿丞张廷威“殫心区划，峻其台，广其基，层檐飞辉，四面结绮”，成为高唐当时八景之一。继而，张廷威又将接驿弃地七亩“缭以垣墙，植以花卉，穴地为泉，聚石为山”，建成花园。在园门上楣题曰“后乐园”，“盖取之诸文正公后天下而乐之意也。”

斗转星移，沧海桑田，驿站更移，花园倾圮。其基多为百姓建宅所占。不知何时，这后乐园的地名传称为后花园了。后花园的居民曾是人民公社东街生产大队第六小队的社员。直至二十世纪末，为复修柴府将此处民居拆迁之时，此处仍称后花园。

三眼井，称一丈三眼井，也称一步三眼井，又称三面井。当初是后乐园的一处景观。

相传，张廷威建造后乐园时，为造水景，又需汲水灌花，必须在这因常年污染地下多为咸水的花园内打井找到淡水之源。不然，花园将因无命脉而前功尽弃。经观察揣测后，在花园南端开始打井。等砖砌井框下

行四丈后，仍是板结的胶土，不见有水外渗，无奈，停工。继而离该井丈余远的东南方向，开打第二眼砖井。挖至三丈余深时，泉眼突现，清水外溢，霎时，便及人膝。众人皆喜，以为功成。待张廷威亲取井水品尝之后说：“此井咸水，不能浇花。”然后亲自丈量地势，指定在距第一、第二眼井均为丈余的地方再打第三眼井，大有打不出甜水绝不罢休之势。第三眼井顺利地打到了沙层，涌出了甜水。后来碑文中的“穴地为泉”即指三次打井。三眼井相距丈余，有枯、有咸、有甜之别，实为奇观。驿丞张廷威依众人所议将三眼井的后建工程一齐善结，这不仅成为高唐县的一处景观，更重要的是这三眼井对后人有着“有志者事竟成”的启迪。三眼井存留下来，传说也随之延续下来。1958年前，三眼井还完好存在，其中一眼深见枯底，像个砖砌的立式深地窖；另一眼井水不净，柴棒草叶浮满水面；第三眼为附近居民饮用水井，水质清澈甘美，担水者来往不绝。1958年，借引黄河水灌溉之便，导黄水入城圈，城圈始改貌为湖，于是枯井涨满了水，咸井淹没在水中，只有甜水井在人们保护下，未受影响。随着县城自来水的普及，这眼甜水井也逐渐很少有人光顾了。二十世纪末，整修北湖时，对近于掩迷的三眼井重新整修，恢复了原有面貌，并在每个井口添置护栏。三眼井周围砌成平台，并设有石凳，以利游人观看、休息。此三眼井于1999年被聊城市政府定为“第一批重点保护名胜单位”。

嬉 戏 古 景 点

高唐县内原有六大古景点，这些景点知名度特别高，真正达到“谁人不知，哪人不晓”的程度。

其实，称其为景点实属玩笑。虽有事实为据，但又事涉荒唐；虽观赏价值稍差，但释惑笑料有趣，故撰文介绍。

在高唐城内有三处古奇景，因拆除城墙、扩街修路等市政建设，已先后破坏得踪影全无。

一奇观为无影树。依树的生长规律来讲，是树便在光天化日之下，有光便有了影子，世间绝无无影之树。然而高唐城内就有一棵树确确实实地无影。当今八旬老人说：“小时候就有此树在。”可见树龄最少也百余年了。

高唐旧有城门和城墙，南门东侧的南城墙上，因多年风雨侵蚀，出现一硕大壁窟，阳光从东、南、西三个方向均照不进洞中。洞底生有一棵榆树，因常年缺水、不见日光，一直处在半死半活状态中，虽生长过百年也不见增粗，不见长高，洞中仍能招纳。因为太阳绝不会出现在北方，所以此树从未沐浴过阳光，也便从未有过影子。1947年，部分城墙被拆除，无影树也便无踪影了。

另一奇景为无底洞。是洞就应有底，不过深浅罢

了。然而高唐城内有一个洞，实实在在地无底。旧时城墙的东南弯处，墙体内住有数窝狐狸，其洞相连，一洞多门，便于隐蔽和逃跑。其中有一大洞，洞口朝向西北，开在距城墙顶不远的地方。顺洞向里望去，在一米左右处便见了洞底，可仔细寻视，这并不是洞底，只是洞的拐弯处。由此上拐，直透城墙之顶，如顺洞向上斜视，视线直达天空。这洞还有底吗？1984年随着居民盖房需要，将城墙拆平，无底洞便无处可寻了。

第三奇景是走桥不见桥。真真切切地是走桥不见桥。原东门外的护城河上有一座砖拱桥。桥两侧由东街居民郭氏经过支架施工，建起两排店铺，店铺与桥同长短。桥面砖铺地与东门和北关街相吻合连接，出得东门走过两边为店铺的街道，谁也料想不到脚下是桥梁。此桥在疏通排水渠道时拆掉，两边的店铺随之拆除，走桥不见桥的景点也就成了有史无迹的传说了。

另外三景点在清平镇。

清平镇原为清平县城之所在。亦有三奇景。清平城西不远便是马颊河，河东岸有一处堤连土丘，人称土山。土山上建有一座大寺院，人称土山寺。想当年土山寺香火旺盛，信徒云集，三奇景便在这土山寺一带。至今人们还在口头传承这三奇景曰：“洞，是朝阳洞；松，是万年松；井，是一步三眼井。”天长日久，改朝换代，随着土山寺的倾圮、姜桥的拆毁，三奇景也便消失了。

奇景之一：万年松。在土山寺门前右方，有一株不知何年枯死的松树，其树不粗也不高，胸径不过三把，

身高难逾九尺。树叶全无，枝杈枯落，树皮蚀光，只剩连有两枝树杈的主干，也被风雨剥出了筋骨。人们将这棵枯树用砖围成圆台保护起来，让它在大自然中慢慢消失。这便是那棵万年松。

奇景之二是朝阳洞。在土山西南方，有窝狐狸以丘为载体，向内开一洞穴，多年寄住，繁衍后代。因长幼不一，毛色有异，常见黄毛、棕毛狐狸跟随黑毛、白毛狐狸出进洞口。因狐宅位在寺旁，土山寺香火旺盛，狐狸洞也便沾了仙气，狐狸也便有了神气。有人便在洞口修一高不过三尺的鸡窝小庙，庙之后墙便是狐狸洞。狐狸们便经小庙出出进进。庙前也便有了香火供品。此洞再叫狐狸洞怕有对狐仙不敬之嫌，故称为朝阳洞了。

奇景之三为一步三眼井。土山寺西的马颊河上有一五孔石桥，因建于姜庄村头，故称姜桥。河为南北流向，桥为东西走向，中孔桥面为南北相连的三个碾盘砌架而成。每个碾盘中间有一原来安装挂碾桩的四方透孔，通过此孔可见桥下河水，如同井口下望。相连的三个方孔便被戏称为三眼井，三个碾盘相接连，便形成了这一步三眼井的奇观。

险隘变乐园

在鱼丘湖的东北湖畔，1999年由赵长福任总经理的金兴集团出资180万人民币修建的碰碰车场、转马场、摩天轮和政府设置的露天舞场、健身器材场共同组成了男女老少皆愿光顾的休闲游乐园。这里白天游人络绎不绝，傍晚则是摩肩接踵，到了节假日，乐园更是热闹非凡。

自驾碰碰车，行车无道，转向无轨，快慢自控，停行随意，互不招应。突然两车或几车相碰时，驾车者随着反弹的前倾后仰迸发出阵阵哈哈大笑，是倾胃吐肠的大笑。只寻欢乐逗趣，哪还有愁肠锁眉；骑上木转马，大人与孩子们一起嬉戏，能勾起童年的回忆。孩子们与大人同列骑马，感到自己长大了；上得摩天轮，徐徐升入高空，树梢高楼踏在脚下，视野无垠，心胸顿扩，半城湖色尽收眼底。眼见那平地见不到的景，心生那平地生不出的情，你不是诗人也会情不自禁地喊一声“啊——”；摩天轮下便是一园形水磨石地面露天舞场，每天晚上有百余人穿着整齐、仪表讲究地在此随曲翩翩起舞。一会儿“慢四”，一会儿“快三”，身随曲舞，心随身行，轻抚慢拉，相互应动。女士优美庄重，男伴绅士风度。此时只有高雅快乐，一天的劳累疲倦早已无影无踪；舞场的西侧，便是县政府为百姓设置

的健身活动区：高的横吊云梯、低的跑走步机、锻臂力腿功的单双杠、练腰背的环滑椅，适应跑、推、拉、扭、转的器材应有尽有。男女老少，健弱病残，各选其需。孩童找趣味，大人有期盼。年轻人愿青春常驻，老年人欲益寿延年……

这一方乐园，处在原城墙之东北角，人称“东北豁子”的位置。这里曾是攻守城池、古今兵家必争之险隘。1988年编《高唐县志》时所搜集的有关资料表明，此处应立两通碑：为太平天国地官正丞相李开芳立一“守无不固”的颂功碑；为随陈赓大将军奔袭高唐牺牲在此地的无名烈士立一“慰灵九泉”的纪念碑。

第一通碑的故事发生在清朝咸丰年间。

清咸丰四年（1854年）5月28日，太平天国地官正丞相李开芳，率六百三十余精干骑兵，从河北连镇出发，绕德州东，过恩城顺官道南下，第二天由津期店过马颊河，午后便来到高唐城北十里铺，为不扰百姓，除老弱残伤留在村边几个店铺内外，其余绝大部分人马在官道以东的打麦场上做短暂停歇，待进午餐。为分散负担，拨出四组人马，分别到附近四个村庄购买熟食马料。

将士吃饭真乃风卷残云般，一会儿就粮水扫尽，吃饱喝足了。战马用餐则难改文质彬彬的习惯，细嚼慢咽，挑挑拣拣，还不住地打着响鼻。这也为将士多休息一会儿创造了条件。将士们在麦秸垛下，相互依偎着，沐浴在初夏午后的阳光中，“春困”袭来，真难以抵挡，

刚刚还在生龙活虎般猛吃猛喝，转眼便睡姿百态鼾声四起了。随马队有一少年兵丁，名谢玉春，江苏省丰县谢家桥人士，年方十四岁，便随李开芳部南征北战，经历战争磨练。他不使长矛大刀，也不扛旗负灶，只是跟随李开芳左右做些杂物事情。这天随老弱残兵在东铺赵家店停歇，几天的鞍马劳顿，使他很快进入梦乡。

派出的探马回转报告时，太阳已偏西了。饱食的战马，睡过的军士，排列起来，煞是精神，做好了攻打高唐县城的准备。清点人马时，发现少年军丁谢玉春不见了。着人寻找，发现他在赵家店还做着美梦。李开芳见状，又想到太平军总势已趋于不祥，战杀无情，前途未卜，让他讨条安生路吧……使用手势止住对谢玉春的打扰，令大队人马开拔。

从连镇出发，两天辗转速奔三百余里，吃不好，睡不足，谢玉春这一觉直到满天星斗时才从梦中醒来。不见了首领，不见了战友，也不知他们的去向，当然村民也不知军情，无法帮他归队，但能帮他解决吃住的生活问题。谢氏在众村民的关照下，便在十里铺住了下来。赵家店收留他当小伙计。谢玉春虽然年少但阅历丰富，懂事又勤奋，深得东铺村民爱护。几年后，赵家店便让出一间房子帮其娶妻，由于厚道、勤劳，不几年，谢玉春便置买宅田，自力更生地发展起来，然后传宗接代，在这块热土上繁衍生息开来，现已有六支嫡传后裔。近几年在教育局退休的会计科长谢传江和在实验小学退休的工会主席、党支部成员谢传山兄弟二

人便是谢玉春的第四代孙。

李开芳大队人马未到，守城清军官兵先逃，州牧魏文翰怀抱官印投井自杀。只有几个形不成抵挡阵势的忠君之徒，很快便被李开芳部消灭。没费吹灰之力便占领了高唐县城，据城把守，等待天官副丞相林凤祥来会师。

清军江北大营帮办、军机大臣胜保率数倍于李开芳部的清军尾追而至，在城北五里铺安营扎寨，将高唐县城团团围住，凭势强攻。

清军想尽办法攻克高唐县城。先是从三五里外挖壕沟，欲接近城墙，“因所费极巨，又被执事者侵渔，难收其效。”故止；又造高大木档牌，“因路途泥泞，不能推进。既近者亦不避敌枪弹”；再造大炮，造炮场设在北五里铺村中（东、西五里铺之间那片空地），三五十里内包括做饭的铁锅在内的所有铁器皆强行收走，铸成一万多斤的大炮数门，从造炮场到阵地的五里路，“挽运者及千人，健牛四十头，三日方运到。”用时“只击碎城墙砖数块，而于城无大损伤。”（此炮现埋在华联超市即百货大楼后院原砖井西北五米处，轰击目标就是城墙东北角。另外在五里铺造炮场没运出的大炮有两门，较细长的那门，上世纪六十年代被当废品卖掉。另一门与现存百货大楼院内者式样相当，上世纪九十年代，又被废品收购站收买。在由五里铺向收购站运输的路途中，作者接到一匿名电话，告知此事，马上转告分管此项工作的文化馆任之文同志，经其交涉，

废品站当时没有转运出县。但不久，被威海有关部门以废铁身价偷偷购去，据说安放在刘公岛上。将清军攻打太平军的这门罪恶之炮，解说成中国海军炮轰日舰的功臣之炮。此等荒谬笑话还在延续着。

当时，清军攻高唐城的铁炮是炸药携铁砂的火药炮，不是导演在影视片中为追求壮烈效果硬将那个时代的火药炮改成了炮弹炮。胜保的大炮只在城东北角外的城墙砖上留下几处痕迹而已。炮轰无效，又改用炸药爆炸。1854年的10月28日，“选奋勇兵士，头顶木桌，身带火药数斤，挨至城下，共挖一窟，将火药安放其中，约二三十斤。药燃，城摧五丈，兵勇直上，冀可得手，因忽起逆风，未能攻入。”这是胜保军情奏折中的一段话。当时太平天国将土以树干木栅很快将豁口填堵。其后多次维修，但一直未将豁口填平。所以人们一直称此处为“东北豁子”。

胜宝最后采用的攻城办法是远距离深挖直达城墙根的地道。胜保军情奏折中提到此事：“距城远者一百数十丈，近者八九十丈”，东南面“挖至七十余丈，忽遇沙水，难望有成。”西南面“赶挖已六七十丈，尚无阻碍，但距城较远，见功稍迟”。东北面“兴工以来，颇觉顺利”，“挖至一百三十余丈，往返迂折，以致延期。现在设法测量，地道距城约仅十丈上下，事已垂成”。然而胜保希望“垂成”之际，却遭到失败。

1855年3月7日，更鼓之时，突然一声天崩地裂之响，地道自爆，死伤很多，胜保也负了伤。清军之狼狈

相由胜宝随员张集馨在《道咸宦海见闻录》中写得颇形象，录此一段代叙：“地道尚未过濠，遂用火药二万斤，以巨簍分载运入，又用棉布缝为药信长袋数百尺，外裹油纸。派定守备带领夫役运入窟中，逐节安放。人数既多，贼早知觉。贼知其无成，是以静待，城中寂无声音，但见女儿墙上，人影憧憧。夫役弁兵，因地道深黑崎岖，各携手灯蛇行匍匐。不料地风忽起，将灯吹灭，夫役倾跌，灯煤碰至药筐，一时并著，数百人登时灰烬。在洞口者，如定守备等人，形如黑碳，遍体流水，转瞬亦死。是役也，不但州城无恙，贼濠固无损也。贼在城上大肆喧笑，锣鼓并作。”

太平天国将士驻进高唐城后，在城内外百姓的支援下，于原护城河之外又开挖两道河沟，挖暗道将城内与各壕沟连通一体，进退隐蔽且方便。城门外设木城，城门开启随意，胜保奏折中写道：“明明见贼出入自由，并无阻碍。”故城内火药充足，不缺粮草，并且经常绕到敌后，对清军突发袭击。太平军天天有战果，清军日日受损伤。胜保奏折中道：“彻夜不能撤队，无日兵勇不为所害。”为防太平军出城加害，清军无法不用，甚至四乡收购青蛙，放入护城河中，夜晚蛙声一片，哪里蛙声停歇，便示意有动静，遂提高警觉。太平军则在城墙之上抛砖石不停，使蛙声失去规律性，清军仍不时受刺。太平军更借清军地道自爆时的混乱，趁机戮杀清军三四百人。对此张集馨有这样一段描述：“当火起时，贼开城而出，乘势扑杀，士兵委员各逃生

路。崇地山（胜保营中翼长）所骑黑骡，竟为前后人挤起，足不及地，蹄不能逞。”可见清兵在逃命时争先恐后各不相让的混乱场景。

胜保久攻不下，惹怒了咸丰。1855年3月11日，亲王僧格林沁到高唐，即传旨将胜保解京问罪。僧格林沁带来了林凤祥战败的信息，李开芳便无须在高唐等下去了。进驻高唐县城的第二百九十二天，即1855年3月17日，突围南下了。纵观战役全局，攻城之清军倒处守势，时刻防备挨打；守城之太平军，始终处于攻势，控制战场主动权，城门随意启闭，将士自由出入，粮草火药从城外获得源源不断的供应，且随时可绕敌后打击清军。李开芳要守高唐就守住了，九个半月后要走，也便走出了高唐，从头到尾是成功的，奇迹般的成功。

第二通碑的故事发生在抗日战争时期。

1939年正是日军狂荡不羁的时候。为在战略上灭日军气焰，掩护陈光、罗荣桓率八路军第115师由晋西、太行越过豫北、冀南向鲁西战略推进，刘伯承、邓小平决定派当时任129师386旅旅长的陈赓指挥115师和129师各一部，对日军在鲁西的战略支点高唐城发动一次突然袭击。

1939年1月10日，天未放亮，陈赓便率部由莘县出发，穿冠县，绕临清，直插清平以东地区。日行将近二百里，夜晚到达高唐西南二十余里的张庙村。于此，陈赓做了战斗部署：由688团为左纵队，津浦支队及青

纵三团组成右纵队，骑兵连随指挥部行动。夜间11时，一声令下，夜幕中兵分两路向高唐城进发。陈赓则在城西房庙村房士廷宅院外的棉柴垛旁设下指挥部。

指挥部的意图，很快转化成为各路战士的行动。青纵三团又兵分三路，一路佯攻南城，堵截南门；一路潜伏西门外，防日军外逃；一路消灭南关民团及伪乡政府。津浦支队兵分两路，一路协助688团消灭北关伪军，一路埋伏在城东门外高禹公路两侧，准备消灭禹城来援之敌。688团则兵分四路：一路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与津浦支队合作肃清县城北关伪军；第二路以一连兵力在城北佯攻；第三路以四个连的兵力从东北豁子处爬过城墙，直捣被称为“红部”的日军驻所；第四路以两个排的兵力沿东北豁子两侧城墙外展，控制进出口要隘。以上部署，均按命令于夜12时同时行动。霎时，高唐城周枪炮齐鸣，其炽烈程度系日军占领高唐以来从未所遇。且日伪军事先未获一星半点的有关情报，城外伪军在梦中当了俘虏，城内日军被平地冒出的枪炮声惊醒后，被强大的攻势压迫到城中心的钟鼓楼上，据高顽抗。激战四个小时，顺利完成奔袭任务。天将破晓时，部队安全撤离，奔夏津县而去。此次战役，摧垮了城周围伪军武装，攻占了除鼓楼以外的全部城池，杀死日军10多名，在战略、战术诸方面都重创了邪火正旺的日军。

陈赓奔袭高唐城的第二天，即1939年1月11日，人们在东北豁子的东边内侧发现一位牺牲了的小八路

军战士遗体。他胸部中弹，半躺式斜依在城墙根处，已凝成的血块从胸口直挂到枯草丛中，看模样年龄不过十五岁，但从握手榴弹的姿态和留在面孔上倔强、自信的表情看，他已是经过风霜、参加过战斗的老战士了。一个小战士牺牲的消息不翼而飞，北关来了几位大娘。她们把小战士平放下来，用毛巾擦净脸上的灰尘，抹掉衣服上的血块，戴正那顶由大改小了的军帽。几位大娘再也抑制不住悲痛的心情，由轻声啜泣进而失声痛哭。她们在替小战士整理用成人军装改成的上衣时，在口袋里发现一块红高粱面做成的饼子。这是一个圆形饼子的一半，呈半圆形。这半块饼子撞击着人们悲痛的心扉，唤起人们的联想：另一半可能是小战士的上一顿饭，也可能是分给了另一个战士。半块饼子的一头留有小小的弧形的一排齿印，这是小战士欲吃又舍不得，犹豫珍惜的写照。大娘们掂掂手中的饼子，看看那黄瘦的脸庞，潜然泪下，泣不成声，嘟念着“这是谁家的孩子？爹娘知道吗？苦了孩子！”“活着舍不得吃，就带着它上路吧！”大娘将饼子装回小战士的口袋。“谁家没有孩子？”“我们替你母亲为你送行了。”几位大娘的泪早已成串地落在小战士身上。不一会儿又来了几位大爷，手持镢头，就地挖一深坑，将小战士葬于这东北豁子了。第三天曾有人到北关了解小战士的下落，知情后便匆匆离去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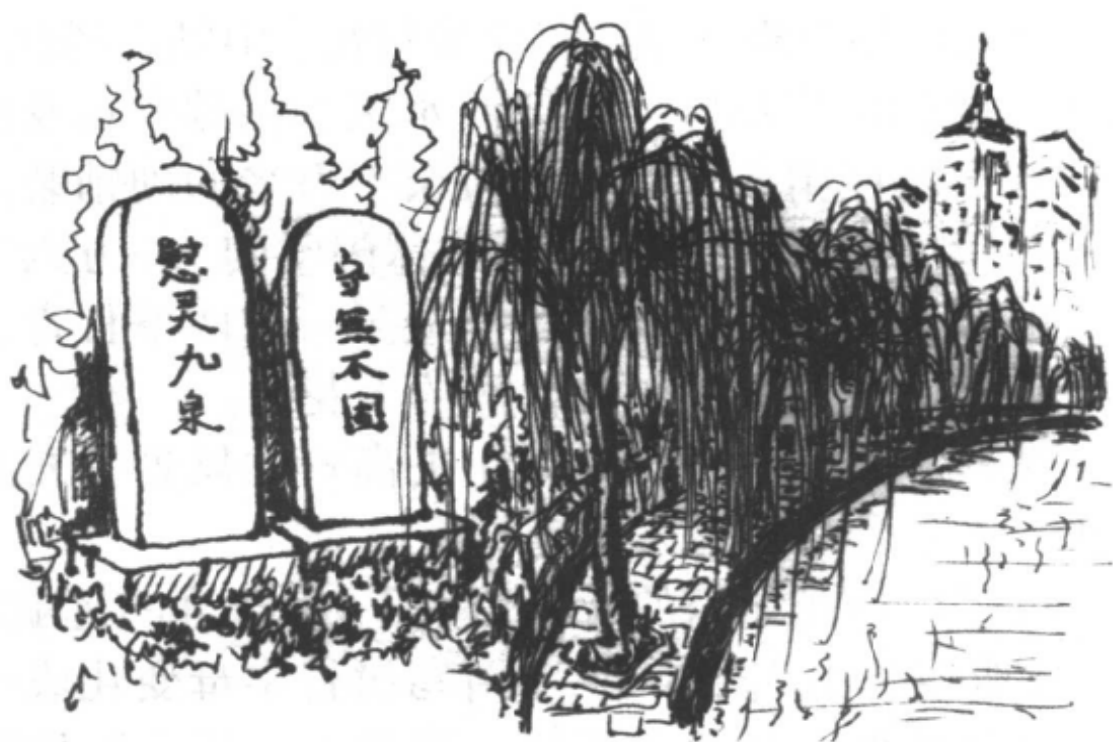
高唐解放后，城墙平掉种五谷，良田又改做宅基，近年来住户搬迁又建了乐园。虽然现在已不能十分准

确地指出小战士的忠骨所在处，但在这乐园之下是肯定无疑的。这位父母不知他远游何处，我们也不知其姓名籍贯的小战士，如有灵魂，在黄泉之下能看到现在人们享受着他为之奋斗、牺牲所追求的幸福生活，一定会含笑九泉十分欣慰。

小战士去了。没名没利地去了。接下来我们该深深地想了。

第一个故事的资料来自故宫博物院清朝胜保上奏的多份战报和北师大教授张守常所著《太平军北伐史》。

第二个故事的资料来自《陈赓日记》及当地百姓口碑。



音 像 水 画 中

金城广场位于高唐城中心最繁华的黄金地段。东靠天齐庙商城，可选购所需商品；西临官道街，可眺望鱼邱湖景；南有高层建筑，可感城市崛起的气息；北连金城路中段，可观车水马龙。金城广场的建设体现城湖水画特色，适宜男女老少休闲。居民茶余饭后有去处，文体活动有场所。

广场除搬迁费用外，另投资一千五百万人民币，于2003年3月开工，同年10月竣工，向居民开放。建成后的广场，南北长约三百米，东西宽约一百五十米，占地七十亩。整个广场由入口广场区、喷泉广场及舞台区、休闲广场及观水区、商业步行街、中轴广场区、运动休闲及林荫广场区、滨溪戏水区和南端广场及停车场共八个场区组成。其中三万余平方米的硬铺装，为居民提供了广阔、平整、清洁的休闲空间；一万六千平方米的绿地和水体，为居民打造了一个四季长青、三季有花、小桥流水、长廊台阁的大花园。

纵横三条书画长廊及其中央高耸的风景亭充溢着高雅、幽然的书画艺术气氛。

位于广场西北角的次入口处，高十米的《远航》雕塑，其造型是由“高唐”二字首写拼音字母变化成三个鼓满劲风的红色风帆所组成，道出了高唐人民放眼世

界、乘风破浪、奋勇前进、再创辉煌的心声。

广场内千余盏照明灯，或卧或蹲、或立或悬吊；似明柱，若花束，反照如银盘；有淡绿、有乳白、有荧光藤黄，绝无直射强光。各式各样的灯具造型及灯光色彩，为广场烘托出温馨、静谧、安然、平和的氛围。

传声设备像人体的经络，遍布全广场的每个角落。在广场内的任何一个地方，也能清楚地听到统一播放的音乐，其声音圆润悦耳，高低适宜，既不震耳，也不需侧耳。

可供万人同席的座位更有特点，分别适应各类不同人群的需要。绝大部分为木质坐垫，夏天炎日下不过热，冬天风雪中不太凉。愿散步，脚下有曲径；愿歇息，身旁有座位。有些相距较远的双人同座，是为热恋中的相依相偎的伴侣所设；有些三人连座，是为小两口带一宝贝的小家庭所备；有些四边可纳十多人的方台座，是为愿将天伦之乐带进广场的大家庭所建；还有四人或六人能对坐亦能靠背的磨光石台，是为会亲友准备的去处。另外，所有台阶均按看台设计，一层台阶可容三、五十人。整个广场的台阶可容五千人同时就坐。

广场外沿，铺设了长达千余米的卵石小路，专供穿薄底鞋，进行脚下穴位按摩的人散步所用。

广场南端建有四层楼高的特大电视屏幕，人称“齐鲁第一屏”，为居民播放精彩节目。其最佳视听范围可达二百米方圆，每晚有千余人的眼球被其吸牢。

金城广场最热闹的地方是音乐喷泉区。欣赏喷泉是一种特色的享受，人们将此景誉称为“雾雨造仙景”。喷泉在广场入口处，喷池直径二十多米，由八圈九十四组千余射水眼组成。每组射眼均配有集光和散射的彩色灯光。喷泉四周设有等阶看台，可容两千人同时赏泉。看喷泉的最佳时间是能使彩灯发挥作用的晚上。每天晚饭后，人们从四面八方、甚至从很远的乡村汇集拢来专为看喷泉。

当喷泉随着优美动听的音乐、披着五颜六色的灯光喷发而起时，可听到四面围观的人群中同时发出一声惊奇、赞许的呼喊。随着喷泉千姿百态的变化，人们顿足叫绝，身随水摆，心随水动，目瞪口呆，入神转静，进入似梦如幻的联想。喷泉急缓有致，断续循律，斜横摇曳，高低有序，水体形象千变万化；水上的光色淡蓝淡青，才红又绿，忽而上黄下白，忽而内橙外紫，使泉水呈现为晶莹剔透，琼制冰成，光怪陆离的水体；水势造型象云象烟，或雾或雨。如撩谷扬沙，似急雹抛玉。金豆漫天撒，银珠遍地落。一会儿水柱并排向上，形成彩帘倒挂；一会儿众泉喷云吐雾，随着一声震耳的乐音，突然两泉横射，在云雾中上下翻腾、左右摇曳，恰似银龙行雨；一阵骤雨过后，光风霁月，音乐抒情，喷泉变得特别温顺，三圈喷泉同吐水，形成三层冰雕玉砌的圆形水筒，这忽白忽黄的水筒越来越高，到十米处，筒的上沿外翻，形成重瓣的硕大的一朵百合花。翻开的花瓣白得透明，花的基部略染绿色，花的白

绿之间的过度色则为米黄，只是少了花中间那长长的花蕊。随着一声激昂的乐响，花的中间冲出一根独泉，直指天空，高达五十余米，其顶端四周外翻，渐淡，这正是百合花中间的惟妙惟肖的花蕊。随着庄严慢节奏的音乐，中间群泉组成红色花心，向外逐层染色渐淡，层次分明，宛若国色天香的牡丹。音乐慷慨庄严，所有水柱齐喷，一圈圈，一层层，里里外外的千余喷水柱相依无间地投向池中心，展示出高唐人民的向心力和团结一致共同奋斗的意志形象。

人们的思绪随着那若隐若现、亦梦亦幻的水体变化而缥缈遐想，还会从中发现傲雪盛开的霜菊、春风拨动的垂柳，仙女甩长袖、裙钗随风舞……最终将与五彩缤纷的世界和幸福多彩的生活联系在一起。

轻舟泛碧波

高唐县城为北魏景明三年（公元502年）设南清河郡时所建之郡城。北齐天保七年（公元556年），南清河郡取消，高唐县城由现禹城县伦镇迁至于此。康熙四十二年（公元1703年），因城内无北街，北门启闭无常，且多积水，故将北门堵塞，门洞设一铁窗，改为出水之道。因修建城墙或扩街建房，均从城墙之内取土，故城内形成除沿通向三城门的街道方向有建筑物外，皆是大片坑洼地，称为城圈。积水时称为城圈湖。城内水面大于陆面。

1958年前的城圈，夏秋两季城内地表径流之水，形成东北湖、西北湖、东南湖和西南湖，冬天干涸。春天因潜水蒸发，北城圈地表形成厚度过寸的芒硝晶体，白茫茫一片，阳光反射，不敢睁眼，走过其上，留下深深的脚印，人们将此拟称为“六月雪”。1958年，注入黄水，开始养鱼。四湖水面终年不枯。后因城墙不存，故城圈便失掉特指含义，故将城圈湖改称为鱼丘湖。1997年和1999年城建局两次组织建设了东北湖和西北湖驳岸；1999年和2002年，投资一千五百万人民币，由水务局对四湖先后进行清淤，工程量达一百九十万立方米。2003年投资六百万元人民币实施南湖建设，第一期工程石砌驳岸五千五百五十多米，建设码头、栈桥、

水廊、观台、船坊等水中建筑，安装汉白玉栏杆一千多米。2004年，再投资六百万元人民币，实施南湖建设第二期工程，铺设环湖路和临水步行道共硬化面积六千零八百六十九平方米。

从1999年投资三百八十万元人民币修建玉带桥始，随着四湖的整修先后投资四百零八万元建南湖桥、投资三百八十五万元建东湖桥、投资三百八十七万元建西湖桥、投资二百九十六万元建了引黄入湖的时风桥，使四湖水系相通连。至此，四湖水域面积达一千零六十亩（70.7万平方米），岸线总长九千五百六十七米，水面标高为25.54米，平均水深已超过四米，蓄水量达三百多万立方米，属华北地区最大的县级城区湖。

由于四湖相通，使高唐县城的古今景点珠联璧合，形成了高唐的鱼丘湖系列景观。

若乘船荡于湖面，接受水情，浏览岸景，歌韵、诗韵，乘着水韵一齐扑来。那心旷神怡、愉悦快乐之感真是难于言表。下录不知谁曲、亦不知谁词从两船中飞出的儿歌和诗各一首，可从中体味轻舟泛波的感受。

鱼丘湖美

E=1 $\frac{3}{4}$

轻松、快乐

5 6 6 | 6. 5 3 | 2 3 1 | 2. 1 6 | 3 5 6 |
天 蓝 蓝， 水 蓝 蓝， 春 风 儿， 软 绵绵， 鱼 儿 藏，
草 青 青， 花 红 红， 柳 丝 垂， 鸟 儿 鸣， 湖 岸 畔，

1. 6 1 | 5 6 6 5 | 3 — — | 2 2. 3 | 5. 3 5 |
水 花 飞， 船 儿 快 似 箭。 绕 柴 府， 望 赤 亭，
多 名 胜， 沉 积 千 年 文 明。 有 画 院， 有 乐 园，

6 6 5 3 2 | 3 — — | 1 2 5 | 3. 2 3 | 2.3 2.1 6.5 |
过 玉 带 穿 九 孔， 大 觉 寺， 湖 中 城， 平 台 码 头 浮 水
三 面 井 李 迹 井， 鱼 丘 山， 傍 曲 径， 九 座 大 桥 连 水

6 — — | 1 1.6 5 | 6. 6.5 3 | 1 1.6 5 | 6 — 1 |
中。 哼 哎 呀， 多 美 好 人 间 仙 境，
城。 哼 哎 呀， 多 美 好 人 间 仙 境，

2.2 3.6 6 | 5. 3 5 | 2.3 2.1 6.5 | 1 — — :||
西 湖 大 明 湖， 比 不 过 鱼 丘 湖 的 好 风 景。
西 湖 大 明 湖， 比 不 过 鱼 丘 湖 的 好 风 景。

$\frac{4}{4}$ / $\frac{3}{4}$ 2 —————
2.2 3.6 6 | 5. 3 5 | 2.3 2.1 6 | 5 i — i | — — ||
西 湖 大 明 湖， 比 不 过 鱼 丘 湖 的 好 风 景。

赞鱼丘湖

水榭垂柳傍碧浪，
疑似瑶池落高唐。
素贞若知有玉带，
许仙岂能在浙杭！

注：“玉带”指九孔玉带桥

古舫驾碧浪

在鱼丘湖东岸，拨撩着低垂的柳丝，沿着石铺的曲径，便寻到进入柴府的小桥。柴府建在这与湖东岸只有丈水相隔的一个长椭圆形的小岛上，只有岛东端这一小桥与湖岸相连接。过了小桥，便登上了陈桥禅让帝位的后周皇帝柴世宗的子孙柴皇城的地盘。

赵匡胤为报柴氏让权之恩，敕赐柴氏誓书铁券，使柴氏家族居有特殊地位，享有特别权利，受到特有保护。柴氏家族确系后周皇帝嫡派子孙，故柴氏家人常言：“我们也是龙子龙孙。”

柴氏家族原籍本不在高唐，而在沧州横海郡。据传，当年柴皇城随帝狩猎，来到高唐，见良田沃野一望无垠，黎民百姓忠厚勤劳，无匪无盗环境安宁，意欲留居，便奏明圣上，获封后柴皇城便留居高唐。在东城墙根探入城圈湖内的这处半岛上开始营造柴府。经细致规划，精心施工，一处华丽的古典宅院便建成了。只见院落主次分布合理，房舍亭台设计有序，式样色调古朴典雅。斗拱重檐，龙头兽仗，朱甍碧瓦，掩映九级高堂，画栋雕梁，分界百间华阁。树木花卉错落有致，小桥流水曲径绕幽、四季常青、三季有花，真乃前代帝王家，当朝勋戚第，俨然是一处标准的宋朝时期的皇式花园官邸。

柴氏成了高唐这个小县城中的首个皇家贵族，柴府也便成了高唐县最华丽的宫廷建筑。

随着柴氏家族的没落，其府第也圯坏渐重。天常日久，风蚀雨剥，九百余年后，后周皇帝的血脉嫡传子孙们已混同在县城内东街平房茅舍里的百姓中。威严的柴府成了断垣残壁，瓦砾一堆。其宅基逐渐被附近居民侵占，建为宅舍。这处东边接岸的城圈湖半岛上已有住户三十余家，曾属原人民公社东街大队第六生产小队，后改称东街村第六生产小组。1998年，为复建柴府花园此处居民全部搬迁。由电业局投资四百五十万元人民币，当年7月16日开工，挖湖开河，将这一半岛从湖东岸割下，形成四面环水东大西小的椭圆形小岛子，面积为11.8亩，并于岛上重建了柴氏宅第。

鲁西北的春天风多且大。当西北风掠过鱼丘湖水面时，便会由湖西北端卷起排排狂浪，浪浪相撞，越堆越高，滚到湖东南的柴府时，浪高过三尺。此时柴府基地周边，狂涛齐拥，水花上蹿，激起丈余。在迎风的柴府西岸，湖水随着风势，一会儿漫到岸上，一会儿退下岸边石阶。若从西北方向顺浪望去，柴府重叠遮掩，前露挑角西廊与花园凉亭相连，极像游船的前首彩门。后边重檐红柱相接，酷似龙船的仓腹，柴府成了一条皇家大游船了。水浪忽高忽低，澎湃撞击，柴府基下台阶时隐时现，使人错觉成这条皇家大游船在顺应水势忽高忽低破浪前进。观察的位置若再低一些，画面中地平线抬高一些，水浪显高，视线模糊，这柴府便真真实

实地变成了驾馭狂浪的古舫了。

1999年柴府被聊城市政府批准为市级重点名胜保护单位。

夜步玉带桥

天晴，万里碧空；风停，柳丝不动；水止，湖面如镜。夜幕降临，灯火烂漫，给县城穿上了光怪陆离的盛装。晚饭后，散步消食，从路中登上玉带桥顶，放眼左右，湖中倒影，五彩缤纷，令人惊诧，如诗所云：

信步拾级登桥顶，
华灯双列舞行影。
左看星辰落满地，
右见市景倒悬空。
鱼尾摆得灯火碎，
伉俪漫曲星座中。
微风轻抚撼万物，
细波荡漾动天穹。
悠悠神往临仙界，
飘飘心驰霄汉情。
脚登玉带通天道，
手扶石栏画中行。

紫气擎赤亭

2000年5月13日，在鱼丘湖之东北湖的中心处开工兴建湖心岛及岛上的望月亭（即赤亭、瞻岱亭）和与南岸相接的九曲板桥。两个月后的7月30日，三项工程竣工，总支出五十九万人民币。板桥九折，独柱平板，宽1.5米，长88米，桥面两边有铁锁护栏。岛上有仿占赤亭，另有太湖石两石墩。

鱼丘湖之东北湖中心的唯一建筑是赤亭。这立柱挑角重檐仿古建筑，从顶瓦至斗拱，直到立柱均为红色。沿其外端，以红色霓光灯装饰，夜幕中的亭子亦是晶莹剔透、全身彤红。因其昼夜皆红，人们称其为赤亭。

赤亭所在的小岛，是在原陶姓宅基地上修建而成的，直径三十至三十二米。岛的平面是高唐县版土的缩影，其边沿的一曲一折均与县地图十分吻合。灌木花丛合理布局，花色品种科学搭配，三季有花，四季常青。岛的东南与西南方各有太湖石一墩，其形其色皆入佳品之格，有诗为证：

瘦透露皱形奇秀，
赤黄蓝绿色堪优。
脱胎太湖越苏皖，
落安心岛镇鱼邱。

湖心岛南端有贴近水面的九曲板桥与湖岸相接。

亭美桥俏，相得益彰，古朴典雅，相辅相成，俨然一体，是高唐县城唯一伸入湖水中的水榭风景。

这道风景的亮点在仲秋。

一场秋雨过后，空气中水分充盈，气温显著下降，昼夜温差较大。清晨可见禾草滴露似雨，湖面水气升腾如云。早饭后，阳光撩去晨雾的纱幕，给湖面上的水气染上淡淡的紫色。这一湖紫气随风摇曳着、流淌着，形成一片云海。冲到湖心岛岸上，碰到九曲板桥上，便堆积、翻滚、升高，使板桥若隐若现，若连若断；湖心岛淹没在云中，赤亭被一团团紫气擎托着，气动似桥摆，云托疑亭升，如梦如幻，飘忽朦胧，身融于境。此时，若游人处在板桥或湖心岛上，那就组成了一幅腾云驾雾仙境游的画面。

人们不相信紫气托赤亭是仕途腾达的象征，只是实实在在地享受着美景带来的赏心悦目。

双日戏玉带

文题中的“玉带”系指玉带桥。

玉带桥，位于鱼丘湖之东北湖与西北湖之间。该桥是由省水利勘测设计院设计，高唐水务局建筑安装公司承建，县政府投资三百八十万元人民币，于1999年3月18日开工，到9月28日竣工的九孔景观大桥。采取井柱双曲拱桥结构。桥长一百九十二米，宽十四米。两边护栏为汉白玉石雕制，栏板上有《水浒》浮雕。承载力为汽车十吨。

玉带桥的建成，不但方便了城区的南北往来，也给县城增添了一道风景线。尤其“双日戏玉带”，更为人们传为奇观。

每年逢4月1日或闰年的2日，鱼丘湖上便出现玉带桥被刚刚露出地平线的太阳戏弄一番的奇特景观。

这天清晨，若遇风平树静，地不起尘，大气清澈，天无片云的好天气时，在鱼丘湖西岸与玉带桥中孔成垂直方向的那棵歪柳树下的临水石阶上，你可席地而坐，将目光平视投向东方，等待奇观的出现。

五时五十分，天空灰灰，湖面茫茫，湖东的高层建筑全呈黑影，不论前后，不分左右，参差不齐地连在一起，宛然一幅三色木刻画。六时，天空放亮，水面生光，建筑黑影渐显层次。六时五分，在天齐庙商城大楼

的北端，可见东方地平线上出现一抹白色，这白色眼见着顺地平线南北延长，同时向上方扩展，天空变灰蓝，湖面现反光，东边建筑轮廓逐渐清晰。六时七分，白色下沿变黄，黄色追着白色外延，先黄处又变红，红色赶着黄色扩展。此时西方天色由灰蓝变成深蓝，又变成鲜蓝。湖面则随着天空的变化出现相应的五彩交替的水光。东边建筑的外沿则先被镶上淡黄边，然后换成金黄边。六时九分，红色的天际下方出现窄窄的一道淡紫色的雾气，在紫色与红色之间突见一线橘红色下扣的弯钩，红色迅速内展，变成半圆，几秒钟之间便成了圆圆的边沿清楚的太阳了。此时的太阳有光无芒，血红血红，也不晃眼，甚是好看。在湖面这张胶片上显影般地慢慢出现市容倒影。一正一倒，两座九孔玉带桥在水面对接，九个桥孔形成九个从中间到两边依次减小的银盘，垂立在桥的黑影中。太阳慢慢升起，将光明洒向人间，黑影渐渐隐去，把彩色还给世界。透过玉带桥的中孔，可以看到太阳已被湖东建筑物托起。一道大红色的光道，从正对太阳的水面上粼粼闪闪地通过玉带桥下向西铺伸过来，在水面上形成一条从脚下起直达太阳的赤金大道。六时十一分，太阳慢慢地在玉带桥的中央上方露了出来，那根桥正中的路灯杆子遮不住太阳的脸庞，象是隐在太阳的身后。随着太阳的升起，那条金光大道瞬间便回缩到桥孔之下，成了太阳在水中的倒影，不偏不斜地蹲在桥影中的那个白盘子中央。此时桥上有个太阳，桥下同时克隆出了

另一个太阳，分列在玉带桥中央的上下方。六时十二分阳光渐强，桥面的轮廓边沿逐渐模糊，像泼墨渲染的国画，并有蠕颤、微摇的动感。几秒钟后，太阳始有光芒，被双日夹挟的桥面熔化式地变细、断开了，同时出现蒸腾样的虚幻感觉。此时若有伴侣牵手路过断桥时，会出现身影变形、肢解式消失，然后又组合式恢复的奇怪现象。这不能不使人联想到此景比重庆丰都鬼城愿来世再做夫妻的伴侣携手迈过奈何桥还有仙情，还有神秘感。十秒钟后，桥上的太阳升高了，桥下的太阳移位了，天空湛蓝湛蓝，湖面湛蓝湛蓝，由玉带桥向脚下铺来了金光大道。一切恢复了客观原貌。

很多人观此奇景后说道：“这是高唐的海滋现象”“是高唐的海市蜃楼”。

这道奇观的最佳观光效果要求的地点、时间、气候等条件实属难遇。几年碰不到一次。最佳不成可求其次。在春分至清明的一段时日内，通过移动观日点和改换桥孔等办法皆能寻到其景。亦可依此方式在东岸观日落，也能收到不错的效果。

巧成桥中桥

鱼丘山西侧的湖中，有由西南而东北的石砌斜堤，将一湖碧水割下一个东南角，形成一个可游泳、可戏水的角湖。斜堤东侧设有平台，平台有台阶，逐级而下直达水面。斜堤中有白玉石装成的两桥，使大湖与角湖相连通。远观两桥似乎一致，男人称其为兄弟桥，女人称其为姊妹桥。

有人将此二桥美称为“二乔”，借历史丽人大乔、小乔的美丽来赞誉这两座石桥；也有人将此两桥戏称为孪生桥。将桥拟人化，比喻成一个母亲所生的双胞胎。

“既是孪生兄弟，其母何在？”当然这是不着边际的遐想，也是嬉笑之间，是绝不可能有答案的。天下之大无奇不有，“这绝不可能”也可能了。不但找到了孪生二桥的慈母，而且能再现母桥孕二子的景象。

选个风平浪静的日子，走出孙瑛画院南大门，沿湖边路西行二十步，左转九十度，蹲下来面南平视。只见湖峡上方的东湖大桥，威武安祥地卧在水波中。宽阔的脊背任行人车辆自由往来，便便的桥腹就是那圆鼓鼓的三个桥洞。透过桥下中孔，视线直达南湖南岸，其半湖风景尽被扫描。再看东西两桥洞，却惊奇地发现两洞之内景象完全一致，若同一底版印出的两幅扇面形彩画。其画面中各含一座浮在水面的白玉石小桥。此

大桥腹中的这两小桥便是鱼丘山西斜堤中的那两座白玉石桥。这一景观恰好表明了三桥之间的母子和孪生关系。

这一桥孕二子、桥中桥的景观，并非故意造景，也非设计效果，而是极其偶然的建后巧成。

如在夏天，雷阵雨过后，成朵成块的浮云乱飞，其云影也在水面上奔驰。如两小桥被云影所遮，便形成半透明的青白色，呈现一对玉桥孕母体的景观；如两小桥走出云影披上阳光时，便涂上了金灿灿的黄色，呈现出一双金桥藏母身的景观；如一小桥在阳光中，另一小桥在云影中，一黄一白的两桥便形成金桥、银桥戏母腹的难得的瞬息奇景。

鲤鱼跃龙门

后梁开平二年（公元908年），皇帝朱温，又名朱晃。因晃与唐同韵，县名高唐犯忌，欲给高唐改名。当时高唐城东南“有丘，形似鱼”，便改县名为鱼丘县。后唐同光二年（924年）复名高唐县。光阴荏苒，景易物变，鱼丘渐夷。历史的脚步刚刚踏入二十一世纪，2002年，县政府投资一千三百万人民币深挖、疏浚东南湖，将四十四万立方米废渣、弃土按设计在湖之东南畔堆积成连亘的五个土山丘，最高者为21.7米。其势东高较陡，西坡较缓，宛若刚从湖中跳出的几条鲤鱼，恰成史迹的恢复。

如逢盛夏的过午，西方雨过天欲晴，东方积云正行雨，东半天必然出现弓顶在头上、双端插天际的气势磅礴的彩虹，绝像东开的天之龙门。此时再看龙门之下的鱼丘：雨后植被一新，丘之间轮廓相界分明，极似几条弓腰展鳍神情自信的大鲤鱼，正欲离地而飞，跃向“龙门”。

逢遇此景，人们便齐聚鱼丘之西，边观边大喊大叫曰：“鲤鱼跳龙门了！”“这是飞黄腾达、官运亨通的象征。”不管口中说什么，不论心里何期盼，均为主观遐想。只有眼观的实景是客观的，真实的，无比的美丽动人。

后 记

县志，属历史文献。其收录内容、简繁定位、应占比重、行文长短、语言表达诸方面皆有严格要求。有些情节生动的史实，因属简述范围，不能展开；有些可歌可泣的人物，因受地位等级所限，不能详叙；有些合情合理的一家之说，因无法核实，不能编进；有些催人泪下的平民之事，因资格不及，不能收录；有些古代和现今感人肺腑的人文事件，为遵断限之约，亦无位可置，不能纳入。因此，所集千万言的资料，裁出《高唐县志》所需之后，尚剩大批边角余料，。身充主编，大有丝未尽蚕不僵之感受。

高唐虽无鬼斧神功的名山大川去炫示，却有彪炳汗青的人文造化可弘扬。1996年，《高唐县志》出版之后，欲以爱祖国、爱高唐为主题将边角余料编著成《志余》，献给高唐的人民，为其了解家乡开一个窗口，为其生于高唐赠几分自豪，为其茶余饭后添一点谈话资料。后因种种缘故，一直搁笔未动。

2004年春，在县政协李玉兰主席、谢可亮副主席和王琴主任的再三鼓动和鼎力支持下，始撰是册。此时，已有几位高手，或编辑出书，或刊于报章，将本属《志余》的部分内容，先行一步刊布社会。无奈，只能拣些别人没写和没写完整的轶闻趣事，或撰文，或补

写，组成数篇专题式小文章，集而成册。这册子已不是《志余》，而是“拾遗”了。

高唐县城近些年来，市容面貌日新月异，越来越美。寄情于欣赏，有心随眼动的发现和体会，诉诸格纸，成几篇小文，与别人未及的几篇古景文章一并编入此册。

故该册名曰《高唐轶闻·景观拾遗》。

本册文体不一，有叙，有记，有议，有诗，有歌，还有散文，是一盘杂烩。

本册篇目排列为：先轶闻，后景观；以时为序，不以类分。

年届古稀，岁入暮年。心无有鸿鹄之志，力不达狼毫之端。幸有后人为伍，长子雪峰，幼女雪梅，休假不休，班余加班，访查相助，共同执笔，勉强脱稿。然后经主编点拨、文史资料委员会审查、名扬一方的资深史志行家侯立中校对，方敢付梓。

本册资料除采自《二十五史》、《史记》、《山东省通志》和多种版本的《高唐州志》等历史著作外，另有部分内容来自实地口碑查访。饱含了撰写《高唐县志》原班人员的血汗。近期在核实资料时，又得到专家陈昆麟和谢传山、郝英超、杨系双、邢春敏、郑光明、田传俊、陈明山、房玉泉、张振海、王长发、吕长河、吕长海、郭瑞庆、姜金庆、梁连川、王秀兰、吴光中、王吉义、纪正修、王春青、宋长德、孙宝亭、白凤林、康岳顺、许桂英、刘公辅、谢丰之、洪保山、洪泰国、洪

泰安等同志的协助；还采用了玉庆书库提供的有关资料；并有幸博得县领导青睐，中共县委书记孙兰雨、县长张乐天为本辑资料题词，县政协主席李玉兰和县委常委、宣传部长刘萍作序，在此一并致谢。

本册这块“半头砖”已抛出，愿引来美玉，众手操琴，让歌颂高唐的交响乐声溢苍穹。

郑 宽 亭

2004年12月